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RONZES UNEARTHED IN CHINA

18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

SICHUAN CHONGQING YUNNAN GUIZHOU QINGHAI



科学出版社　龍門書局

(K—0158.01)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18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RONZES UNEARTHED IN CHINA

科学出版社互联网入口　赛博古二维码

文物考古分社

部　门：(010) 64009636

部门E-mail：arch@mail.sciencep.com

www.sciencep.com

ISBN 978-7-5088-5522-6

9 787508 855226 >

定　价：7600.00元 (共二十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李伯谦　主　编

科学出版社　龍門書局
北　京

版 权 声 明

本书所有内容，包括文字内容、图片内容、版面设计、内容分类以及其他任何本书信息，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为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未经本书相关权利人特别授权，任何人不得转载、复制、重制、改动或利用本书内容，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 李伯谦主编. — 北京 : 龙门书局, 2018.12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ISBN 978-7-5088-5522-6

Ⅰ. ①中… Ⅱ. ①李… Ⅲ. ①青铜器（考古）– 出土文物 – 介绍 – 中国
Ⅳ. ①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999号

责任编辑：李　茜　雷　英　柴丽丽　吴书雷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黄华斌
装帧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20
字数：3 072 000

定价：7600.00元（共二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编委会

总策划 林　鹏

执行策划 李　锋　闫向东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昇　王　辉　王风竹　王晓毅　方　勤　田　凯　史家珍　白　岩　白九江
刘　宁　刘　旭　刘　斌　刘延常　刘海旺　安文荣　孙英民　孙周勇　李文瑛
邹后曦　张元成　张文瑞　张昌平　陈永志　陈星灿　林留根　罗　丰　周必素
郑同修　赵永军　哈比布　宫希成　贾连敏　顾万发　徐长青　高大伦　郭伟民
唐　飞　梅鹏云　曹　劲　曹　玮　曹建恩　盛建武　韩立森　程武彦　谢日万
熊建华

主　编 李伯谦

副主编 刘　绪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秋伟　于崇远　万　娇　万全文　马　昇　马　强　马萧林　王　玥　王　剑
王　莹　王立华　王志刚　王金平　王京燕　王振芬　王晓毅　王爱国　王效军
王智远　毛保中　方　刚　方　辉　方向明　尹秀娇　卢　涛　叶　蓉　田正标
田名利　田建文　冉宏林　冯　好　邢　毅　吉琨璋　吕　静　朱存石　乔　虹
任相宏　刘　伟　刘　凯　刘　彦　刘　焰　刘　新　刘亚彬　刘延常　刘庆平
刘红军　刘志勇　刘春喜　刘振陆　刘晓东　刘海旺　刘雅婷　刘德银　齐　新
闫　勇　闫光星　许　超　孙建军　杜博瑞　李　飞（贵州省博物馆）
李　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　刚　李　倩　李　铭　李　晶　李　媛
李文瑛　李龙彬　李民昌　李国华　李国学　李宝垒　李荣华　李慧竹　杨　帆
杨　军　杨　波　杨月光　杨正宏　肖承云　吴　辉　吴志跃　邱玉胜　邱新宇
何海蓉　闵　锐　宋长城　张　伟　张　惠　张云涛　张文惠　张立明　张合荣
张红星　张君弘　张雪菲　张崇宁　张强禄　张新宁　张翠敏　张慧国　陈　亮
陈　慧　陈卫东　陈以琴　陈永耘　陈志学　陈丽新　陈顺祥　武俊华　林　强
林留根　罗　丰　罗　霞　罗向军　季宏伟　周必素　周学良　周科华　郑同修
郑志宏　孟华平　胡　勤　胡春佰　侯红伟　宫衍军　姚　练　秦树胜　夏伙根
夏连保　原　丰　徐文英　徐倩倩　高成林　郭　明　郭　物　郭军涛　郭晓东
唐　飞　唐　音　黄　峰　黄凤春　黄昊德　黄建勋　曹　劲　曹志君　龚　良
龚张念　崔大庸　梁中合　梁玉根　梁志龙　葛　洪　董　峰　蒋廷瑜　蒋志龙
蒋俊春　韩炳华　程　卫　傅吉峰　傅聚良　谢　焱　谢尧亭　谢虎军　靳　军
蓝日勇　楼建龙　赖祖龙　雷　雨　虞海燕　赫玉建　蔡路武　谭　勇　熊贤礼
魏　国

编辑组 闫向东　孙　莉　张亚娜　王光明　李　茜　雷　英　樊　鑫　吴书雷　郝莎莎
赵　越　柴丽丽　王琳玮　王　钰　董　苗　郑佐一　王　蕾　闫广宇　蔡鸿博
周　嫘　张睿洋

凡　例

1.《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为“中国出土文物大系”之组成部分。

2. 全书共20册。出土青铜器资料丰富的省区单独成册，或为上、下册，或为上、中、下册；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地域相近或所收数量多寡，合并成册。

3. 本书所选资料，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博、考古机构提供。选入的资料兼顾了青铜器所属时代、特色，注重突出标准器和艺术品。所收资料截至2018年。

4. 全书设前言，每册有概述。

5. 关于器物的编辑排序、定名、时代、尺寸、文字说明：

编辑排序：首先，各卷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时代先后排序。其次，在按时代排序的基础上，按器类排序：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度量衡及其他等。其中鼎按先圆鼎、后方鼎排序。

定名：不加形状、纹饰、铭文、用途、性质等（鼎除外，鼎分圆鼎、方鼎）。

时代：夏代、商代前期（以武丁为界）、商代后期、西周、春秋、战国、秦代、西汉、东汉。

尺寸：单位为厘米。

文字说明：图片上能够看到的内容尽量不赘述，客观描述为主，少主观性发挥。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

— 18 —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
SICHUAN CHONGQING YUNNAN GUIZHOU QINGHAI

主　编　高大伦　盛建武　邹后曦　程武彦
刘　旭　周必素　乔　虹

科学出版社　龍門書局
北京

四川编委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　娇　冉宏林　李　飞　李　媛　陈卫东　陈志学　周科华　郭　明　郭军涛
唐　飞　雷　雨

参编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成　吟　向　野　张丽华　江　聪

参编单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博物院

重庆编委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方　刚　何海蓉　罗　霞　夏伙根

参编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丹　于桂兰　王　铭　孙吉伟　李应东　张　辉　陈　昀　陈厚清　庞　佳
雷庭军

参编单位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万州区博物馆
云阳县博物馆　奉节县夔州博物馆　巫山博物馆

云南编委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邢　毅　吕　静　杨　帆　闵　锐　张新宁　蒋志龙

参编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黎锐　石明荣　田　健　邢　毅　吕　静　朱云生　刘春城　汤文忠　阮玉才
李红成　李昆肆　李晓帆　杨　帆　杨　杰　余朝臣　闵　锐　张　英　张云峰
张冲明　张丽梅　张谷甲　张泽涛　张新宁　周忠全　钟仕民　黄　颖　蒋志龙
舒　鸿　曾跃明　魏辉抗

参编单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云南省博物馆　昆明市博物馆
玉溪市文物管理所　曲靖市文物管理所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保山市文物管理所　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玉溪市江川区文物管理所
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　昆明市官渡区博物馆
广南县文物管理所　个旧市文物管理所　祥云县文物管理所
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　昌宁县文物管理所　泸西县文物管理所

贵州编委会

编　　委　周必素　陈顺祥　李　飞　张合荣

参编人员　张合荣

参编单位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博物馆

青海编委会

编　　委　乔　虹　王　玥　李国华

参编单位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省博物馆　西宁市博物馆
大通县文物管理所　海东市平安区文物管理局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出土青铜器概述

高大伦　冉宏林　方　刚　刘　旭　张合荣　乔　虹

1. 四川地区

位于中国西南一隅的四川盆地，在西汉中期彻底融入汉文化以前，文化自成一系，别具一格，其青铜器同样特色鲜明，学界多称“巴蜀青铜器”。川西山地由于其地形、地貌与盆地泾渭分明，青铜器也与巴蜀青铜器明显属于两个系统，暂可称为“川西青铜器”。西汉中期以后，四川的汉文化与国内其他地区已无太大区别，青铜器亦如是。现将上述三类青铜器的出土概况、器类构成、器物特征和其他有关情况概述如下。

（1）巴蜀青铜器

根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四川盆地处于蜀和巴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之下。青铜器尽管作为舶来品出现在巴、蜀之地的时间较晚，使用也不甚普遍，但却因其造型奇诡、立意扑朔而成为巴蜀文化独特内涵的典型代表。巴蜀青铜器早在民国时期成都白马寺一带就已经出土，但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则迟至1954年才发现于昭化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此后几十年里在川内各地均有大量出土，其数量已将近3000件。其年代从商代早期延续至战国、秦时期，西汉早、中期仍可零星见到。根据形制、纹饰特征的不同可将巴蜀青铜器分为两类：

第一类青铜器源自中原地区和楚地，目前年代最早的是出土于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高骈的早商时期铜牌饰；晚商和西周早期的器类及数量最为丰富，包括尊、罍、瓿、盘、觚、觶、无胡戈、戟、钺和铃等，这一阶段的铜器多集中出土，如三星堆祭祀坑、竹瓦街窖藏等，其他则零星出土于广汉、岷江小区、新津和阆中等地点；东周至西汉中期新出现单胡戈、有格剑、弩机、鐏、镦、镞、编钟、铙、车马器、带钩、镜、珩和钱币等源自中原的器类以及鼎、甗、罍、缶、豆、敦、壶和盘等楚器。

上述器类的形制、纹饰特征均与中原地区和楚地同类器基本一致，只在细微之处有些区别，如尊均为敞口、束颈、折肩、斜直腹，颈部均饰数周弦纹，腹部和圈足则多以扉棱间隔兽面纹为饰，与中原地区同类器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圈足多为内敛的高圈足，应是模仿所致，而竹瓦街出土的两件铸有铭文的铜觶有可能直接来自中原地区。

第二类即本地特有青铜器，根据年代的不同可分为两组：

其一为晚商至西周早期的立人像、头像、面具、眼睛、兽面、树、坛、太阳形器、瑗、牌饰、挂饰、柳叶形剑、柳叶形矛、三角援戈以及各种动物造型铜器，其出土情况与同时期第一类铜器一致，即集中出土于三星堆祭祀坑、竹瓦街窖藏、金沙遗址“梅苑”等地点。其中多数具有明显的写实风格，均系直接模仿生活中常见之物。多素面无纹，少数装饰有仿自中原系铜器的简单纹饰，如涡纹、弦纹、圆圈纹和卷云纹等。

第二组的年代为东周至西汉中期，除了有延续自之前的柳叶形剑、柳叶形矛和三角援戈等，新出现了釜、銮、釜甑、尖底盒等容器，双胡戈、荷包钺等兵器以及斧、斤、凿、削、锯、刻刀和印章等工具。其中多数器类素面无纹，仅斧、斤、凿等工具的銎外部多饰简单几何线纹，部分兵器有刻意铸造形成的圆形纹饰和不规则蚀刻纹等。此外，部分青铜器的表面及印章印面多铸刻有似文似图的符号，即学界所谓的“巴蜀符号”或“巴蜀图语”，部分矛、戈所铸虎形纹饰或许也属此类，其性质和含义至今不明。

上述两类巴蜀青铜器均共出，可见尽管来源不同，但都是巴、蜀两地固有的使用之器。而从出土情况可看出早商至西周早期的巴蜀青铜器与东周至西汉中期的巴蜀青铜器具有明显不同的用途和性质：

早商至西周早期的巴蜀青铜器不见于墓葬，绝大多数都出自较为规整的器物坑，如三星堆“祭祀坑”、仓包包“祭祀坑”、高骈器物坑等，竹瓦街的铜器置于两个大陶缸之中，亦较为特殊，而金沙遗址“梅苑”地点除了大量青铜器之外，还出土有大量象牙、玉石器和金器，一直被视为祭祀区。故这批铜器与世俗生活关系不大，而与祭祀活动有较为密切的关联。

东周至西汉中期的巴蜀青铜器多出土于墓葬，且几乎每墓可见，其出土频率之高实属罕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遗址中极少出土，故其作为生活实用器的可能性较小。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战国时期巴、蜀之间及二者与秦、楚之间多有战争，故巴蜀青铜器或有可能为实用的战时用器，而诸如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木椁墓等高等级墓葬出土

的成套青铜器则有可能已经脱离最初的用途而转变为礼仪用器。

属于本地的巴蜀青铜器的族属目前尚不是特别清楚，从出土情况结合文献记载可大致看出神树、人面像、柳叶形剑、三角援戈等第一组铜器应该属于蜀族器物，只是其中的柳叶形剑、三角援戈等在东周至西汉中期又同时成为巴族器物，而釜、甗等圜底容器则有可能属于巴族器物，之后又为蜀族所用，二者并无明显的区分。

关于巴蜀青铜器的科技考古研究，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开展过系统工作，涉及铅同位素比值、铸造工艺、合金成分、金相等多个方面，并得出古蜀青铜器的矿源为西南地区以及三星堆两座祭祀坑出土铜器同时铸造等诸多重要结论。

（2）川西青铜器

川西青铜器最早可能于20世纪初就已经面世，而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川西青铜器于1938年发现于汶川萝葡砦，此后在四川西部山间河流两岸的阶地和缓坡上陆续有所发现，其分布大致有岷江上游、青衣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安宁河流域和盐源盆地等几个相对集中的区域。川西青铜器的出现年代整体较晚，多数始自战国时期，最晚至东汉，目前所见最早者为雅砻江上游流域的晏尔龙出土的铜戈，年代可早至商代。

川西青铜器从整体面貌上可分二大类：

第一类是明显来自四川盆地的巴蜀青铜器，这类青铜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出土较为集中，如城关墓地出土有铜釜、铜甗、铜盘、柳叶形剑和荷包钺等，牟托一号墓及两个器物坑出土有铜鼎、柳叶形剑、三角援戈、双胡戈、单胡戈和甬钟等，汉塔山墓地出土有铜甗、铜盘、柳叶形剑、柳叶形矛、三角援戈、单胡戈、带钩等；②器类相对较为单一，目前所见较多的主要是兵器，尤以柳叶形剑、柳叶形矛和镞等较为常见，次为铜甗和铜盘等容器，年代较晚的还有带钩、钱币等，器类明显不如巴蜀青铜器丰富；③形制、纹饰特征与巴蜀青铜器几乎完全一致，如铜釜均为宽体、平折沿、沿下有对称竖环耳、圜底，柳叶形剑均整体形似柳叶，柄部有两穿孔，穿孔的位置与四川盆地同类器完全一致，单胡戈的援末端饰虎形纹饰，部分戈的胡下部向内部内勾；④缺乏完整的演变序列，即便出土数量最多的柳叶形剑也是如此。如此看来，上述铜器并不是川西青铜器的内在构成部分，而是直接由四川盆地带入，故严格说来第一类铜器并非真正的川西青铜器。

第二类即是事实上的川西青铜器，类别包括兵器、装饰品和其他类铜器。兵器以剑最多，剑身较短，格部和茎部形制各异，大致可分为圆首无格、双圆饼形首无格、曲茎无格、一字首和山字格等，所饰纹饰多见直线纹、圆圈纹等较为简单的几何纹饰以及叶脉纹、辫索状旋转纹等；戈也是较为常见的兵器，与巴蜀青铜器的戈不同，川西青铜器的戈或为曲刃，或整体形似曲茎剑，以素面为主，部分饰简单的几何纹饰；此外还有装饰弦纹、圆圈纹的靴形钺以及造型独特的矛、镞等。装饰品的种类繁多，器形均较小，如牌饰、泡、扣、臂钏、指环、镯、管等，其形制或为较简单的圆饼状、管状、矩形等几何形，或为较复杂的奇特造型，如联珠状纽、双联圆形泡以及装饰镂雕动物形象的牌饰等；多数装饰品不见纹饰，少数如牌饰等多装饰各类动物形象或者圆圈纹、直线纹、叶脉纹和乳钉纹等简单纹饰。其他类铜器涵盖的器类较多，但除了杖首外的出土数量均较少，如鼓、案、钟、铃和马具等。尽管关于川西青铜器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但从多数铜器在甘肃、内蒙古甚至辽宁等地都可找到相似器物，或许其源头应与童恩正先生所说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关。

川西青铜器几乎都出自石棺葬、大石墓或土坑墓等各类墓葬中，出自居址的较少，且以小型的刀、削等工具为主，表明多数川西青铜器都不是生活实用器，而是为死者死后所用，不排除其中部分器物是生前所用而死后继续埋入墓葬之中，如佩戴在身上的指环、手镯和臂钏以及可能是衣服配饰的部分形制奇特的器类等。

（3）汉代青铜器

西汉中期以后，巴蜀本地文化特征已基本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与国内其他地区面貌基本一致的汉文化，出土铜器亦是如此，此处所谓的汉代青铜器即指这批铜器，而不包括西汉早、中期延续自战国、秦时期的巴蜀系青铜器，其年代下限即东汉末期。四川的汉代青铜器最早于20世纪40年代出自彭山东汉崖墓之中，此后在全川尤其是盆地区域的汉代墓葬中时有出土，居址中所见较少且器类单一而固定，可见多数器类的性质应是用于随葬之器而非生活实用器。

与一般的汉代青铜器一样，四川的汉代青铜器主要包括容器、兵器、生活用器和明器等。容器包括鼎、钫、壶、洗、盉等，兵器多见有格剑、弩机和胄等，生活用器则以博山炉、带钩、镜、印章和钱币为主，明器主要有俑、马、车和摇钱树等，上述铜器中的绝大多数与其他地区的同类器相比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没有明显区别，而摇钱树则是四川地区最具特色的汉代青铜器，其他地区较为少见。

上述三类青铜器虽各具特色而互不相同，却在时间、空间上多有重叠，川西青铜器多与零星的巴蜀青铜器共出，而汉代青铜器的部分器类在巴蜀青铜器的晚期已经出现，诸如摇钱树一类四川特有器类有可能直接源自巴蜀青铜器中的神树。三类青铜器的此消彼长，反映了四川地区逐渐融入华夏一体的漫长过程，同时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特征。

2. 重庆地区

20世纪90年代之前仅有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渝中临江支路、开县红华等少数地点集中发现青铜器。1997年开始的三峡文物抢救工程出土了汉代及以前时期青铜器上万件。

（1）重庆地区的青铜器经历了引进、创新、趋同的发展

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商代中晚期到春秋早期是萌芽期，青铜器发现很少，仅在万州糖坊坪、巫山双堰塘、丰都石地坝等地发现小型青铜工具、石质青铜镞范。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是1980年出土于巫山大昌李家滩的三羊三鸟尊，有研究者认为是来自长江下游的中商中晚期青铜器，这表明当时尚未开始大规模的使用和制造青铜器。

春秋中晚期到西汉早期是高峰期，忠县以下的沿江地区大都处于楚国治下，青铜器与江汉平原极其相似；奉节以西的小江、嘉陵江等支流区域属于巴国疆域，深受成都平原青铜文明的影响，巴式青铜器在形态特征各方面都与毗邻的蜀文化十分相似，也常常被合称为“巴蜀青铜器”，其相异之处主要是器类和纹饰特征的些许区别。除此之外，楚式、秦式、越式青铜器甚至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都有发现，体现出重庆地区和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密切。

西汉中期以后是汉文化大一统时期，西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大融合，导致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群逐渐消失，在器类、形制、纹饰方面大部分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仅仅是在杂器上有一些特色器类和特有造型。不经成分检测很难判断其产地。

（2）总体来说重庆地区的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容器、兵器、乐器、杂器四类。

早期除了三鸟三羊尊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容器。中期出土的礼器基本上都属于楚文化铜器，只有鼎、敦两类，除了奉节永安镇成组出现外，其余都是零星出土，故将其归入容器类。常见容器类型有属于巴式青铜器的錞、釜、釜甑，这是春秋战国前后重庆地区最为常见的青铜器组合，底部经常有烟熏痕迹，显然是日常用器。外来文化青铜器往往单个出现在墓葬中，楚式青铜器的圆壶和来源于秦文化的蒜头壶最为常见。晚期容器以钫、圆壶、鼎、盘、豆、盆、釜、耳杯、卮、盒等类型为主，大多素面，器壁较薄。较大规模汉墓中往往有成对的钫、鼎、豆出土，东汉时期的一些盆、盘底部还有纪年铭文。

兵器在汉代以前数量最多，也最有地域特色。一是器类基本是剑、戈、矛、钺等近程格斗兵器，远程兵器如弩、镞等以及甲胄等防御兵器基本外来。二是大部分兵器上都有虎、鸟、蛇等动物符号或者巴蜀图语符号。

乐器基本上出自中期，数量较少且器类单一，器形多仿制中原，仅在造型和纹饰上有本地特征，主要器类有虎纽錞于、钲、铃、甬钟、镈、编钟等，大型乐器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中小型墓葬中仅有铜铃发现。

杂器类包括车马器，斧、斤、锯、削等工具，勺、匕、夹、带钩、镜、灯、熏炉等日用器以及印章、模型明器、棺饰件等许多器类。

（3）重庆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引进、模仿的模式，很多器类都是在模仿周围文化器物的基础上在器形、纹饰上做些改变，例如虎纽錞于。其次是纹饰特征极具地方特色，巴文化青铜器的动物纹饰初步统计大约有十几类数十种，以白虎巴人的图腾——虎为最多，其次有鸟、蛇、蝉等，大多施于兵器戈援、矛骹和剑身近柄处，多为侧面图案，形象生动，艺术价值高。而巴蜀图语符号据初步统计有至少十七类四十多种，将人、兽、动植物形象、几何纹样等或单独刻画，或成组排列，与图像形态有很大区别。

（4）铸造研究方面，万州糖坊坪、巫山双堰塘、彭水徐家坝都发现商至西周时期的小型冶铸工具。虽然在汉代遗址中才集中发现青铜冶铸相关遗存，但多位学者对重庆青铜器的科技检测证明，战国时期的大部分兵器和容器应该是本土制造，其金属成分与周边地区有较为明显的差别。重庆地区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掌握了浑铸、分铸技术，大量使用了活范块、铸接、垫片等技术，同时实践并应用了焚失法等特殊技艺。在合金配比方面与四川青铜器更为接近。表面斑纹工艺使用了热镀锡和退火处理，有效抗腐蚀，此外还出现了打磨、铸补、錾刻、贴金、错金银、鎏金等多种工艺。同时大量的铸补痕迹也表明三峡地区青铜容器较多存在空洞、缩孔、气孔、裂纹等铸造缺陷，距离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技术还有一定差距。

3. 云南的青铜时代

关于云南的青铜时代，从古代文献着眼，只能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等的一些零散记载中略知一二，我们真正深入的、相对全方位的认识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的一系列考古发掘逐步建立的。

（1）公元前1800年前后，约当中原地区夏商之交，云南开始跨入青铜时代的门槛，当然这一进程在云南各区域并不是同步的，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以剑湖、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相对要早一些，此后直至春秋中后期，云南青铜时代在步入繁荣前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逐步发展期，且发展的重心始终集中于滇西以及后起的滇中、滇东北区域。这一时期尽管开始出现少量的小件铜器，但石器作为主要的常用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不同区域文化上的特立独行主要体现在陶器上，相对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陶器组合多为新的类别所替代，除个别地点外，在纹饰上繁缛精美的风格已基本不见，装饰手法趋于简练。

剑湖区域以剑川海门口二、三期遗存为代表，其年代在公元前1800～前500年，二、三期间有明显缺环。二期石器基本延续新石器时代晚期风格，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出现大量双耳器类，纹饰较简单，发现于器表绘制红彩的装饰技法，铜器为凿、铃、锥、刀等小件器物，以青铜器居多，少量红铜器。三期陶器中红褐和灰褐陶增多，不见彩绘陶，出现少量红衣陶，陶器火候变低，铜器数量较二期增多，发现有镯、锥、箭镞等。无论二期或三期，大量的木桩遗存显示了一种特殊的滨水而居的聚落形式，定居农业均构成了其生业模式的主要方面，从出土器物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北方青藏高原东麓文化因素的影响。

洱海区域以大理银梭岛三、四、五期遗存为代表，年代

与剑湖区域同期遗存大体相当，但文化面貌迥异。三期房屋分地面式建筑及杆栏式建筑两类，石器以网坠数量最多，陶器多为夹砂灰褐陶，器形分长颈罐、侈口折沿罐、齿状花边唇盘、钵、匜等类，纹饰简单，以各种刻划纹为主，铜器数量较少，多为残断的锥等，以红铜器居多。四期陶器中夹砂红陶、红褐陶比例大增，出现红衣陶，新增釜、有耳罐、敛口盆、支足等器类，火候较三期下降，铜器主要为锥、镯、鱼钩等器类。五期红衣陶占据主流，陶网坠数量较多，铜器仍多为小件器物，但青铜器占比已开始超过红铜器。上述三期基本连续发展，作为典型的螺壳堆积类贝丘遗址，渔捞经济在其生业模式中占据了主要位置，陶器组合及特征显示出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

澜沧江、怒江下游干流区域尽管涉及范围跨度较大，遗存众多，但均显示出较为一致的文化共性：遗址多处江畔台地或缓坡地带，文化堆积相对单纯，出土遗物以石器为主，陶器较少，石器中斧类占绝对主流，打制与磨制共存，从形态上可分为条形、双肩形、不对称形及梯形等类，其中条形石斧、不对称形石斧打制、磨制兼有，而双肩石斧多为打制，梯形石斧均为通体磨制，部分遗存中零星共出小件铜器残片或铸铜石范残件。此类遗存在澜沧江干流以景东丙况、景谷南北渡及白银渡等遗址为代表，在怒江干流以龙陵大花石、潞西尖山等遗址为代表。

小黑江属澜沧江右岸支流，流域内多洞穴遗址，其中以耿马石佛洞遗址最具代表性，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500～前1100年，其文化面貌呈现出与澜沧江干流区域迥然不同的风格。洞内搭建地面式或杆栏式房屋，石器种类丰富，造型多别致独特，且加工磨制极为精美规整，其中以多菱六角星形杖头、六星璧、双翼矛等最具特色。另外，在遗址的下部地层出土了一件青铜工具的残片。陶器烧造火候高，器类以釜数量居多，器表往往经磨光处理，纹饰极为发达，尤其是点线组合纹以点线为基本元素，构成了各类涡状、云状、花瓣状、三角状等连续、对称的几何纹样，不但沿袭了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繁缛精美的纹饰风格，而且发展到了极致，陶器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和相邻的东南亚大陆国家出土的同一时期陶器有很多相似性，显示出其间更为密切的联系。

滇中区域以通海兴义二期遗存为代表，遗存年代约合商至春秋早期，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孔雀石、炼渣、石范及小件青铜器，石器中磨制石锛较多，除少量梯形石锛外，多为有肩有段石锛，同时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有领石环及石钻芯。陶器地方特色鲜明，典型代表器物有盘口圜底釜、盘口罐、带流罐、带乳钉陶钵等，还发现大量网坠、纺轮，与当时织网捕鱼的生业形态相吻合。作为典型的螺壳堆积类贝丘遗存，除大量水生生物外，还发现了炭化稻、炭化橡子以及家猪、牛骨骼等，说明渔捞、农业种植、家畜驯养及采集等共同构成了遗址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

滇东北的昭鲁盆地以鲁甸野石山遗址为代表，遗址年代约合商周之交，出土石器有镞、刀、锛等，铜器为锛、锥等小件器，陶器数量众多，大型器物多见夹砂陶，小型器物多见泥质陶，陶色以褐色、灰色为多，其次为黑色，多为素面，部分器物器表磨光，杯口束颈条耳罐、大型盆口罐、泥质薄胎的小盆、折肩碗、长流类器共同构成了典型器物组合。此类遗存代表了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阶段。

此时期云南各区域文化基本自成一体，独立发展，这是与云南江河纵横、重山相隔的地理特性相一致的，但各区域间的互动交流仍有迹可循，同时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青藏高原东麓及东南亚大陆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尽管所发现的多为小件的青铜器，但可以确认，这一时期的人们已逐步掌握了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正是以此为基础，再通过不断吸收外来的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因素，云南青铜文化逐步成熟，并最终步入繁荣。

（2）从公元前500年前后即春秋末期开始，云南青铜文化的演化进程明显加快，直至西汉早中期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从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已趋于成熟，青铜兵器、工具逐步替代了石制品，青铜礼器、容器、饰品等大量涌现，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分工更为细致，社会分层日益明显，在不同文化因素持久的相融整合下，逐步形成了滇中、滇西、滇西南、滇东南等几个主要的相对稳定且自成一体的文化分布区。

古代文献与云南青铜时代相关的记载基本集中于这一时期，其中提到了滇、昆明、哀牢、句町等当时几个大的地方族群，如果说1956年石寨山墓地“滇王之印”的出土使我们开始确认了滇在滇中区域的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年来陆续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地望上的考量，也使得其他几个主要的文化区各自对昆明、哀牢、句町族群的印证日渐明晰。

滇的控制区域主要集中于以滇池、星云湖、抚仙湖为中心的滇中区域，就其发展程度而言，无论农牧业、手工业、祭祀礼仪、等级分化还是社会组织方面，都达到了云南青铜文明的最高阶段。已经过考古发掘的最具代表性的遗存主要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呈贡天子庙、澄江金莲山等墓地。

滇人的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些大、中型墓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部分墓葬还有腰坑。大、中型墓多发现有木质棺椁葬具，小型墓或仅有棺，或根本无葬具。大多为单人葬，但也有合葬的现象，如澄江金莲山墓地就发现有大量的多人叠葬墓。各墓地墓穴的分布多较为有序，应该有一定的规划。

滇人墓葬的随葬品种类极为丰富，且多显示出浓郁的本土色彩，主要包括青铜器、金银器、漆木器、玉石器、陶器以及铁器、铜铁合制器等，其中以青铜器最具代表性。青铜器从使用功能看，涉及工具、兵器、饰品、礼乐器、生活用品等诸多类别；大型墓中常见的鼓、贮贝器、执伞俑、编钟、枕、案等大型礼乐器体现出了极高的铸造工艺水平；器身上铸刻的各类纹饰、雕饰生动写实，所呈现出的耕作、仓储、畜牧、狩猎、纺织、乐舞、刑罚、战争、祭祀等等诸多场景内

容，极大丰富了我们对滇人现实社会生活的认知；玉石镶嵌、金银错、鎏金、镀锡等运用于青铜器上的装饰手法，同样令人对滇人精巧娴熟的工艺水准叹为观止。

滇人农牧业及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显示出社会分工的日益细致，同一墓地内部及不同墓地间明显的等级差异则表明了社会层级的严重分化，而大型青铜器冶铸所依赖的复杂工艺流程的执行、军事及祭祀等维系族群稳定手段的实施更需要凭借强大的组织管理及控制力，这些都反映出滇的社会结构已超越了一般的部落社会阶段，但石寨山与李家山甚至羊甫头等大致相同级别墓地共存以及部分墓地大、中、小型墓共存的现象，又说明滇族群尽管联系紧密，运转有序，但仍处于内部部族并立的状态，石寨山部族只是具有更强的影响力，还未形成绝对的稳定的威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滇应该是仅具备了一个早期国家的雏形，尚处于理论上的古国时期。

另外，还有一类主要分布于滇中以东的曲靖盆地的遗存较为特殊，尽管其墓葬随葬品如铜器、陶器等在组合、风格上显示出与滇中区域更多的共性，但同样在墓葬上的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如其墓葬形式是众多单个墓葬由早至晚持续垒叠成大土墩，一个墓地有一个或多个土墩；随葬品中，陶器基本组合鼎、罐、盘中的陶鼎不见于滇中区域，铜钹、动物面部纹圆形铜扣饰等也基本为本区域独有等。由此可以看出，此类遗存尽管与滇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但其所呈现出的地域特色也是明显的。此类遗存主人可能属与滇同为靡莫之属的劳浸族群。

滇往西去为昆明，昆明人当时主要活跃于广袤的滇西区域，且具备了相当的军事实力。不过从考古发现看，与《史记》中的记载也并不完全吻合，有些地方还是有一定出入的，如其生活生产方式定居农业与畜牧业兼有，并不都是"随畜迁徙，毋长处"，且社会分工、社会分层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较强悍的军事能力也表明了一定的族群内部组织控制力，并非处于一种"毋君长"的状态，只是社会组织结构上不像滇人那么严密、复杂而已。已经考古发掘的代表性遗存有楚雄万家坝墓地、祥云大波那墓地、祥云检村墓地等。

昆明人墓葬分土坑墓及石棺墓两类。土坑墓墓圹多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大、中型墓多带二层台，少数有腰坑；大型墓多有木质棺椁，仅大波那墓地1号墓为一具长方形仿悬山顶干栏式房屋建筑的铜棺，令人称奇；中型墓均有木棺但多无椁；大、中型墓中有一类棺为独木刳成，极具特色；小型墓多无棺椁。石棺墓多为长方形小型墓。从有骨骼发现的墓葬情况看，无论土坑墓还是石棺墓，葬式多为多人二次合葬。

昆明人墓葬的随葬品无论从种类还是精美程度上都无法和滇人相比，主要为青铜器，部分为陶器和其他质地的小件器物。青铜器中仅见少数大墓出有若干件鼓、编钟等高规格礼乐器，装饰品也不多见，相反兵器及工具占了极大比例，其中螺旋纹茎三叉格剑、饰"几"字形纹圆弧刃钺、饰孔雀翎纹骹口分叉矛、长方形锄等构成了其典型器物组合。

昆明再往西南为哀牢，从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哀牢人的控制区域主要集中于以今昌宁盆地为中心的滇西南区域，其影响范围达到了今缅甸北部一带，昌宁大甸山墓地、坟岭岗墓地等是其代表性遗存。

哀牢人墓葬主要有土洞墓及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两类，两类墓人骨保存状况均极差，葬式不明。土坑墓规模均不大，都未发现葬具痕迹，多随葬少量的小件器物，有些甚至没有随葬品。而土洞墓属哀牢人的高等级墓葬，目前主要发现于大甸山墓地的核心区域，该类墓是先从地表挖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再由坑底向一侧纵向挖出长方形土洞作为墓室，墓底由外向内倾斜，一般长3～4米，部分墓发现有木棺的痕迹；大多有随葬品，且较丰富，数量多的近30件（套），以青铜器居多，不见陶器；青铜器主要有兵器、礼器、工具和装饰品等类，有銎大弯刀、束腰大扁盒、牛角、桶形钏、靴形钺、螺旋纹茎三叉格剑构成了其典型器物组合，其中以有銎大弯刀和束腰大扁盒最具代表性，为其他区域所不见。

从考古发现看，句町的控制区域由今云南东南部直达广西西部及越南北部一带，至少在获封为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政治中心一直稳定在滇东南的今广南牡宜地区，目前云南已知的代表性遗存为广南牡宜遗址。

牡宜遗址发现有专门的高等级墓葬区，独立于平民墓区之外，估计为句町贵族甚至王族墓地。各高等级墓均有封土堆，从发掘的几座墓情况看，都是平地挖浅坑作为墓室，墓室面积近20平方米，墓底中部挖腰坑，并放垫木，其上置木质棺椁，椁外以青膏泥夹杂石块填封，部分墓带有墓道。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以青铜器（包括鎏金青铜器）、漆木器为主，另有铁器、金器、玉器等，种类包括了礼乐器、生活用具、装饰品、兵器等，既有典型的汉式器物，又有铜鼓、铜编钟、铜葫芦瓶等具浓郁土著特色的器物。

总之，这一时期云南几个大的族群总体运行在各自独立发展的轨道之上，不仅是政治割据，还处于一种明显的文化割据的状态，分别呈现出极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但同时，铜鼓等重要礼乐器的普遍流行，以及各族群文化因素中所零星闪现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又显示出彼此间一定程度的交流，当然来自于云南周边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是能明显感受到的。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的强势介入，云南自身土著文化因素迅速衰减，至东汉早期，汉文化因素彻底占据了主流，本土文化最终融入到了汉文化体系之中，云南的古代文明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 贵州地区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贵州一些商周时期遗存如威宁中水鸡公山、毕节青场瓦窑和沿河洪渡中锥堡遗址都发现有少量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装饰器和兵器等。生产工具有

锛、凿和锥等；装饰器有耳环、指环和手镯等；兵器仅见少量的镞。贵州青铜器的起始年代可早到商周时期，但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无论冶铸技术还是青铜器种类都处于严重的滞后状态。

战国早中期，可能受到北部四川盆地巴蜀青铜器的影响，威宁中水红营盘和赫章可乐等地出现仿巴蜀柳叶形剑、三角援直内戈为代表的兵器和以手镯、指环、带钩、发钗等为代表的装饰器，贵州高原局部地区青铜器取得一定进展，但器形古朴而粗糙，铸造技术虽有一定进步但仍不成熟。

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贵州高原为以夜郎为主体的“西南夷”族群活动时期，这时地处滇中高原以滇池为活动区的滇族群率先发展出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对包括贵州在内的周边族群青铜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秦灭巴蜀促使部分巴蜀居民南迁进入贵州，都促使贵州高原的青铜文明发展起来，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仅发现的青铜器器类和数量大为增加，而且铸造技术也基本成熟，已能制造出具有一定地域特征的青铜器，如赫章可乐的柳叶形剑、铜柄铜剑、人物图案纹戈、饰虎釜、鼓形釜、三足鎏金錾、簧首形发钗、琵琶形带钩、宽边镶绿松石手镯，威宁中水的带芒短剑、牛头形带钩、鱼形带钩和普安铜鼓山遗址的一字格曲刃短剑、“V”形銎钺、曲刃矛等均是极具地方风格的青铜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是贵州境内夜郎系地方青铜文明得以形成的时期。

西汉武帝时期，汉中央王朝掀起开发“西南夷”大潮，通过设置郡县、修筑道路和移民等措施，逐步将云贵高原纳入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迅速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构成和文化面貌，极具地域特色的夜郎青铜文明在汉文化大潮的冲击下迅即衰退，因而从西汉中晚期开始，汉文化系统的青铜器包括青铜容器、青铜杂器、铜镜和钱币等迅速增多，成为主要青铜器器类，到了东汉时期，汉文化系统青铜容器和各种模型明器完全取代了地域风格青铜器，贵州进入大一统华夏文化圈。

就出土地域来说，目前贵州发现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贵州北部及西部地区，并以贵州西部乌蒙山区为主体，具体说以安顺市、毕节市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最多最集中，其次是遵义市北部和贵阳市西南侧，而在贵阳以东包括铜仁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内的广大地区，目前仅在铜仁东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等与重庆、湖南相连地带零星出土有一些青铜器，绝大部分还是空白区。

5. 青海地区

目前，青海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时期遗址和墓地出土铜器近70件，其中50件出自黄河流域。大多数铜器发现于墓葬中，而遗址出土铜器数量明显少于墓葬。齐家文化铜器器形不大，常见装饰品和小型工具。以装饰品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主要是泡、环、镯、镜及其他饰物。铜器的种类有一定的地域差别，装饰品以黄河流域数量最多，如尕马台墓地、宗日墓地；小型工具仅发现于互助总寨齐家文化墓葬。

辛店文化时期铜器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种类也较为丰富，新出现了铃、镂孔牌饰等器物。铜器器形不大，制作比较简单，流行泡、铃、镂空牌饰等装饰品。

到了卡约文化时期，青铜器已非常普遍，地域发展特点更加突出。从数量来看，湟水流域可能稍多于黄河流域；从种类来看，湟水流域略显丰富，像杖首、矛、斧、棒等多发现于湟水流域；一些器形较大、制作精美的铜器，如鸟形铃杖饰、饰羊戈、动物牌饰、狗、鸠首牛犬权杖饰等出自湟水流域。卡约文化青铜器也保留了齐家文化的传统，仍以兵器、小型工具、装饰品为主，但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数量大幅增加，已发现近千件铜器；种类也更加多样，兵器和小型工具除刀与锥外，还新增矛、钺、戈、斧、镐、管等，其中管銎式斧、钺、镐与北方系青铜器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斧、戈等与中原文化影响有关。装饰品非常发达，联珠铜饰、泡、铃数量多；杖首、鸟形铃杖饰等仪仗类铜器颇具地域特色。铜器装饰手法多样，有圆雕、浅浮雕、透雕等，装饰图案大致分为动物和几何纹样两大类，以鸟、鹰、鹿、牛、羊、蛇等动物形象最具特色，写实性强。

相对青铜时代而言，日用器增多、实用性增强是两汉铜器的突出特点，但仍表现出以饰品、小型兵器为主的文化传统。炊食器、酒器、水器等容器开始随葬于墓葬中。但与中原地区相比，青铜容器不甚发达。熏炉、勺、案几、灯、砚滴等日用类铜器，数量不足10件。装饰类铜器较丰富，可细分为带钩、带扣等服饰器和簪、镯、环等人体装饰器。最早出现于齐家文化的铜镜，成为最常见的铜器之一，出土60多面，有与卡约文化形制基本相似的护心镜，也有连弧纹镜、四乳四螭镜、四神规矩纹镜、龙虎纹镜、变形兽面镜等汉式镜。乐器仅发现铎和铃。兵器以弩机最多，还有少量的镞、长刀、剑等。新出现车马器，但未发现完整的车马遗存，仅在墓葬中发现数量较多的辔、盖弓帽、轭饰、辕饰、游环、当卢、衔镳等配件。铜印近10枚，其中官印3枚。著名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是目前青海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匈奴印。青铜塑像以动物塑像较常见，如马、牦牛、熊形灯、蛇首琵琶形带钩、鸭形饰等。装饰技法多样，鎏金、错金银、镂刻等工艺得到广泛使用；纹饰内容以几何纹和动物纹为主；铅锡青铜最常见，系铸造加工而成，但冶铸技术水平不高。

目　录

1. 牌饰……1
2. 牌饰……1
3. 尊……2
4. 尊……3
5. 尊……4
6. 尊……5
7. 尊……6
8. 罍……7
9. 罍……8
10. 铃……9
11. 铃……9
12. 钺……10
13. 戈……10
14. 面具……11
15. 面具……11
16. 面具……12
17. 面具……13
18. 人首像……14
19. 人首像……15
20. 人首像……16
21. 人首像……17
22. 人首像……18
23. 人首像……19
24. 金面罩人首像……20
25. 金面罩人首像……21
26. 跪坐人像……22
27. 跪坐人像……23
28. 跪坐人像……23
29. 顶尊跪坐人像……24
30. 持璋跪坐人像……24
31. 兽首冠人像……25
32. 立人像……26
33. 人身鸟足人像……27
34. 兽面……28
35. 兽面……28
36. 神树……29
37. 神坛……30
38. 爬龙柱形器……31
39. 鸡……32
40. 鸟……32
41. 太阳形器……33
42. 套环贝……33
43. 鱼形箔饰挂架……33
44. 不知名器……34
45. 觯……35
46. 觯……35
47. 罍……36
48. 罍……37
49. 罍……38
50. 罍……39
51. 罍……40
52. 罍……41
53. 罍……42
54. 罍……43
55. 戈……44
56. 戈……44
57. 戟……45
58. 矛……45
59. 圆鼎……46
60. 釜甑……47
61. 鉴……48
62. 鉴……48
63. 匕……49
64. 壶……50
65. 壶……51
66. 壶……52
67. 壶……53
68. 壶……54
69. 缶……55
70. 钲……56
71. 钺……57
72. 钺……57
73. 戈……58
74. 戈……58

75. 戈……59
76. 戈……59
77. 戈……60
78. 戈……60
79. 矛……61
80. 矛……61
81. 矛……62
82. 矛……62
83. 环首刀……63
84. 带鞘双剑……63
85. 剑……64
86. 剑……64
87. 镞……65
88. 镞……65
89. 斧……66
90. 斧……66
91. 斤……67
92. 凿……67
93. 刻刀……68
94. 刻刀……68
95. 锯……69
96. 带钩……69
97. 带钩……70
98. 带钩……70
99. 印……71
100. 印……71
101. 印……71
102. 印……72
103. 印……72
104. 印……72
105. 壶……73
106. 盉……73
107. 壶……74
108. 洗……75
109. 炉……76
110. 牌饰……77
111. 牌饰……77
112. 车马……78
113. 戈……79
114. 镦……79
115. 圆鼎……80
116. 釜甑……81
117. 鉴……82
118. 敦……82
119. 器座、豆、夹组合……83
120. 勺……84
121. 枓……84
122. 尊……85
123. 壶……86
124. 壶……86
125. 壶……87
126. 壶……88
127. 壶……89
128. 缶……90
129. 缶……91
130. 编钟……92
131. 甬钟……94
132. 钲……95
133. 钲……95
134. 錞于……96
135. 钺……97
136. 戈……97
137. 戈……98
138. 戈……98
139. 戈……98
140. 戈……99
141. 戈……99
142. 戈……99
143. 矛……100
144. 矛……100
145. 剑……101
146. 剑……101
147. 剑……102
148. 剑……102
149. 剑……103
150. 车軎……104
151. 车軏帽……104
152. 泡……104
153. 泡……104
154. 銮铃……105
155. 带钩……105
156. 印……105
157. 圆鼎……106
158. 釜……106
159. 釜……106
160. 壶……107
161. 壶……108
162. 壶……109
163. 盉……109
164. 炉……110
165. 炉……111
166. 炉……112
167. 灯……113
168. 灯……113
169. 灯……114
170. 灯……115
171. 卮……115
172. 书刀……116

173. 镂空棺饰……116
174. 马俑……117
175. 牵马人俑……118
176. 鼓……119
177. 壶……120
178. 杯……121
179. 镈钟……122
180. 编钟……122
181. 鼓……123
182. 钺……124
183. 钺……124
184. 钺……125
185. 钺……125
186. 狼牙棒……126
187. 剑……126
188. 弯刀……127
189. 箭箙……128
190. 臂甲……129
191. 线盒……130
192. 棺……131
193. 案……132
194. 案……133
195. 枕……134
196. 头箍……135
197. 扣饰……135
198. 扣饰……136
199. 扣饰……136
200. 圆鼎……137
201. 壶……138
202. 瓶……139
203. 杯……139
204. 贮贝器……140
205. 贮贝器……141
206. 贮贝器……142
207. 贮贝器……143
208. 贮贝器……144
209. 贮贝器……145
210. 贮贝器……146
211. 贮贝器……147
212. 贮贝器……148
213. 贮贝器……149
214. 贮贝器……150
215. 贮贝器……151
216. 鼓……152
217. 鼓……153
218. 鼓……154
219. 鼓……155
220. 鼓……156
221. 钺……157
222. 钺……157
223. 钺……158
224. 钺……158
225. 钺……159
226. 钺……160
227. 钺……161
228. 戚……162
229. 戚……163
230. 戚……164
231. 戚……165
232. 戚……166
233. 戈……167
234. 戈……167
235. 戈……168
236. 戈……168
237. 戈……169
238. 戈……169
239. 矛……170
240. 矛……170
241. 矛……171
242. 矛……171
243. 矛……172
244. 矛……172
245. 矛……173
246. 镦……173
247. 剑……174
248. 剑……174
249. 剑鞘……175
250. 剑鞘……175
251. 剑鞘……176
252. 剑鞘……176
253. 剑鞘……177
254. 弩机……177
255. 叉……178
256. 叉……178
257. 棒槌……179
258. 棒槌……179
259. 棒槌……180
260. 狼牙棒……180
261. 斧……181
262. 斧……181
263. 斧……182
264. 斧……182
265. 斧……183
266. 斧……183
267. 铲……184
268. 铲……184
269. 锄……185
270. 锄……185

271. 锄……186
272. 锄……186
273. 锄……187
274. 锄……187
275. 锄……188
276. 啄……188
277. 啄……189
278. 啄……189
279. 灯……190
280. 灯……191
281. 网状器……191
282. 人俑……192
283. 人俑……193
284. 人俑……194
285. 人俑……195
286. 杖头饰……196
287. 杖头饰……196
288. 杖头饰……197
289. 扣饰……198
290. 扣饰……198
291. 扣饰……199
292. 扣饰……199
293. 扣饰……200
294. 扣饰……200
295. 扣饰……201
296. 扣饰……201
297. 扣饰……202
298. 扣饰……202
299. 扣饰……203
300. 扣饰……203
301. 扣饰……204
302. 扣饰……204
303. 扣饰……205
304. 扣饰……205
305. 扣饰……206
306. 扣饰……206
307. 扣饰……207
308. 扣饰……207
309. 扣饰……208
310. 扣饰……208
311. 扣饰……209
312. 扣饰……209
313. 扣饰……210
314. 扣饰……210
315. 扣饰……211
316. 扣饰……211
317. 人物屋宇……212
318. 镇……212
319. 马俑……213
320. 錞于……214
321. 钺……215
322. 剑……215
323. 圆鼎……216
324. 釜……217
325. 壶……218
326. 盉……219
327. 鼓……220
328. 戈……221
329. 剑……222
330. 剑……222
331. 带钩……223
332. 带钩……223
333. 带钩……224
334. 带钩……224
335. 壶……225
336. 樽……226
337. 罐……227
338. 灯……228
339. 灯……229
340. 车马……230
341. 矛……231
342. 鬲……232
343. 钺……233
344. 戈……233
345. 斧……234
346. 镐……234
347. 杖饰……235
348. 杖饰……235
349. 牌饰……236
350. 印……236
351. 甗……237
352. 豆……238
353. 印……239
354. 印……239
355. 牦牛饰……239
356. 灯……240
357. 马俑……240

1. 牌饰

商代

长14、宽4.9～5.3、厚0.2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87GSZJ：16），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近长方形，两侧上下各有一半环形穿纽。平面微弧似瓦，满布两列十个首尾相接对称的“S”形镂孔，“S”形镂孔两侧各有一个小三角形镂孔。



2. 牌饰

商代

长13.8、宽5.2～5.6、厚0.1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87GSZJ：36），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近长方形，一端呈圆弧状，两侧上下各有一半环形穿纽。平面微弧似瓦，正面纹饰整体形似树枝，各枝均有似叶芽的勾连纹，中部菱形区域各嵌饰圆圈纹，使菱形区域形似眼睛。纹饰空隙内镶嵌绿松石碎块。两面残留细线织物和竹编印痕。



3. 尊

商代后期

残高43.3、圈足高12、肩径32、圈足径21.6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K1：158、K1：25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敞口，口沿残，束颈，斜肩较宽，深腹，腹壁斜向内收，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以云纹为地，三个高浮雕兽首将肩三等分，兽身平雕，呈蛇形，尾上卷；腹部纹饰被三个与肩部兽首对应的扉棱分隔成三个单元，均饰浮雕兽和人，兽首“臣”字形目，大耳，双身延展下卷，尾上扬，人位于兽首下，屈臂上举，双腿下蹲；圈足上部有三个“十”字形镂孔和三周凸弦纹，下饰短扉棱相隔的三组兽面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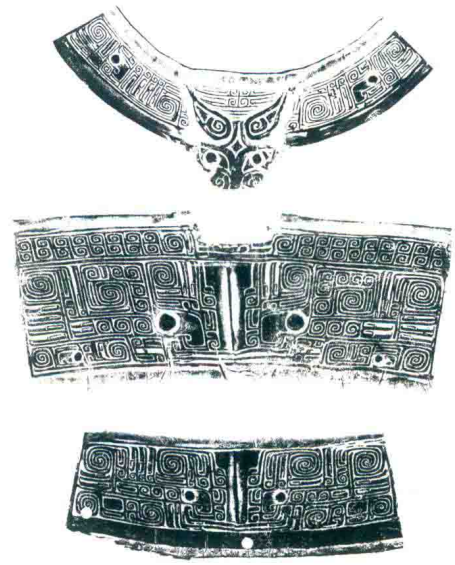
4. 尊

商代后期

通高31.4、圈足高8.4、口径34、肩径25.7、圈足径19.8厘米，重4.14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12），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敞口，方唇，束颈，窄斜肩，直腹微内收，高圈足。颈下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饰三个等距离的浮雕兽首，其间以云雷纹为地饰兽面纹；腹部以三条与肩部兽首对应的扉棱为界分为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内饰以云雷纹为地的兽面纹，兽面为“臣”字形目，身平展，尾上扬内卷，有尾羽；圈足上部有三个长方形镂孔，其下亦饰以扉棱间隔的三组兽面纹，下部有六个圆孔。器表涂抹朱砂。





5. 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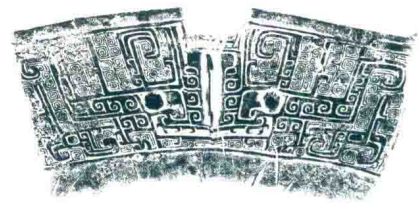
商代后期

通高44.2、圈足高14.3、口径41.5、肩径29、圈足径24厘米，重10.2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79），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敞口，方唇，束颈，斜肩，直腹微内收，高圈足。颈下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三组夔龙纹以高浮雕兽首为界，夔龙纹中部各饰一高浮雕立鸟；腹部纹饰亦分为三组，每组以扉棱为界，各组纹饰以云雷纹为地，其上饰兽面，“臣”字形目，大张口，躯干平展，尾上扬内卷；圈足三个扉棱与腹部扉棱和肩部立鸟对应，其间饰兽面纹，肩部兽首与腹部、圈足的兽面纹对应成一线。器表涂抹朱砂。









6. 尊

商代后期

通高41.6、圈足高12.6、口径40.4、肩径28.8、圈足径22厘米，重8.2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2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敞口，方唇，束颈，斜肩较窄，腹部微斜内收，高圈足。颈下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饰三个高浮雕卷角羊首，其间各饰一高浮雕立鸟和细线兽面纹；腹部饰三组以云雷纹为地的兽面纹，兽面为“臣”字形目，柱鼻，卷眉，口大张，躯干简化，以扉棱为界；圈足上部饰两周凸弦纹，下部纹饰的内容、布局与腹部相同。器表涂抹朱砂。



7. 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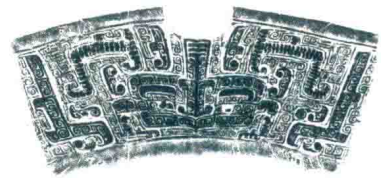
商代后期

通高45.5、圈足高13.2、口径42.6、肩径28、圈足径23.1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29），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敞口，方唇，束颈，斜肩，腹部斜向内收，高圈足。颈下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饰龙纹，以三个高浮雕羊首为界，羊首为圆目，卷角，羊首之间各饰浮雕立鸟；腹部以三个扉棱为界饰以云雷纹为地的兽面纹，兽面为圆目，卷眉，大角，躯干简化；圈足上部饰一周凸弦纹和三个长方形镂孔，下部纹饰与腹部纹饰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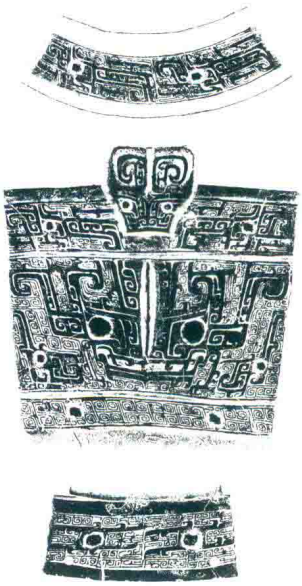
8. 罍

商代后期

通高35.4、口径20.3、圈足径18.6厘米，重4.22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8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窄沿微折，方唇，直颈微束，斜肩微鼓，深腹，腹壁微弧，圈足较高。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四组龙纹，间以四个高浮雕卷角兽首；腹部纹饰自上而下分三部分，上部为龙纹，中部为兽面纹，下部为目云纹；圈足饰以云雷纹为地的目纹；肩部、腹部、圈足均有四条分别对称成一线的扉棱，将纹饰等分为四组；肩部的浮雕兽首、腹部兽面纹的中心基本对应；兽面为“臣”字形目，以云雷纹为地。器表涂朱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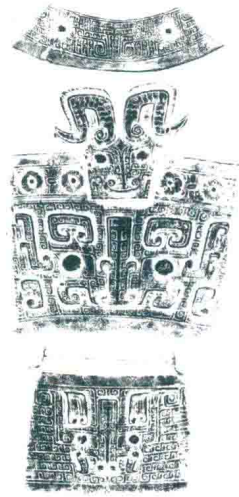
9. 罍

商代后期

通高54、口径26.5、圈足径24.6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59），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形，体高瘦，窄沿微折，方唇，直颈微束，斜肩微弧，深腹，直腹微内收，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以高浮雕兽首为界饰四组兽面纹，兽首圆目，大卷角，兽首之间分铸四个浮雕立鸟；腹部纹饰分两部分，上部为涡纹，下部为兽面纹；圈足上部饰一周凸弦纹和四个长方形镂孔，下部饰兽面纹；腹部、圈足均有四条扉棱，将纹饰等分为四组，扉棱与肩部立鸟和圈足镂孔对应成一线。





10. 铃

商代后期

通高7.6、通宽8.6、顶部横径5.7、顶部纵径3.5、口部横径8.6、口部纵径4厘米，重202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70-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口呈喇叭形；身近合瓦形，平顶，上有一半圆形纽，纽下有二小圆孔；内顶无梁。舌无存。铃身每面各有一虎头形纹饰，圆目，眼角下垂，口大张，露出六枚方形齿，下端二枚獠牙互相咬合。



11. 铃

商代后期

通高14、通宽8.1、顶部横径7.6、顶部纵径3、口部横径6.7、口部纵径3.6厘米，重373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03-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造型呈鸟首状，身横截面近枣核形；鸟首勾喙，大环眼，额上有浅冠；鸟颈部饰羽状纹，前后各有一条羽状翼；顶部有一环形纽，纽上套“8”字形链环；铃舌呈獠牙状，铃舌上端呈圆环形，与顶部的环纽相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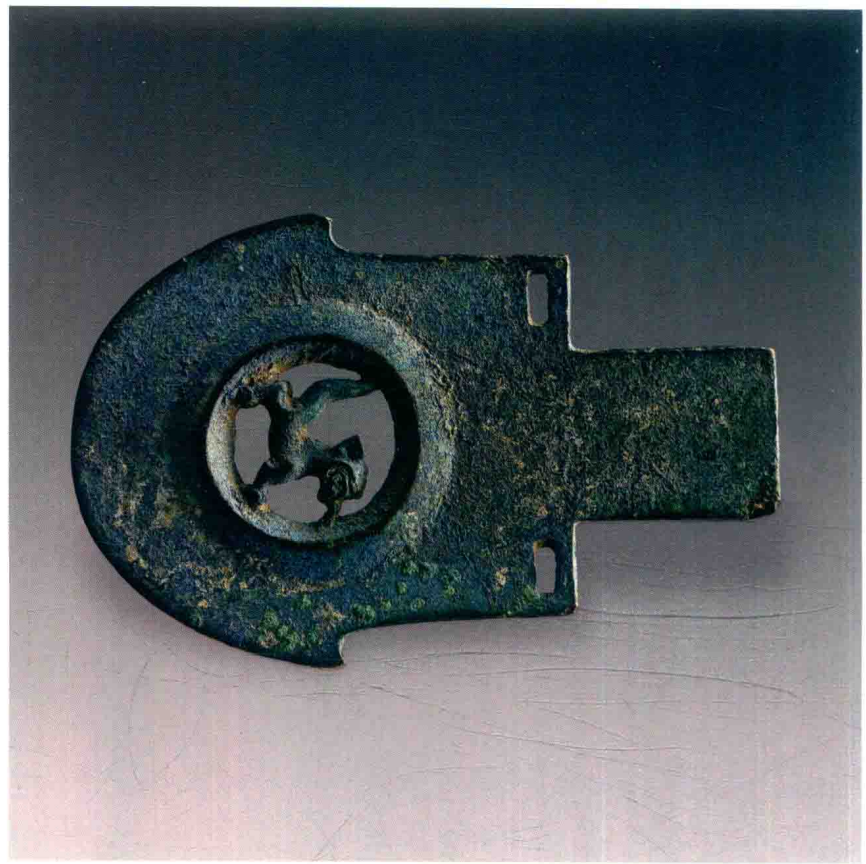
12. 钺

商代后期

通长16.2、内长4.7、穿长1.2、刃宽10.5、腰宽8.5、内宽4、穿宽0.5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阆中市彭城镇，现藏于阆中市博物馆。

长方形内，弧刃两端微上卷，方肩，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穿。刃部中央有一个圆形穿孔，孔内饰透雕张口虎纹。



13. 戈

商代后期

通长20.9、援长14.8、内长6.1、阑宽5.8、内宽3.5厘米，重73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144-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援呈细长的等腰三角形，中部有凸起的脊线，脊线末端有一个小圆穿；两刃略呈波浪线状；援本部两侧出阑，阑呈矩形；长方形内。







14. 面具

商代后期

通高26、通宽40.8、厚0.4厘米，重6.05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60），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面呈方形；大眼突出，呈三角形；粗横眉，眉间额部有一个方孔，眉梢末端各有一个长方形穿；蒜头鼻；阔口；长耳，耳郭中空，耳垂各有一个圆孔；面具后缘下转角处各有一个方穿。

15. 面具

商代后期

通高15.4、通宽18.2、厚0.3厘米，重1.09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331），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面呈长方形；大眼突出，呈三角形；粗横眉；蒜头鼻；阔口；长耳，耳垂各有一圆穿；面具后缘下转角处和下颌部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眉毛、眼睛、眼眶均涂黑彩。

16. 面具

商代后期

通高82.5、面具高31.5、通宽77.4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42），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面部略呈倒梯形；圆柱形眼，大而凸出；粗横眉；蒜头鼻；阔口；大耳横向展开，耳上以阴线勾勒耳郭；额头正中有一个方孔，孔内补铸一高68.1厘米的龙形额饰；龙头与面具的鼻梁衔接，龙身、尾高高竖起穿；额头两侧、下颌两侧各有一个方形穿孔；两耳后侧各有三个小穿。





17. 面具

商代后期

高66、宽138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4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方颐；刀眉；眼球呈圆角方柱体凸出眼表；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嘴角上翘；耳郭外展。眉、眼描黑色，口涂朱砂。额正中有方形穿孔，推测有额饰。面具后侧上、下各有一方形穿孔，耳、眼分别铸造，再与面部合铸而成。

18. 人首像

商代后期

残高25、头纵径15、头横径14.2、宽20.4厘米，重3.36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K1：6），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头顶为子母口，其上发、冠不存。子母口上有四个小圆孔，两前两后，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颈前后均被火烧残。



19. 人首像

商代后期

通高45.6、头纵径16、头横径12.5、通宽22厘米，重4.54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K1：5），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头顶，头似戴双角形头盔。脑后露发线，后脑勺处有一凹孔，似为插发笄用。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颈下部的倒三角形尖角保存较好，前短后长。



20. 人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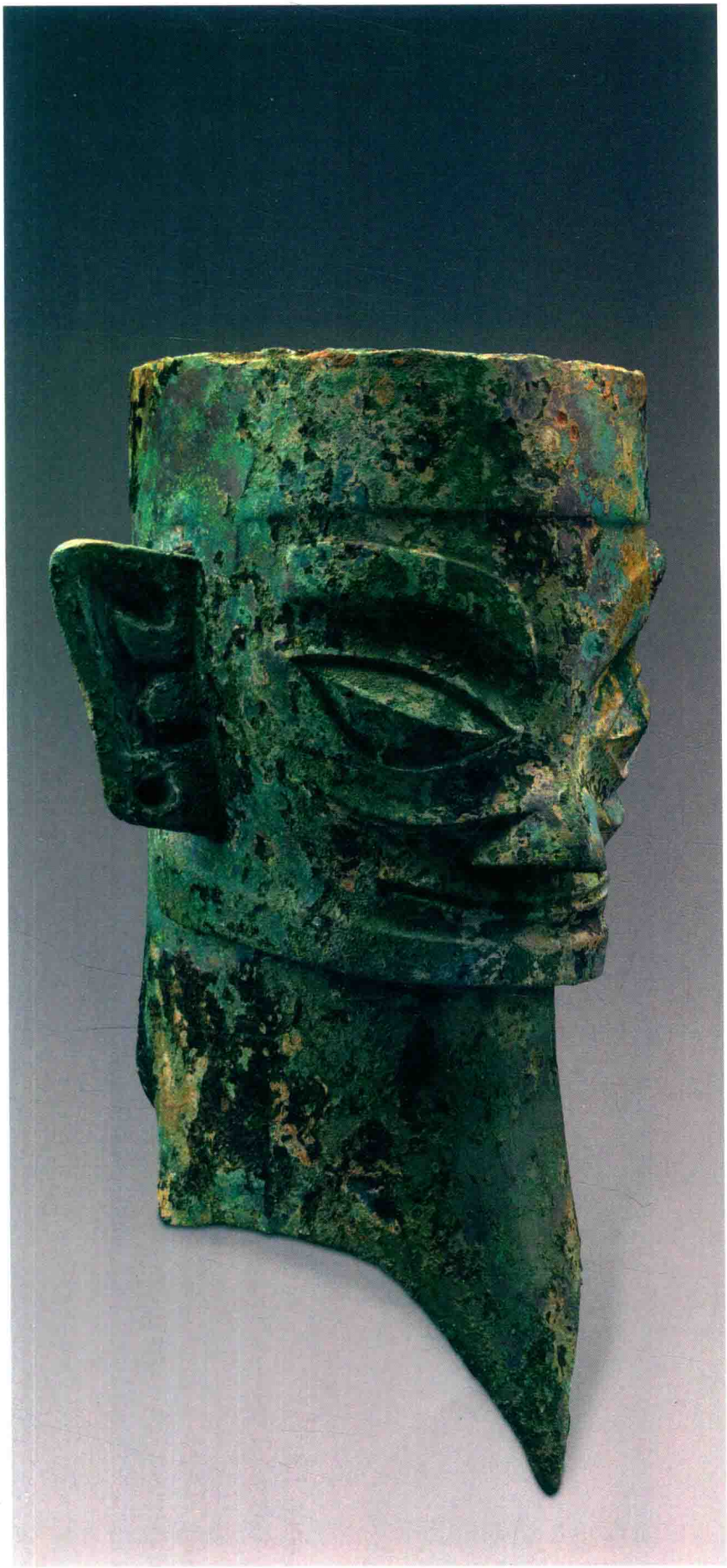
商代后期

通高13.6、头纵径7.3、头横径7.4、通宽10.8厘米，重710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83），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顶，头戴辫状头箍。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蒜头鼻，阔口，嘴角紧抿，圆耳，耳郭丰厚，外缘上钻有三圆孔。颈部保存较好，前下端铸成锐角，后下端平。头顶盖与颅腔分铸后焊接而成。





21. 人首像

商代后期

通高37.4、头纵径19.4、头横径17、通宽26.4厘米，重6.72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K1：11），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平顶。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长方耳，耳垂有穿孔。辫发。

22. 人首像

商代后期

通高34.8、头纵径13.7、头横径10.6、通宽17.2厘米，重2.081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90），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平顶戴冠，冠饰回形纹。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辫发，颈下部的倒三角形尖角保存较好，颈两侧各有一圆孔。头顶盖与头像分铸，头后部有因铸造缺陷而补铸的痕迹。



23. 人首像

商代后期

通高51.6、头纵径18.3、头横径14.6、通宽23.8厘米，重5.8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5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顶，束发，脑后戴发饰。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眉毛、眼眶绘黑彩，耳孔、鼻孔、口缝均涂朱砂。颈粗而长，下端前后铸成倒尖角，前短后长。发饰分铸后焊接。





24. 金面罩人首像

商代后期

通高42.5、头纵径14.5、头横径12.6、通宽19.6厘米，重2.55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45），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金面罩基本保存完好。平顶，辫发。面部较瘦削，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颈直，颈下端前后铸成倒尖角。面罩用纯金皮捶拓而成，上齐额，下包颐，两侧过耳，仅眉、眼外露。

25. 金面罩人首像

商代后期

通高45.8、头纵径17.8、头横径15、通宽22.4厘米，重4.5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3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圆顶，额上及鬓角有凸弦纹，束发，脑后有一发簪，上、下端均残缺。面部较瘦削，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颈直。金面罩仅存右额及左脸部分，残存部分与额部凸弦纹平齐。







26. 跪坐人像

商代后期

通高14.6、宽8.2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K1：293），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脸宽圆，头发向后卷起，细眉，圆眼，张口，露齿。着右衽交领长袖短衣，腰间系带。正襟跪坐，双手放于膝上，左右手各戴二镯。

27. 跪坐人像

商代后期

通高12.4、宽5.8厘米，重70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05），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头戴颞形装饰，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跪坐。身穿对襟长袖衣，下未及膝，腰间系带两周，双手置于腹前。



28. 跪坐人像

商代后期

通高13.3、宽5.5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4），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头戴颞形装饰，面部轮廓突出，刀眉，双目呈倒三角形，目下颧骨肌线夸张，直鼻，阔口，嘴角紧抿，长方耳，耳垂有穿孔。右腿侧跪，膝盖向左，左腿半立。身穿对襟长袖衣，下及膝盖，腰间系带两周，双手置于腹前。眉、眼眶、眼球及鬓部均涂有黑彩。





29. 顶尊跪坐人像

商代后期

通高15.6、座高5.3、底座直径10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4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喇叭形座，周围花纹镂空，并饰有三个等距的云状短扉棱，底座圈下有三个等距的小支钉，扉棱与支钉相间。座顶平，上跪一人，上身赤裸，腰间系带，下身着未及膝的短裙。头顶尊，双手上举扶尊。尊上扣有喇叭形盖，盖顶残。喇叭形座与顶尊人像分铸后焊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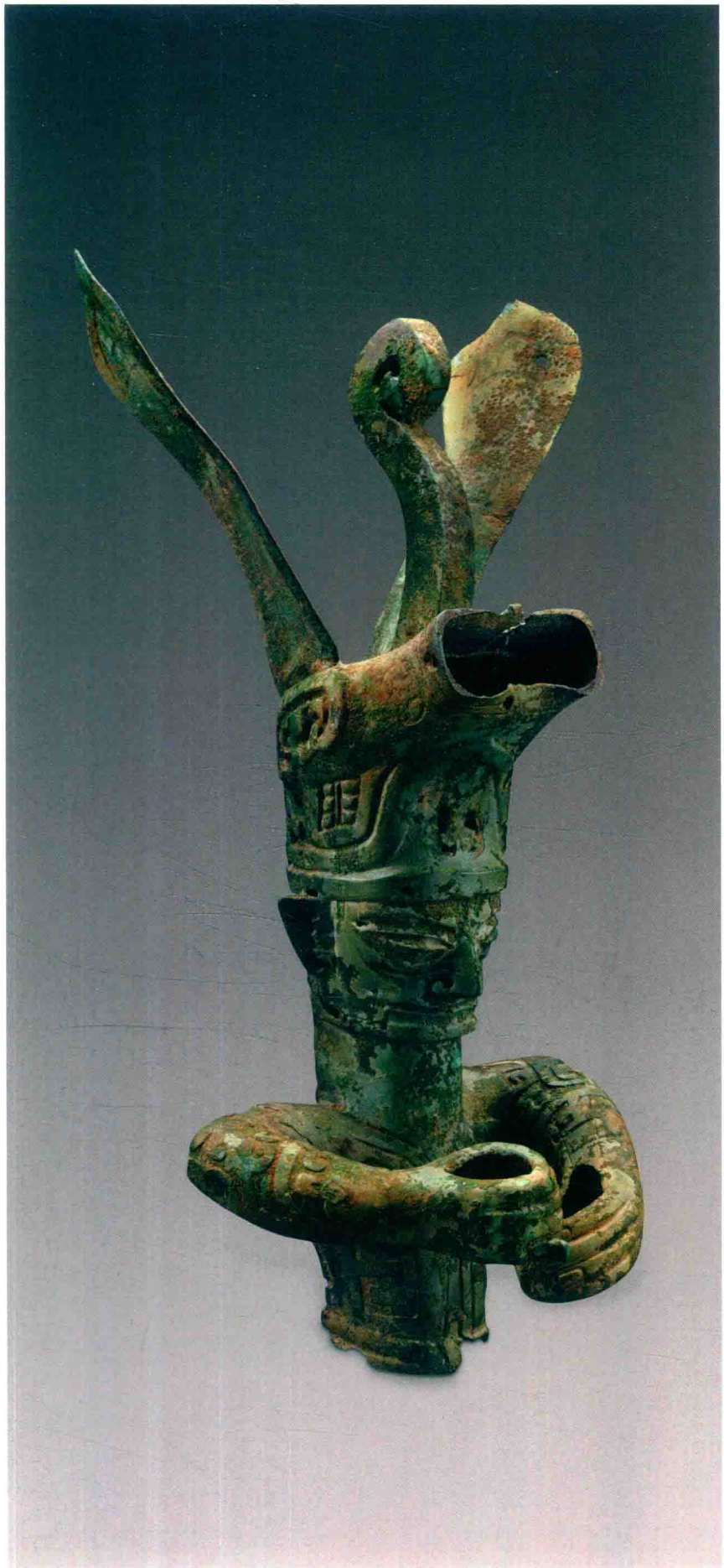
30. 持璋跪坐人像

商代后期

高4.7、宽1.8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325），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头残，上身赤裸，下身着短裙，跪坐，双臂平伸，两手交握一璋。璋射首分叉，长锋向外，短锋向内。



31. 兽首冠人像

商代后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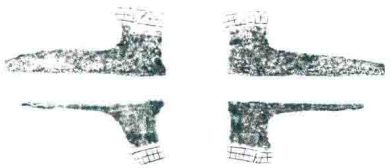
残高40.2、耳高16、两耳宽23.2、两肘宽18.4厘米，重3.046千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264），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仅存人像上半身。人像头戴兽首状冠，冠顶两侧兽耳耸立，中间有一象鼻状装饰物。人像面部轮廓突出，凸目，耸鼻，阔口，大耳。两臂平伸，双手握成圈形，右手位置偏高，与肩相平，左手置于左胸前。人像身穿对襟衣，衣上饰云雷纹，袖饰夔龙纹，腰间系带两周，在腹前打结。











32. 立人像

商代后期

通高260.8、人像高180、座高80.8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149、K2②:150），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由人像和像座两部分组成。大立人像身躯细长而挺拔。头戴“回”字纹冠，双臂伸出，手臂粗壮夸张，双手握成圈形，右手齐下颌，左手接近腋下。身着三层衣，最外层左袒，纹饰为龙纹和横向鹳鸟纹。中衣较外衣短，背后左肩露简化龙纹。内层衣最长，V形领，饰回纹和简化鹳鸟纹。衣服均开叉于右侧。佩绶带一条，从右肩绕过左腋，结结于后背。像座分为两部分，上部为龙纹案，下部为座基。座基素面无纹，其上为四角四龙卷鼻托案。人像手臂分铸，像身分为三段铸造。左右足底各有一卯凸，与像座相嵌，龙纹案也有卯凸，与座基相嵌。

33. 人身鸟足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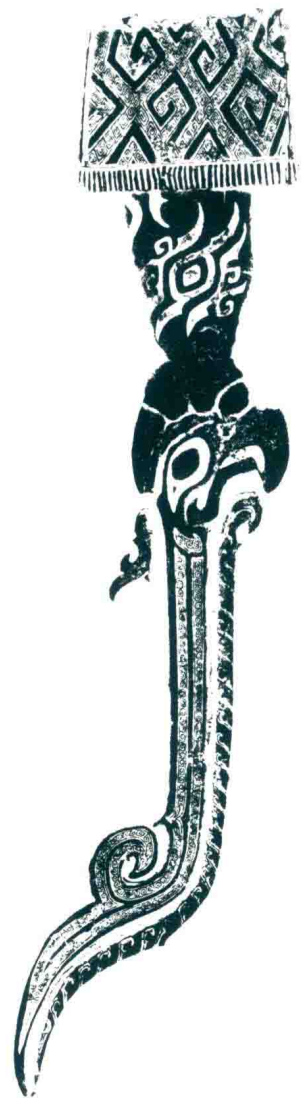
商代后期

通高81.4、人像残高30、鸟高51.4、通宽10.8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32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人像上半身及鸟的尾端残缺无存，人像下身着紧身裙，裙饰几何形云雷纹。两腿胫部饰阴刻花纹，花纹中填以黑彩。双足形如鸟爪，踏于鸟首之上。鸟形抽象，鹰喙，分尾。鸟身两侧各饰双列云雷纹，颈、腹前有一列长扉直达尾尖，扉上饰有羽纹。鸟爪形足以嵌铸法与鸟的头部铸造在一起。裙裾及鸟身纹饰上均涂有朱砂。







34. 兽面

商代后期

高20.4、宽23.4、厚0.2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22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器形薄片状。头有冠，长眉，眉末梢上卷，大眼圆角方形，鼻挺直，阔口露齿，嘴角下抿。颌下有相向的一对夔龙承托。额部及下颌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

35. 兽面

商代后期

高21.6、宽39、厚0.2厘米，重545克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228），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器形薄片状。造型简化。有冠，长眉，末端上卷，大眼，鼻简化成线，阔口露齿，嘴角下抿。无耳。龙尾两侧及下颌两侧各有一小圆孔。眼部以黑彩勾勒线条上。



36. 神树

商代后期

通高396、树干残高359、底座直径92.4～93.5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②：94），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底座由圆形座圈上三个山状拱形构成。座顶上为树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套铸有三层树枝，每一层出三枝。其中第二、三层树枝之下树干上铸有镂空的炯纹圆环。树尖在一圆环之上生一花朵，顶端残缺。每层树枝均从树干分出，中间的树枝（主枝）有两枝下垂的枝条，一枝向上；两侧的树枝（侧枝）只有一枝下垂和一枝向上的枝条。枝条均末端有花，向上枝条的花朵上立有一鸟。树干上一龙沿树干蜿蜒而下，前足落于座圈上。座圈、山状拱形分别铸造后焊接成底座。树干由三段套接而成，分枝处另有分枝套，侧枝和主枝都插在套内。绳索状龙身呈波形弯曲，胸、腹、尾各有一支钉嵌于树干上。





37. 神坛

商代后期

残高53.3、兽由蹄至角顶高15.8、立人高11.2、底座直径22.1、兽前吻至后尾长21.2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296），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由兽形座、立人座、山形座和盝顶建筑四部分组成。兽立耳，独角向前内卷，蹄足。中空，前后肘及尾部纹饰镂空。立人双臂平抬于胸前，双手呈抱握状，手中各握一藤条状物。头戴敞口方斗形帽，帽顶伸出扁平的侧面人头像。身体成蛇形，压于山形座之下。山顶为盝顶建筑，方斗形，每面中间部分镂空，内铸一排大小、造型相同的跪坐人像。建筑正面铸鸟身人面像，顶部四角各立一鸟，双翅上扬，头有冠，冠以上部分残。



38. 爬龙柱形器

商代后期

柱高41、宽18.8、柱上端最大直径9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K1：36），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椭圆形柱，顶斜平。柱顶铸一龙，前爪趴于柱顶上，身尾下垂于柱侧，后两爪紧抓柱两侧，尾上卷。龙头有下卷的大耳一对，耳内侧有犄角一对。和龙相对应的柱壁另一侧有一简化的夔形饰。

39. 鸡

商代后期

通高14.2、长11.7、方座边长2.5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10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器形和纹饰均为写实。昂首引颈，羽翼丰满，造型生动，立于“门”字形方座上。





40. 鸟

商代后期

通高27.8、宽15.4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301-3），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立鸟状，双爪置于一圆形立座上。座中空，顶部隆起，腰部内凹处有四个小圆孔，应系某器物之顶部。鸟昂首向前，尖喙，喙上有一个穿孔，身长，羽翅与尾羽相并，末端微上扬，另有一支羽翅下折。背部立一支羽翅，下端微上卷，上端歧出三支，端部呈桃形，各有一个圆孔。

41. 太阳形器

商代后期

高6.5、直径84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1），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形似太阳，由中心凸起的圆形太阳向外放射五道光芒，最外圈为晕圈。素面无纹，阳部中心及晕圈连接芒端处有小圆孔。晕圈和芒分五部分分别铸造，每部分均含一道芒及一段晕圈，大致呈“T”字形，之后再将各部分和阳部合铸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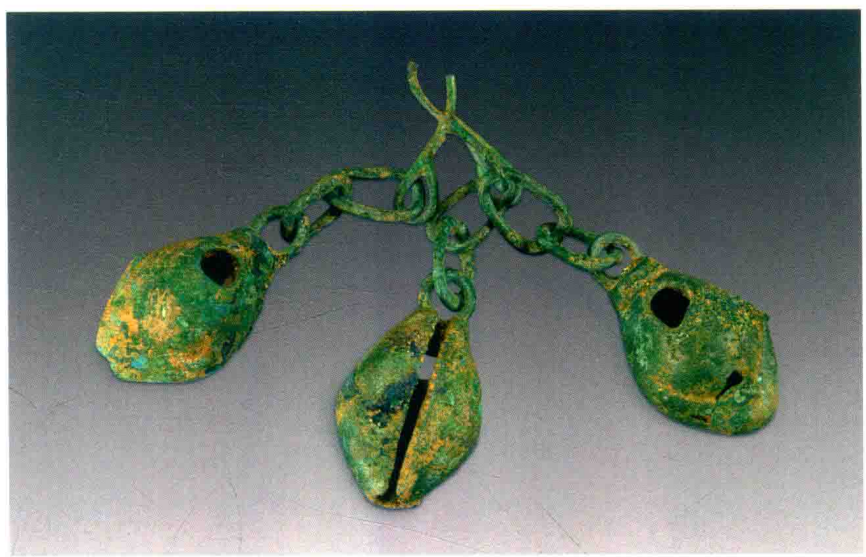
42. 套环贝

商代后期

环索长8、贝长6.3、宽3.4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103-2），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由三枚铜海贝、三条环索和一个并联三环扣组成。环索由两环纽扣连。海贝上端有环纽，与环索相扣。海贝仿自真实海贝，穿孔。



43. 鱼形箔饰挂架

商代后期

挂架高3.6、直径3.5厘米，鱼形箔饰残长6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194-61），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挂架主体为一圆圈，圆圈之上为三叉提梁，圆圈上套三个“8”字形环纽，其中两个环纽下端悬挂鱼形箔饰，其一仅存头部，其一残缺尾部。



44. 不知名器

商代后期

通高46.4、上宽17.6、下宽17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K2③：103-27），现藏于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

器用不明。先后有人身形铜牌饰、剑鞘等用法推测，目前尚无定论。器身由两组鹳鸟纹组成，上三下二。上面伸出两柄。





45. 觶

西周

高15.8、长径11.7、短径9.9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颈腹间及圈足处各饰一周变体夔纹带。内底有铭文“牧正父己”四字。



46. 觶

西周

高13.7、长径9.2、短径7.6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腹上部饰一周双卷云纹，内底有铭文“覃父癸”三字。



47. 罍

西周

通高50、口径17.5、腹径23.9、足径18.8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盖饰立体昂首蟠龙，角上出枝杈，形似“十”字，前足踞于盖顶，盘尾为盖。器身直口，束颈，鼓腹，圈足。肩上浮雕卷身夔龙，口下有小夔纹。肩两侧一对兽首衔环耳，双耳间饰羊首。肩、腹以宽弦纹带分割，腹饰大口巨目兽面纹，下腹一侧有一兽首鋬。圈足饰夔纹。通身以细云纹填地。



48. 罍

西周

通高38、口径15、腹径23、足径15.1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覆豆形盖，盖上饰有六个环列的凸形涡纹泡。直口，束颈，圆鼓腹，肩两侧一对兽首耳。器身上部环列六个凸出的涡纹泡，腹身上中部有一周凸弦纹，其上饰以横联的山形纹。下腹一侧有一兽首鋬。



49. 罍

西周

通高36.9、口径15.2、腹径23.4、足径15.8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覆豆形盖，四面有扉棱，扉棱间凸铸有四个涡纹。直口，束颈，斜肩，鼓腹，矮圈足。颈间及腹部至圈足四面有扉棱，肩饰立体卷角羊首双耳，并环列六个涡纹。腹下一面有兽首鋬。



50. 罍

西周

通高36.9、口径15.2、腹径23.4、足径15.8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覆豆形盖，器盖及肩上环列四个凸涡纹。直口，束颈，鼓腹。腹部饰两周凸弦纹、浮铸一兽首，对称兽首双耳。腹与圈足间饰一兽形錾。



51. 罍

西周

通高47.8、口径17.4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盖饰立体昂首蟠龙，扇形角有齿，前足踞于盖顶，盘尾为盖。器身直口，束颈，鼓腹，圈足。肩上浮雕卷身夔龙，尾后有鸟纹。肩饰对称兽首耳。肩、腹以宽弦纹带分割，腹饰大口巨目兽面纹，下腹一侧有兽首鋬。圈足平雕两对夔纹。通身以细云纹填地。



52. 罍

西周

通高77.5、口径24.8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覆豆形盖，盖顶饰一卷曲蟠龙，捉手四面饰兽面纹。束颈，溜肩，鼓腹，圈足。盖身饰两组相向而跪的牛。肩部两侧为立体牛首耳，牛身浮铸于双耳两侧的肩部。颈、肩、圈足上各饰两周凸弦纹。通身镶嵌绿松石。



53. 罍

西周

通高74、口径22.4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盔形盖，上有四鸟形立棱，盖身饰兽面纹，两侧间以蛇纹。器身四面铸有立体象首耳，下腹部为一兽形鋬。自颈至足以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组相同纹饰，肩上为一蟠龙，两边间以顾龙纹，腹部饰卷身夔纹，圈足饰两组相向而跪的牛纹，通体以云雷纹为地。



54. 罍

西周

高46、口径23、肩径40、底径27厘米，重19.01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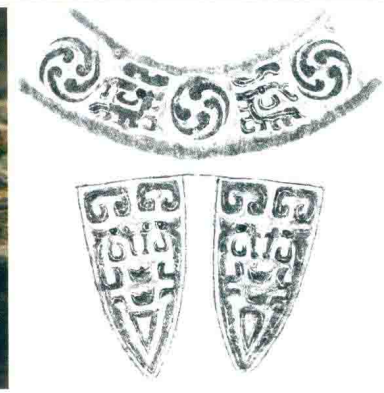
出土于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现藏于汶川县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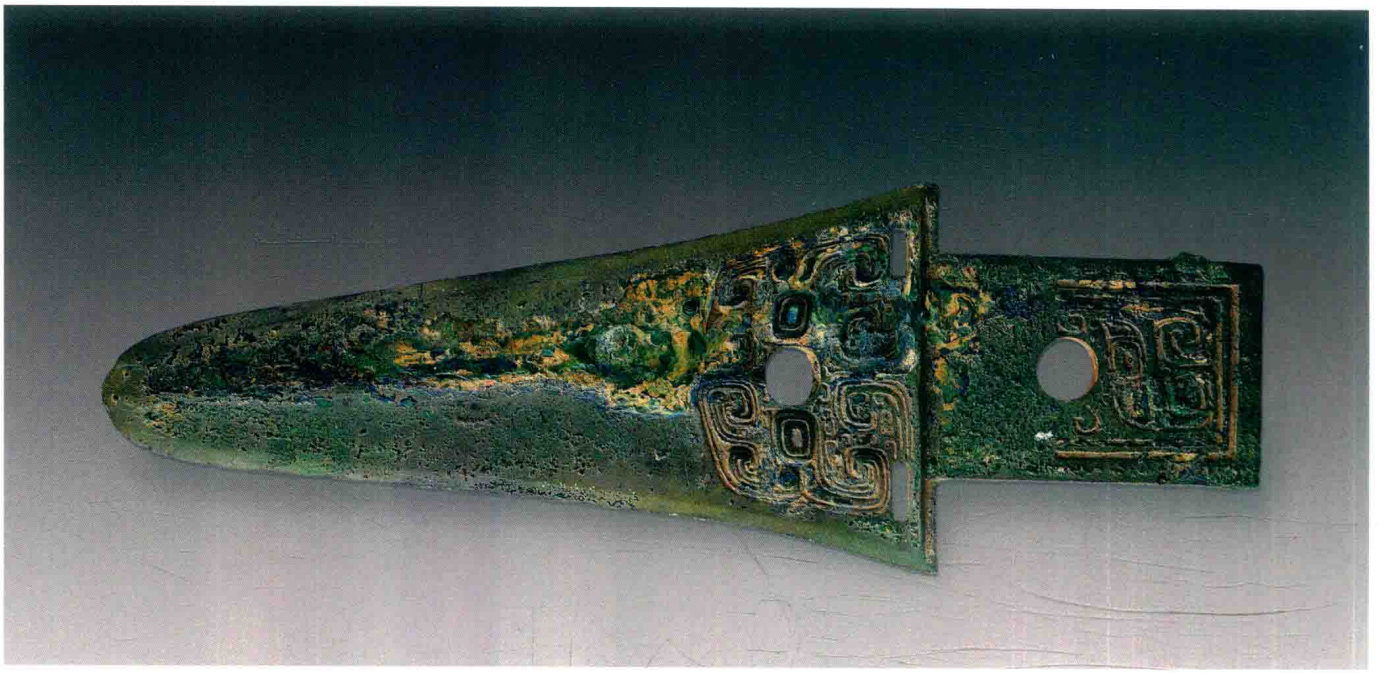
圆形，微侈口，方唇，直颈，广肩微鼓，斜腹，矮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牛首半环耳。颈部及圈足分饰两周凸弦纹，肩部饰相间分布的涡纹与夔纹，夔纹两两相对，尾部下卷，腹部饰三角形纹，内填面向分布的龙纹。范铸，四道范线由口沿向下经肩部、腹部直至圈足，将器物整体划分为四等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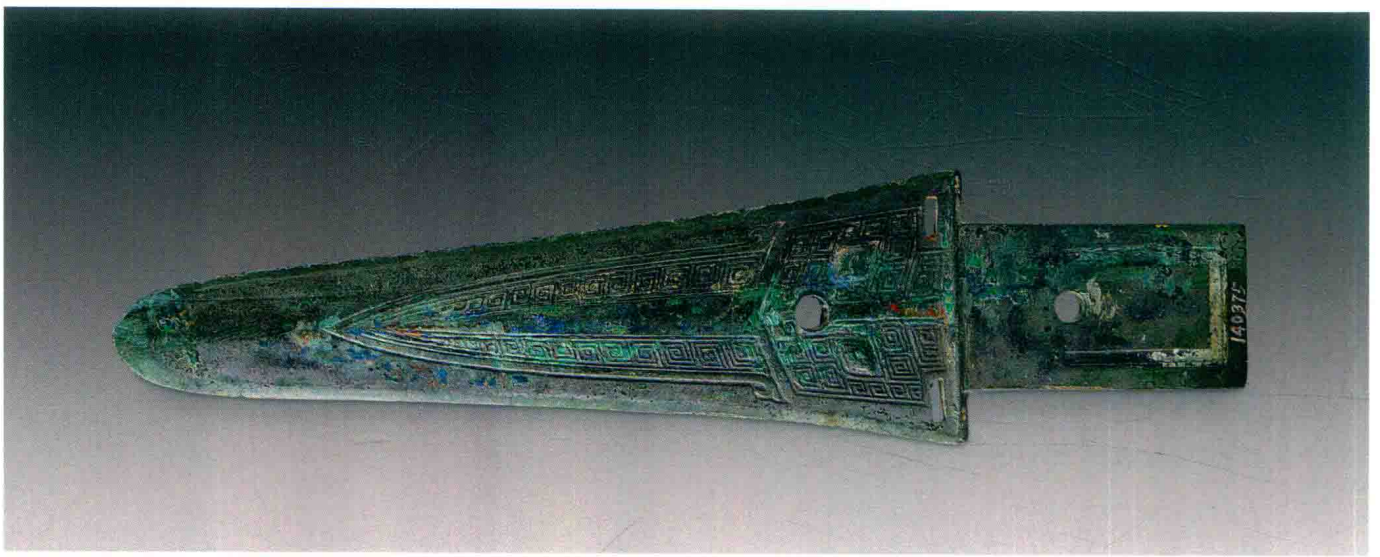
55. 戈

西周

通长27.4、援长19、内长8.4、内宽5.4、阑宽9.4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长三角形援，圆形尖锋，中脊边刃明显，上有圆穿，两面饰兽面纹，近阑处有两个长方形穿。长方形内，有一圆穿，饰目形纹及卷云纹。



56. 戈

西周

通长26.2、阑宽6.3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长三角形略曲援，中脊边刃明显，有圆穿，身饰饕餮纹。阑部有两个长方形小穿。长方形内，有一圆穿。

57. 戟

西周

通长27.5、戈长20、刺长23.9、宽5.7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分戈与刺两部分，形制、纹饰基本一致，戈为长三角形，无胡援，近阑处有一长方形小穿，援身两面饰勾啄巨鸟，长翼覆盖大部分器身，下角处为一展翅小鸟，内部饰四平行线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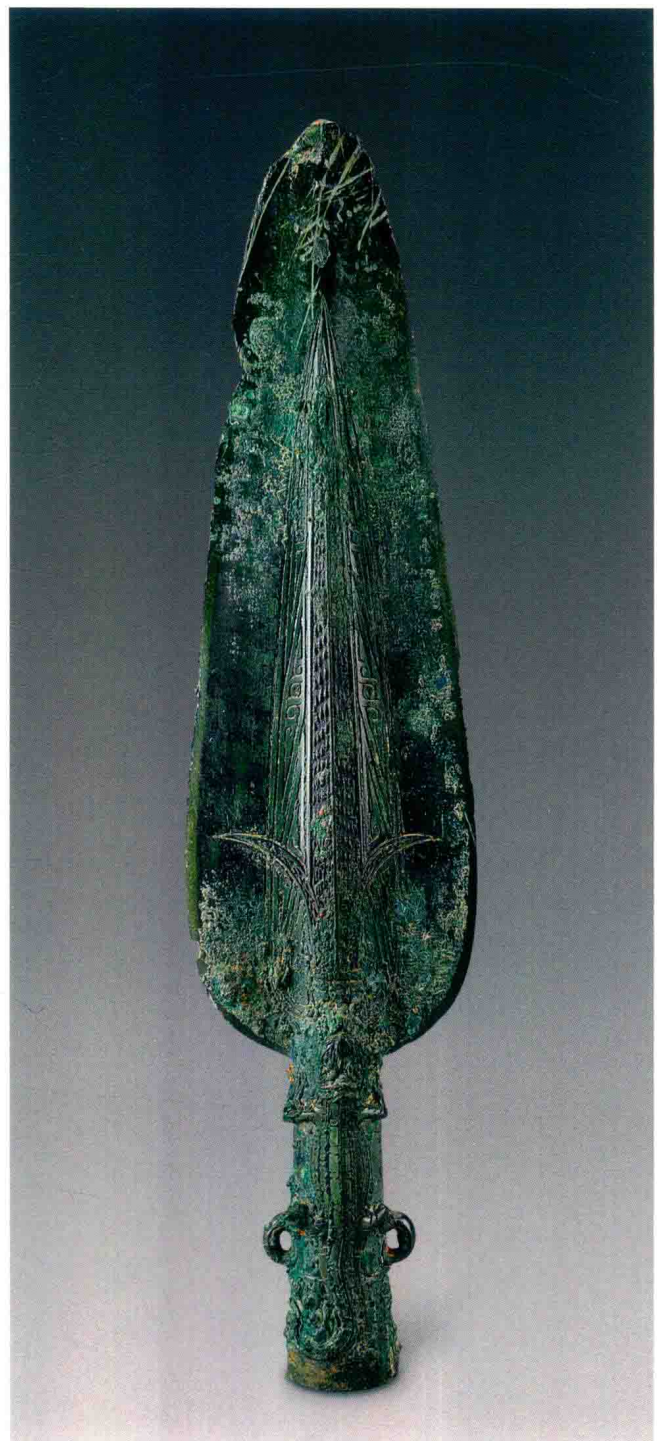
58. 矛

西周

长31.8、宽7.5厘米

1959年出土于四川省彭县（现彭州市）蒙阳镇（现濛阳镇）竹瓦街，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两翼生宽叶状，无锋，圆銎直达矛端，凸脊两侧饰尖角的变体雷纹。銎中部有对称的两个小系，两面饰鸟羽及浅浮雕壁虎纹。



59. 圆鼎

战国

通高25.4、口径24.9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子母口加盖，盖上三牛，纹饰分为三层，内层为辫索纹两周、云雷纹一周，其余两层均为凤纹。中为一纽，上有套环。盖内有铭文“邵之飤鼎”，为战国楚地流行字体。双附耳，三兽足。耳内外两面皆饰三角雷纹，腹部饰两周凤纹。



60. 釜甑

战国

高28.5、口径20.7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敞口、束颈、中间有箅、腹上下鼓、中束腰、圜底、辫索纹双耳。





61. 鎏

战国

高18.8、口径15.5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敞口，束颈，鼓腹，圜底，辫索纹双耳。



62. 鎏

战国

通高13.4、口径8.9厘米

1964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盖若覆盘，中间稍凸，扣形圆纽。纽旁阴刻一蜘蛛状纹，近盖边饰一周回纹与联珠纹组成的图案，并间铸一组巴蜀图语。小环扣和器耳连在一起。敞口，束颈，鼓腹，圜底，辫索纹环形单耳，素面。

63. 匕

战国

长24.4、宽4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勺部为心形、内凹。曲柄、柄中部饰菱形纹。柄末端为方形，勺及柄末端均饰变体凤鸟纹、空处填以方格纹。



64. 壶

战国

通高40.3、口径13.2厘米

1965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盖面微拱，有三鸭形纽，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侈口，溜肩，鼓腹，圈足。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和弋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



65. 壶

战国

通高36.4、口径10.6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盖微凸，四兽形纽。侈口，颈稍敛，溜肩，鼓腹，圈足。肩上饰对称兽首衔环双耳，以棕绳为提梁，一短绳连于盖纽与环之间，通体素面。



66. 壶

战国

通高32、口径8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郊羊子山，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带提梁盖，口稍侈，长颈，削肩，深腹，大圈足，肩部有带环兽耳、扁扣环。腹部浮雕云头纹。



67. 壶

战国

通高54.5、口径11.8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新津机场，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盖面上铸有四鸟形纽，盖面饰云水纹。直口，溜肩，鼓腹，圈足。通体嵌错几何纹，圈足内有阴文符号。





68. 壶

战国

通高37.2、口边宽10、底边宽10.7厘米

1954年出于四川省成都市羊子山土坑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覆斗形盖，饰四鸟形纽，张口衔珠。直口，束颈，溜肩，腹微鼓，高圈足，足跟外撇。腹部饰一对兽形衔环耳，器身纹饰分四层：上、下为倒三角形纹，内以蟠螭纹填地；中间两层为凤鸟纹，冠饰与尾羽相交，凤鸟回首反顾，作张口鸣叫状，空处填以卷云纹。圈足饰蟠螭纹。



69. 缶

战国

高29、口径19.4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覆豆形盖，饰蟠螭纹。直口，广肩，鼓腹，下腹内收，矮圈足。肩腹间饰对称象鼻形双耳，耳系一链双环。肩上铸有巴蜀图语，腹部饰蟠螭纹。

70. 钲

战国

长41.8、口径14.8厘米

1951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县（现广汉市），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圆柱形柄，柄身饰八道竖棱，衡部饰圆涡纹。器身一面铸有虎纹及巴蜀图语。





71. 钺

战国

长11.3、宽6.6、厚2.9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弧刃，平肩，折腰，短銎。一面铸有巴蜀图语。



72. 钺

战国

长20、刃宽8.7、肩宽6.9厘米，銎口长径5.2、短径4、深14.4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17（M17：3），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腰身微束，舌形刃，銎口呈椭圆形，平折肩。一面为素面，另一面铸有铭文。



73. 戈

战国

长23.1、阑宽6.6厘米

1965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三角形援，援与内稍曲，援上有一圆穿，近阑处有两个长方形穿，援身饰饕餮纹等。内上有一桃形穿，饰方形组合纹饰。



74. 戈

战国

长30.8、宽15.5、厚1.5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三角形援，无胡，有脊，脊上有圆穿，阑有两个小穿，援身饰虎斑纹。方内上一椭圆形穿。近刃处铸有巴蜀图语。



75. 戈

战国

长25.2、宽13.6、厚2.4厘米

1972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现郫都区）独柏树，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长援中胡，长方形内。近阑处有三穿。援背上方铸巴蜀图语铭文一行，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虎身阴刻，延于内上，内中一穿。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佩刀之人，另一面铸有巴蜀图语。



76. 戈

战国

通长23、援长16.4、胡长6、内长6.6厘米

2011年出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伞岗坪T8，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直内有胡戈。长条形援较平直，援部中空，圆尖锋，隆脊，后端中部有一水滴形的穿孔，援的上刃向上延展突出，下刃向下延展成胡，胡和援的后上部各有一个长方形穿。直内，其上铸凸出的直线纹，并有一窄长的水滴形穿孔。

77. 戈

战国

通长20、援长16.2、内长3.8厘米

2012年出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伞岗坪M45（M45：1），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直内无胡戈。援呈蛇头状，中部较窄，头部较宽，圆尖锋，隆脊，后部向上下延展呈双翼状，上下端各有一长方形穿。直内，前部有一不规则的小穿。



78. 戈

战国

通长21.6、援长15.4、胡长11、内长6.2厘米

2011年出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伞岗坪M27（M27：1），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直内有胡戈。长条形援较平直，援部中空，圆尖锋，隆脊，后端中部有一水滴形的穿孔，上刃向上延展凸出，下刃向下延展成胡，胡和援的后上部各有一个长方形穿，胡的下部向后凸出。直内，其上铸凸出的直线纹，并有一窄长的水滴形穿孔。



79. 矛

战国

长20.8 ~ 22.2、宽3.1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叶狭长、细窄，前聚成锋。矛身凸脊、长骹双耳。四件骹上饰有兽纹与牛鼠纹，一件骹上饰巴蜀图语与云雷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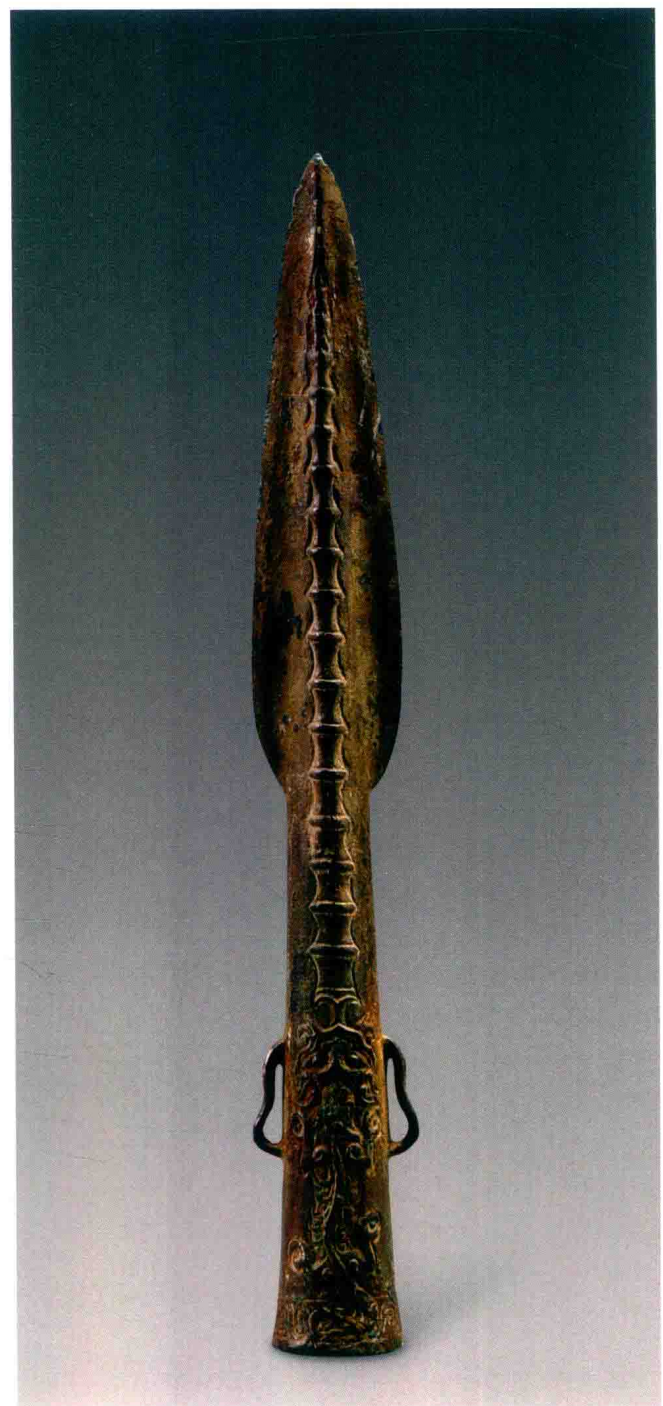
80. 矛

战国

通长21、骹长9.6、叶宽2.6、骹径2.4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10（M10：9），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长骹，骹长约占通长的二分之一，双弓形耳位于骹下部，最宽处在叶的基部，骹口呈圆形，两面脊中部均呈竹节状凸起，竹节饰共十八节，自骹中部直达矛锋处，由下至上渐细窄。骹口处铸饰雷纹一周，雷纹与竹节饰之间两面均铸饰高浮雕状卧虎像，骹上部右侧一面饰有类似竹节的符号。



81. 矛

战国

通长14.2、骹长4.1、叶宽3.4、骹径2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1（M1：16），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形体较小，短骹，骹长约占通长的三分之一，双弓形耳位于骹上部紧贴叶基，最宽处在叶的中部，骹呈圆形，叶部呈尖叶状，鼓弧刃，叶两侧中部各有四个逗点状圆形穿。骹上部一面铸有高浮雕状“手”、“心”、虎纹，另一面是由许多单个纹饰和符号组成的复合图案。



82. 矛

战国

通长22.9、骹长10.4、叶宽3.2、骹径2.3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33（M33：1），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长骹，骹长约占通长的二分之一，双弓形耳位于骹下部，最宽处在叶的基部，骹口呈圆形。骹两面饰卧象纹及曲尺纹。





83. 环首刀

战国

长41、最宽3.7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单面刃，扁形柄，环首。一面饰巴蜀图语。



84. 带鞘双剑

战国

剑长29.6 ~ 29.8、宽3.54 ~ 3.57厘米，剑鞘长29.2、宽12.6厘米

1973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医学院，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双鞘由两块铜铸件嵌合而成，呈袋形，侧附双耳，中以凹槽分为左右剑室。鞘正面饰蟠螭纹和卷云纹。双剑呈柳叶形，扁茎，无格，基部两个圆穿。剑身两面饰几何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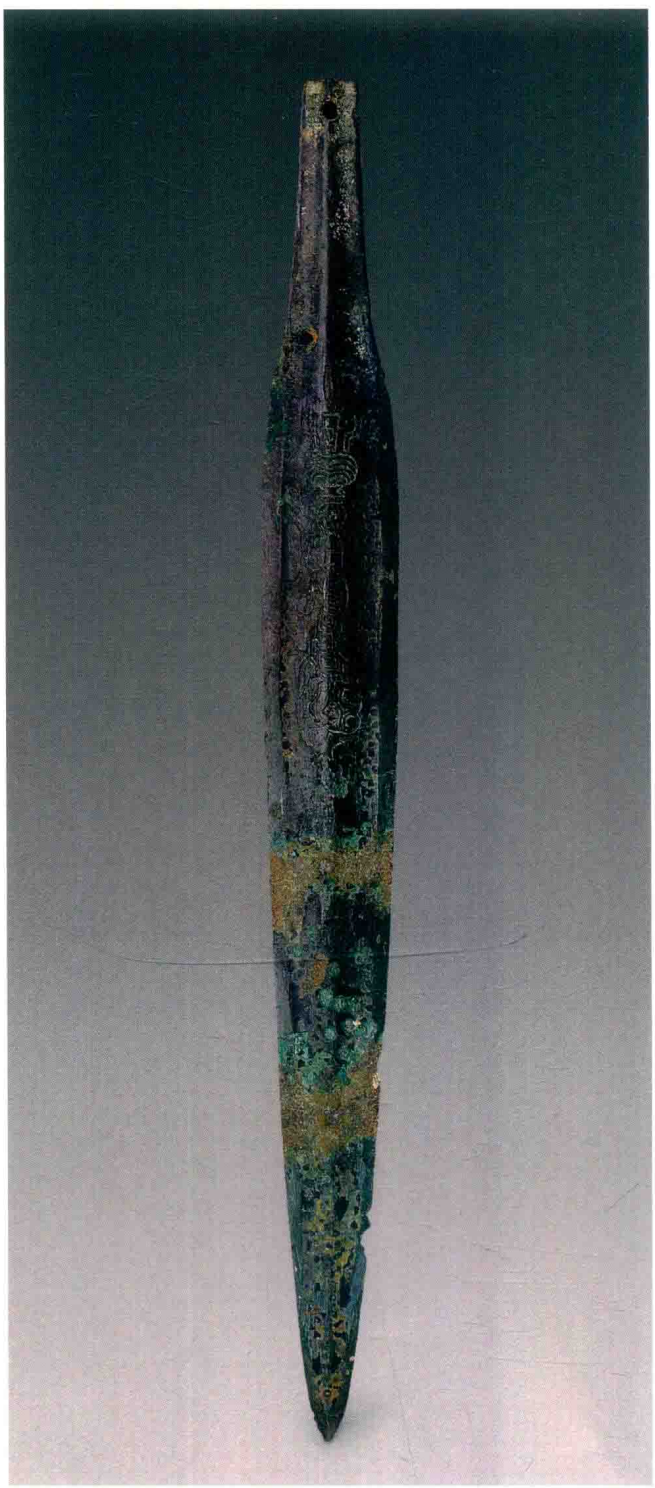
85. 剑

战国

长47.5、宽5、厚1.1厘米

1973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郫县（现郫都区）独柏树，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扁茎，无格，基部两个圆穿。脊部两面饰虎纹与巴蜀图语。



86. 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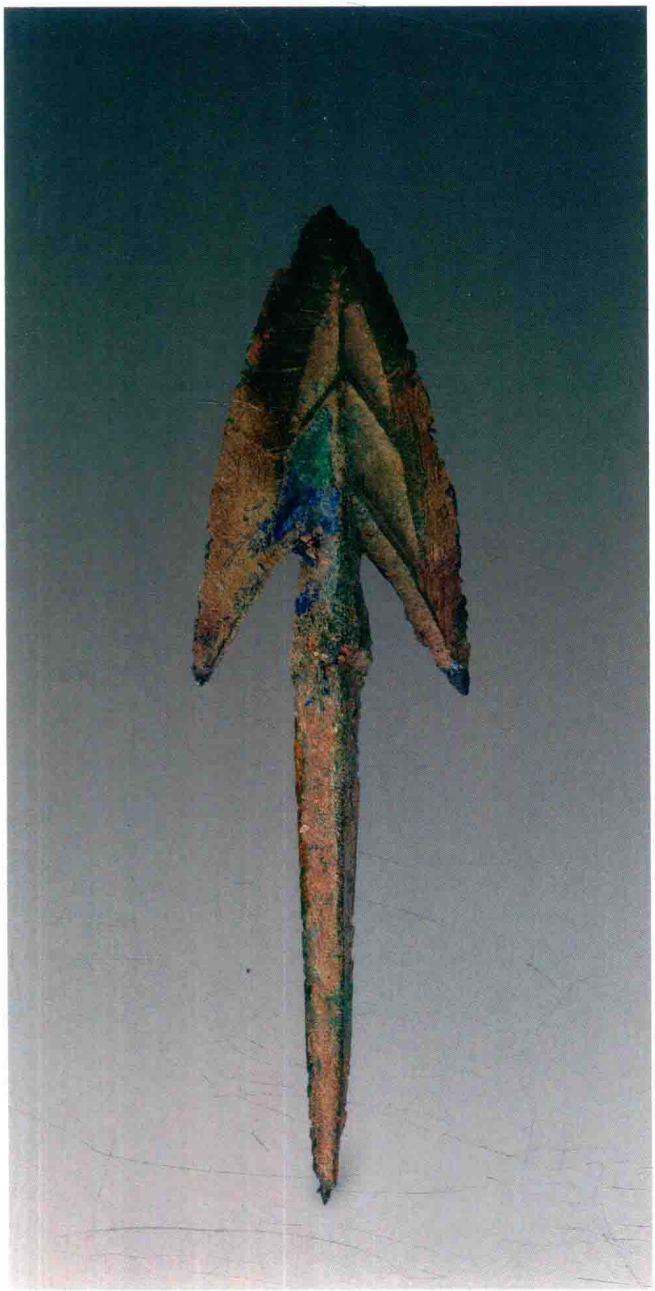
战国

长37.5 ～ 49.5、宽4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扁茎，无格，柳叶形剑身。铸虎斑纹。剑柄以两片木板夹紧，缠以棕丝，髹漆。





87. 镞

战国

长5.6、宽1.7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尖锋，双翼，铤截面为三菱形。器身饰叶脉纹。



88. 镞

战国

长6.3、最宽2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锋呈三棱形，双翼窄，凸脊，圆形銎较长，上一圆环。一面有巴蜀图语。



89. 斧

战国

长18.7、宽8、銎宽3.9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弧刃较宽，方銎，亚腰。銎两面均有曲尺纹，器身一面饰巴蜀图语。



90. 斧

战国

长16.6、刃宽6.9厘米，銎口长径3.9、短径3、深8.9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1（M1：21），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长方形銎口，喇叭形身，宽弧刃，刃宽明显大于銎宽，刃尖外撇。銎面铸有曲尺纹。

91. 斤

战国

长23.1、刃宽2.4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弧刃，前端弯曲，长方形銎。銎部饰巴蜀图语。



92. 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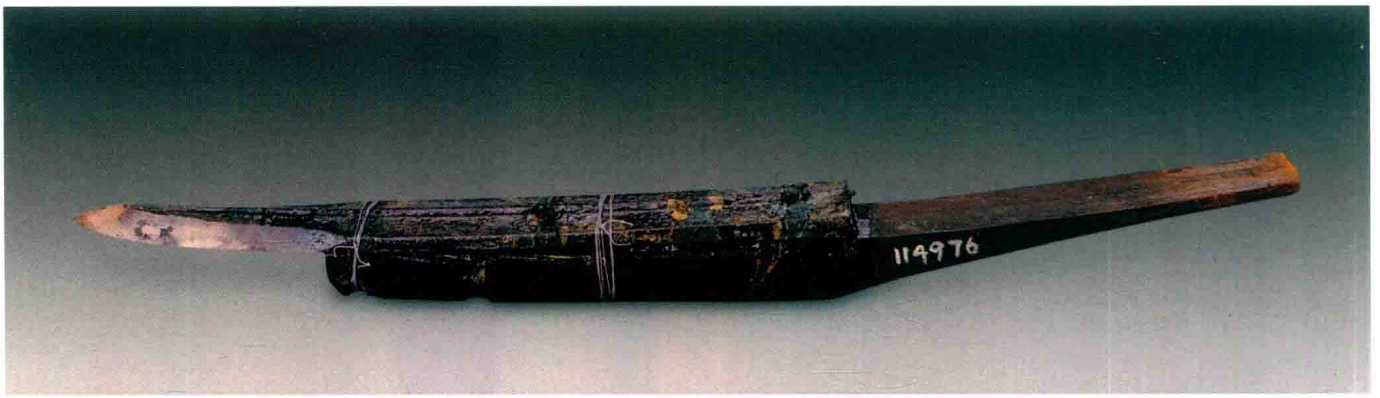
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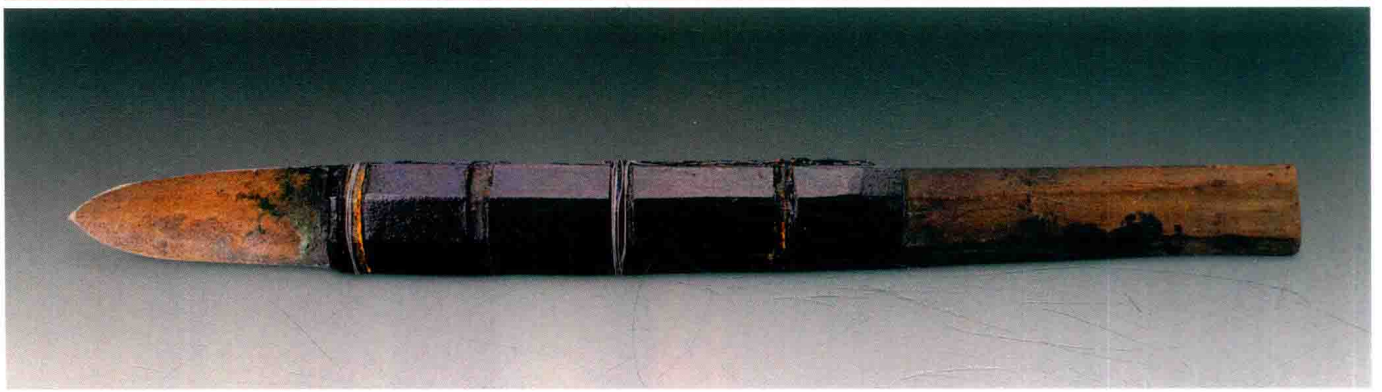
长14.8、刃宽0.9、銎径1.7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弧刃，圆銎。銎上饰巴蜀图语。







93. 刻刀

战国

通长28、宽2.3、厚1.8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刻刀装于木柄上。刀身微拱，断面呈弧形，刀锋尖锐，呈三角形，正面有脊，边折有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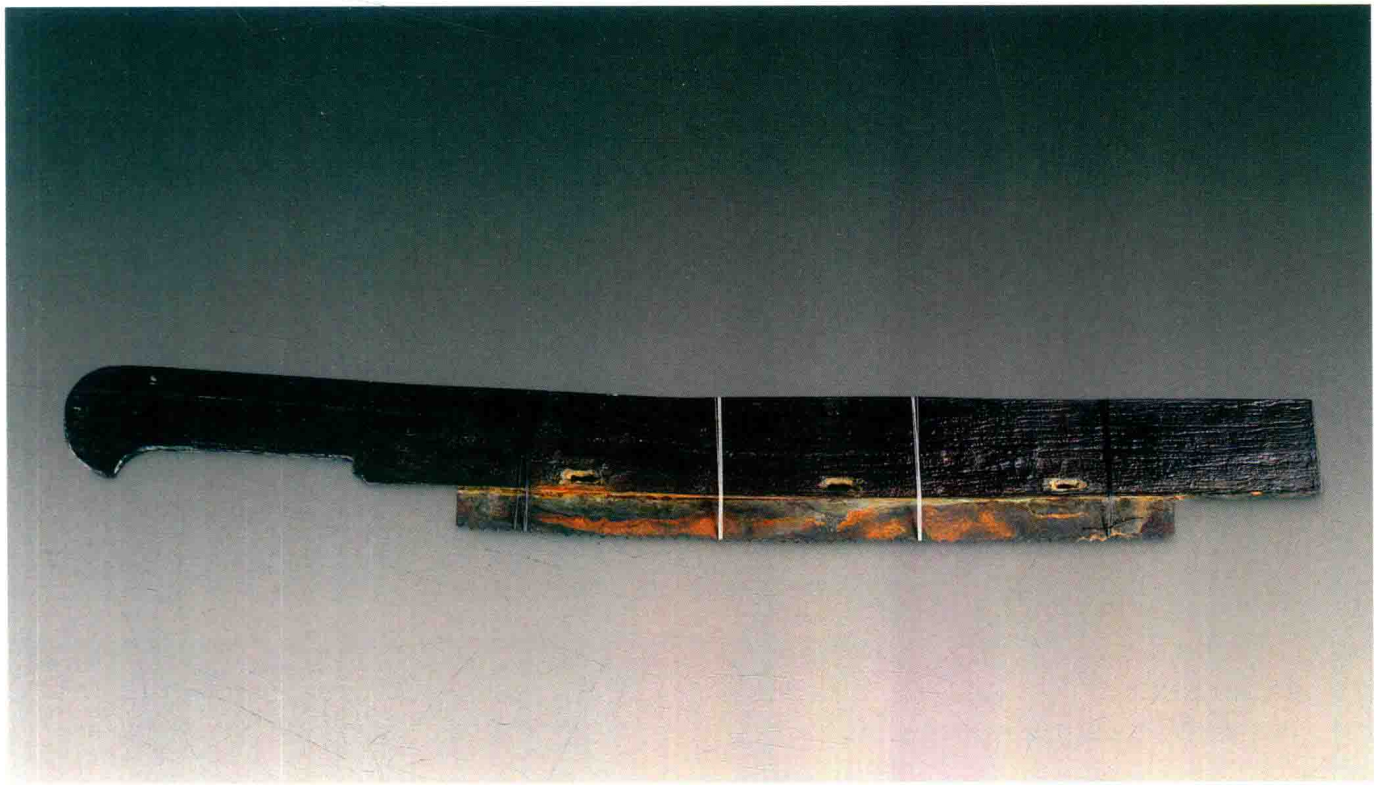
94. 刻刀

战国

长25.1、刃最宽3.4、厚0.3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弧刃较短，短柄。器身饰巴蜀图语。



95. 锯

战国

通长42.6 ~ 45、锯长24.8 ~ 25.8、宽6、厚1.1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五件一组。锯呈长条形，齿形刃，嵌在木柄上，以三穿卯固，握柄处头略弯。



96. 带钩

战国

通长6.9、腹宽2厘米

2011年出土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石柱地M49（M49：2），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整体较细长，腹部雕刻了一只镂空的神兽，神兽双眼圆睁，嘴巴大张，昂首挺胸，尾巴较长，向后卷曲呈S形。



97. 带钩

战国

长28、腹宽4.8、腹厚1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35（M35：1），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整体较细长，鸟头形，长颈，窄腹，腹正面与侧面转折起棱，腹体较厚。腹上用金丝镶嵌出三角形纹和卷云纹。



98. 带钩

战国

长14.5、腹宽4.5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50（M50：22），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展翼蝉形，蝉尾露出，蝉鼻不显。蝉身前部及双翼均由银丝镶嵌出勾连卷云纹。



99. 印

战国

高1.1、边长3.4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方印，背微拱如覆斗，中为鋬纽，四周饰兽面纹。印文为巴蜀图语一组：上部左右角各有一开口向上的铎；下部两侧各立一人，双手相握，两人中间置一罍，其上为一巴蜀图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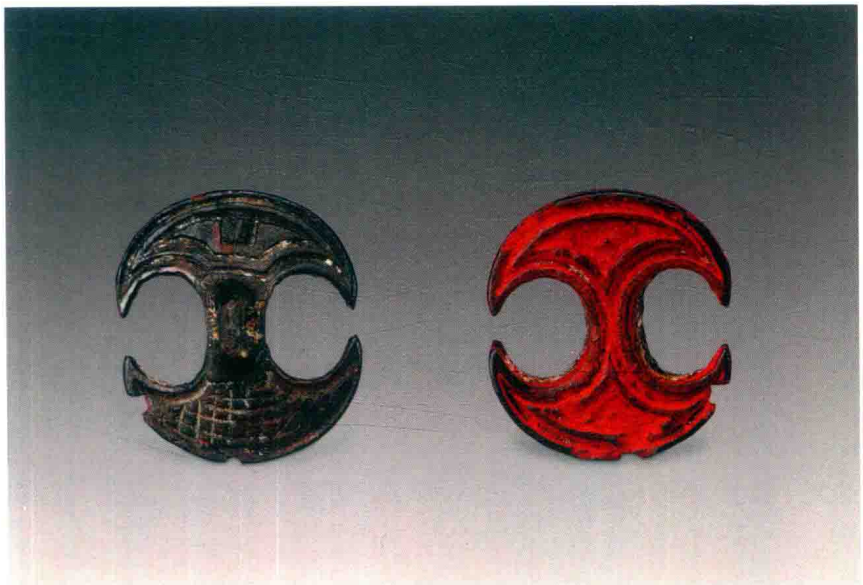
100. 印

战国

高1.6、直径1.6厘米

1964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兽纽，纽上有四穿孔。印文为巴蜀图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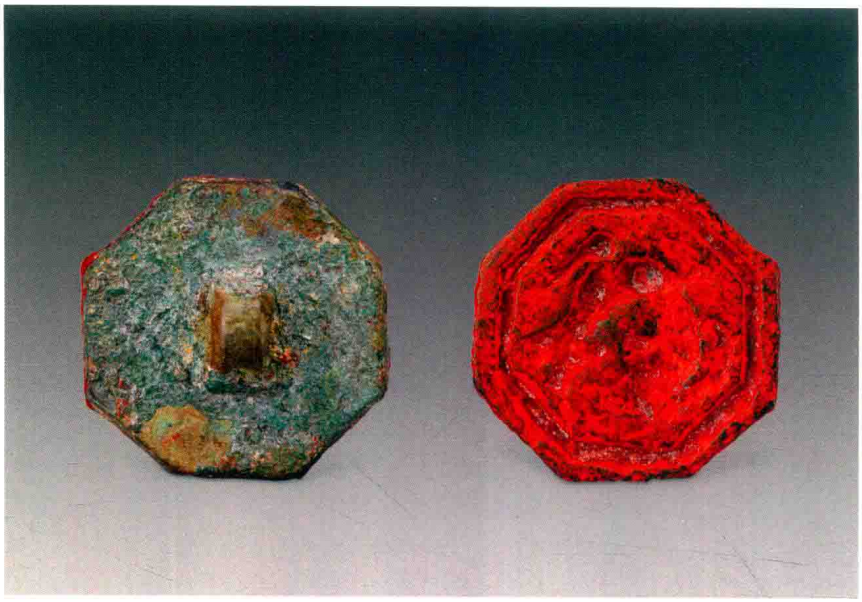
101. 印

战国

高1.2、直径2.7厘米

1980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县（现新都区）马家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似两扇面相连，桥形纽，背面饰网格纹及几何纹，印文为几何图案。



102. 印

战国

高1、直径2.8厘米

1974年出土于四川省峨眉县（现峨眉山市）符溪公社砖瓦厂，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八边形，桥形纽，印文为巴蜀图语。



103. 印

战国

高1.2、直径3.7厘米

1958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清仁乡，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工形纽，印文为巴蜀图语。



104. 印

战国

高1、直径3.2厘米

出土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关墓地M10（M10：6），现藏于什邡博物馆。

圆形，桥形纽，印台呈扁圆梯形。桥形纽较宽，印台上大下小，印面由卷云纹、蝉、蠡和其他单个的符号组成。

105. 壶

西汉

器高10.3、宽10厘米

2009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桃坪墓地M74，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提梁壶，带盖，盖顶有纽。壶体为直颈，溜肩，扁圆腹，长方形圈足。肩部两侧有纽，用活链与顶部纽相连。壶体全身錾刻花纹，上部刻凤鸟纹，其下刻复杂的菱格纹，圈足上刻锯齿纹。



106. 盉

西汉

通高16.5厘米

2009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桃坪墓地M74，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带盖，盖顶有一圆形纽，盖一侧有活纽与壶身相连，可开合。壶身为小口，鼓腹，圜底，三足，器身前侧有鸟头状流，一侧有一把，中空，截面为方形。壶腹中部饰凸弦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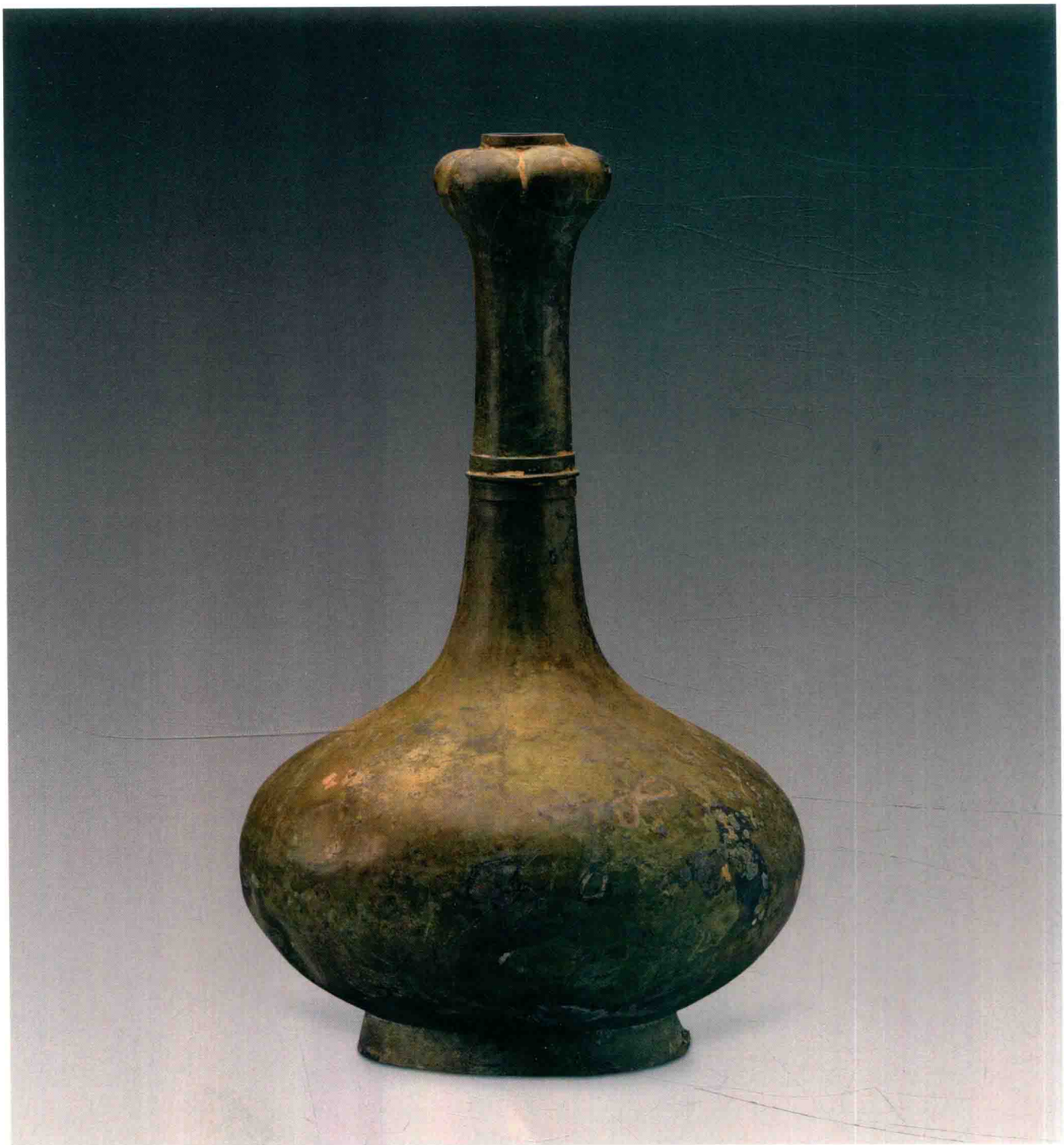
107. 壶

西汉

高37.6、口径3.4、腹径23.4、底径13.7厘米

2010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高山庙墓地M5（M5：15），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六瓣蒜头形，小口，方唇，长颈，颈正中做成一箍，箍中部有一凸棱，扁鼓腹，圈足。底部正中有一辫索形纽，出土时纽中间穿过一圈长约15厘米的棕绳。





108. 洗

西汉

高12.4、口径26.4、底径15.6厘米

2004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桃坪墓地M1（M1：4），现藏于汉源县文物管理所。

侈口，方唇，领微束，斜弧腹，平底。上腹饰瓦棱纹，中腹饰铺首衔环一对。

109. 炉

西汉

通高32、盘底直径27.5厘米

2009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桃坪墓地M74，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博山炉，由承盘、炉身、炉盖三部分组成。承盘为圆形，口沿外折，素面；炉身底座连接在承盘上，喇叭形座，炉身的底座、柄上饰山峦纹，炉盘口部为子母口，盖扣合在其上，腹部较深；盖呈博山形，镂空作重叠的云雾山峰纹饰，盖顶有活环纽，系活链与炉身部环纽相连。



110. 牌饰

西汉

长17.4、宽7.1、厚0.5厘米

2004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桃坪墓地M1(M1:1),现藏于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器体扁平，由柄和长方形牌身组成，分正背两面，背面平素。柄上部正面呈近半环形，由两端向内勾卷的卷云纹构成，下部为近正方形，铸有阳文符号。牌身正面满铸乳钉纹，边缘有窄郭，乳钉纹间铸双鱼纹。



111. 牌饰

西汉

长16、宽4.5、厚0.4厘米

2004年出土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桃坪墓地M1(M1:7),现藏于汉源县文物管理所。由四条龙两颠两倒相互交缠而成，龙头两个一组作对视状分别向两端伸出，龙尾相交，龙身相互交缠形成四个圆圈，圆圈内置龙足，每龙四足。



112. 车马

东汉

通长约2.05米

出土于四川省资阳市兰家坡M1，现藏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铜车马是汉代典型的轺车。单服马，长约1.1、残高约1.05米。根据当卢、马衔、马镳等马具推测原有简单的辔头。单轭，双辕。长方形舆，长0.63、宽0.27、高0.3米。舆三面封闭，两侧转板上装柱状扶手，后面空出，仅在两侧装两块三角形軨板。舆底部镂空出空孔。车舆之内左侧置一铜制驭手。驭手头戴平巾帻，身着袍服，双手做持辔控驭状，高约0.37米。据已发现的鎏金铜伞箍和车轼正中靠内侧用以固定伞柲的圆环，推测该车原有伞盖。车轮十八辐，直径0.71米。轴与舆底部之间装伏兔。舆前双辕之上横置笭。笭长方形，中空，器表镂有圆孔。



113. 戈

春秋

长24.2、宽14.6厘米，重200克

2000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遗址Ⅱ M72（Ⅱ M72:4），现藏于云阳县博物馆。宽长援，前锋圆尖，中脊凸起；长胡，下端缘绕过阑呈弯弧形，胡上三穿；长方形内，其上一穿。援、胡间两面均饰浅浮雕虎纹。





114. 镦

春秋

高16、宽2.4厘米，重130克

2000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遗址Ⅱ M38（Ⅱ M38:7），现藏于云阳县博物馆。为连接矛头的柲的末端。上粗下细，上段呈圆柱形，其上部饰几何纹，下部饰浮雕鸟纹；下段似兽蹄足，其上部有一圆穿。



115. 圆鼎

战国

通高28.4、盖高6.2、口径23.8～24.8、盖径27厘米，重4.9566千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55（M55：17），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盖、器身整体剖面呈椭方形。浅盘形盖，平顶，中央有一半环纽，纽内套环，纽外两周凸弦纹，外弦纹上对称分布三牛形饰。器身子母口，子口内敛，两长方形耳外撇，腹部一周凸弦纹，平底，三兽蹄足。器身可见合范痕。





116. 釜甑

战国

通高36.8、最大腹径23厘米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小田溪一号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甑，口微敛，平沿，束颈，腹微鼓，底为箅子，上腹部一对对称环耳；釜，敛口，折沿，束颈，溜肩，鼓腹，圜底，底有四短足，肩部有一对对称环耳。均为素面。





117. 鎏

战国

通高19、口径12.6、腹径18.5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带盖，一侧有辫索状环耳。盖上有一链与鎏耳相连，盖上饰有錾刻纹饰一周，盖中心饰有巴蜀图语符号一组，另在盖边沿处饰有巴蜀图语符号三个。鎏耳肩部饰一周凸弦纹，沿下刻有图语符号一组。



118. 敦

战国

通高23.8、口径20 ～ 20.5厘米，重2.185千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66（M66：39），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盖与器身造型相同，皆素面半球体，相合成为一个圆球，各有三纽（足）两环耳。



119. 器座、豆、夹组合

战国

器座通高44.2、口径35、底径30厘米；豆高7.4、口径14.2、底径6.2厘米；夹长14.1、宽1.6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器座整体似高柄灯形，盘为倒置圆台形，盘沿外撇，盘底部挂有五个小钩，盘面中心有大小两周套合内凹圆芯，外围另分布有内凹的四个小圆芯，盘外表饰一周凹弦纹；柱截面为十三面体，实心；台状高圈足，足下有三只“八”字形矮支脚。

豆八件一组。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口沿微敛，方唇，弧腹，矮圈足。素面。

夹两件一组。长方形带状铜条弯曲而成，有两道横向凸弦纹。



120. 勺

战国

通长18.8、勺身长10.3、柄长11.5、宽12厘米，重221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99（M99：63），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箕勺身。短柄，呈不规则十面体柱形，中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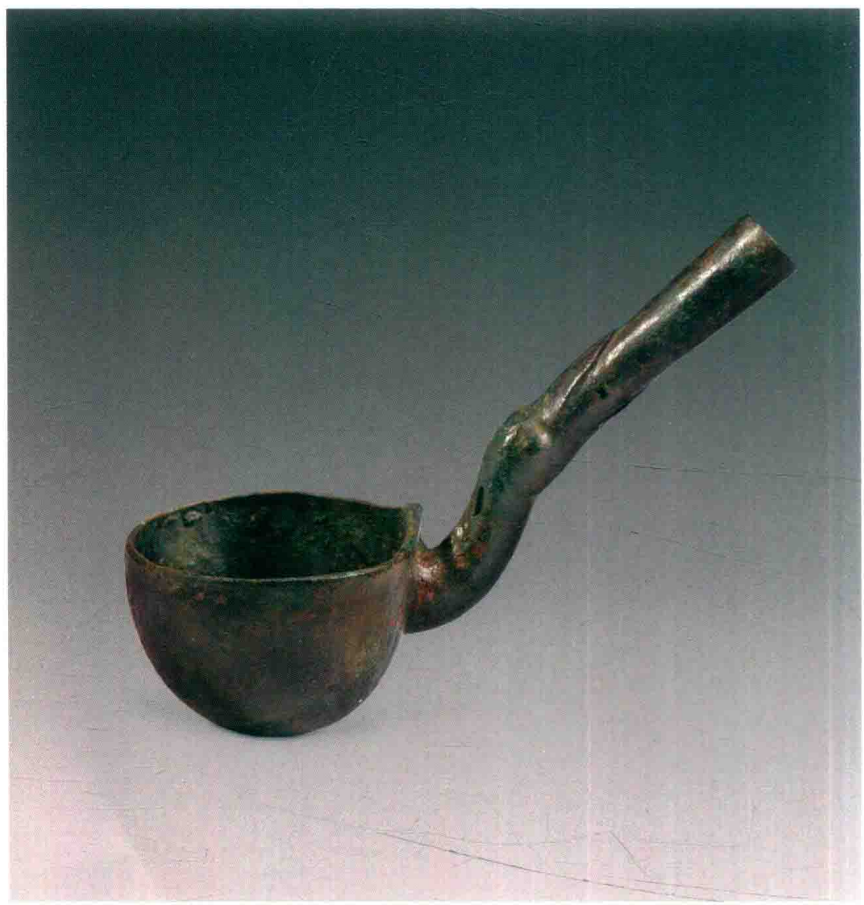
121. 斗

战国

通长16.6、柄长12、口径6.5～7.7厘米，重213.2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99（M99：39），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圜底杯，杯口平面呈扁桃尖形。曲柄，前段呈曲颈鸟首形，后段呈圆柱形，中空。



122. 尊

战国

通高29、足高8.4、长28、最宽16.8、尾宽12.4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整体呈鸟形，头高昂，曲颈向上，桃形双耳，两背向的钩状冠，双目圆睁，喙上部呈卷云状，喙部下勾，嘴为圆形流，鼓腹，足上有蹼，扇形尾微微上翘。两颊各饰有卷云纹一道，其余鸟耳内、面颊、颈、腹前部和两腿均刻有羽鳞状纹饰，颈部羽鳞纹上嵌以绿松石的羽毛状纹饰，延伸至尾部。



123. 壶

战国

通高33、口径8、腹围55.5、底径12厘米

2000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小口，长颈，斜肩，肩部有两个对称衔环铺首，鼓腹，圈足。带盖，盖上置提梁，提梁与两侧四个“8”字形活链相连。肩部饰一周三角形蝉纹，腹部饰“S”形变形龙纹，圈足周饰辫索纹。



124. 壶

战国

通高50.6、口径15.3、底径19.5厘米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小田溪，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有盖，子母口，盖面微拱，饰三个鸟形纽。壶直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部饰对称兽面衔环耳。壶身饰云水纹和卷云纹，圈足饰水波纹。通体嵌错饰件均已脱落。



125. 壶

战国

通高35、壶高31.4、盖高4.7、壶口径10.8、盖口径11.3、底径12厘米、重1.805千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92（M92：6），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带盖，子母口，弧形盖面，有三个对称的变体鸟形纽。壶口微侈，束颈，鼓腹，圈足，肩铸二衔环铺首。盖及壶均素面。



126. 壶

战国

通高33.5、壶高30、盖高3.9、壶口径9.4、盖外口径9.7、腹径21、底径12.5厘米，重2.674千克

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群陈家嘴墓地M23（M23：7），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带盖，子母口，盖面微拱，有三变体鸟形纽，其中二纽佚失，素面。壶颈微束，鼓腹，圈足，颈饰一周三角形变体蝉纹和一周三角形云纹，肩铸二铺首衔环，肩腹间隔饰三组六周变体窃曲纹和凹弦纹，圈足饰一周几何纹。





127. 壶

战国

通高48、口径11.4厘米

出土于重庆市南岸区大兴场战国墓，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带盖，盖上立四鸟形纽，纽上附小圆环。子母口，斜肩，大腹，肩部有对称衔环铺首。器表花纹通嵌绿松石，部分脱落。



128. 缶

战国

通高49.5、口径20厘米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小田溪一号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子母口盖，盖沿有三个小凸起，盖上有四环耳，中间为涡纹。器身敛口，平沿，束颈，广肩，鼓腹，平底。盖面、盖沿、器口、颈部和肩部满饰变形夔纹、勾连雷纹，腹部饰四涡纹及四环耳。





129. 缶

战国

通高27.9、缶高24.6、盖高6.4、缶口径17.9、盖口径19.7 ~ 20.6、底径21.7厘米，重6.417千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66（M66：20），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器身直口、矮领，圆肩，鼓腹、平底，肩对称铸二兽首耳，耳内套环，肩腹部间隔饰三周羽翅纹和两周凸弦纹，弦纹之间等分饰八枚乳钉纹，乳钉上饰羽翅纹。盖盘形，平顶上置四环纽，素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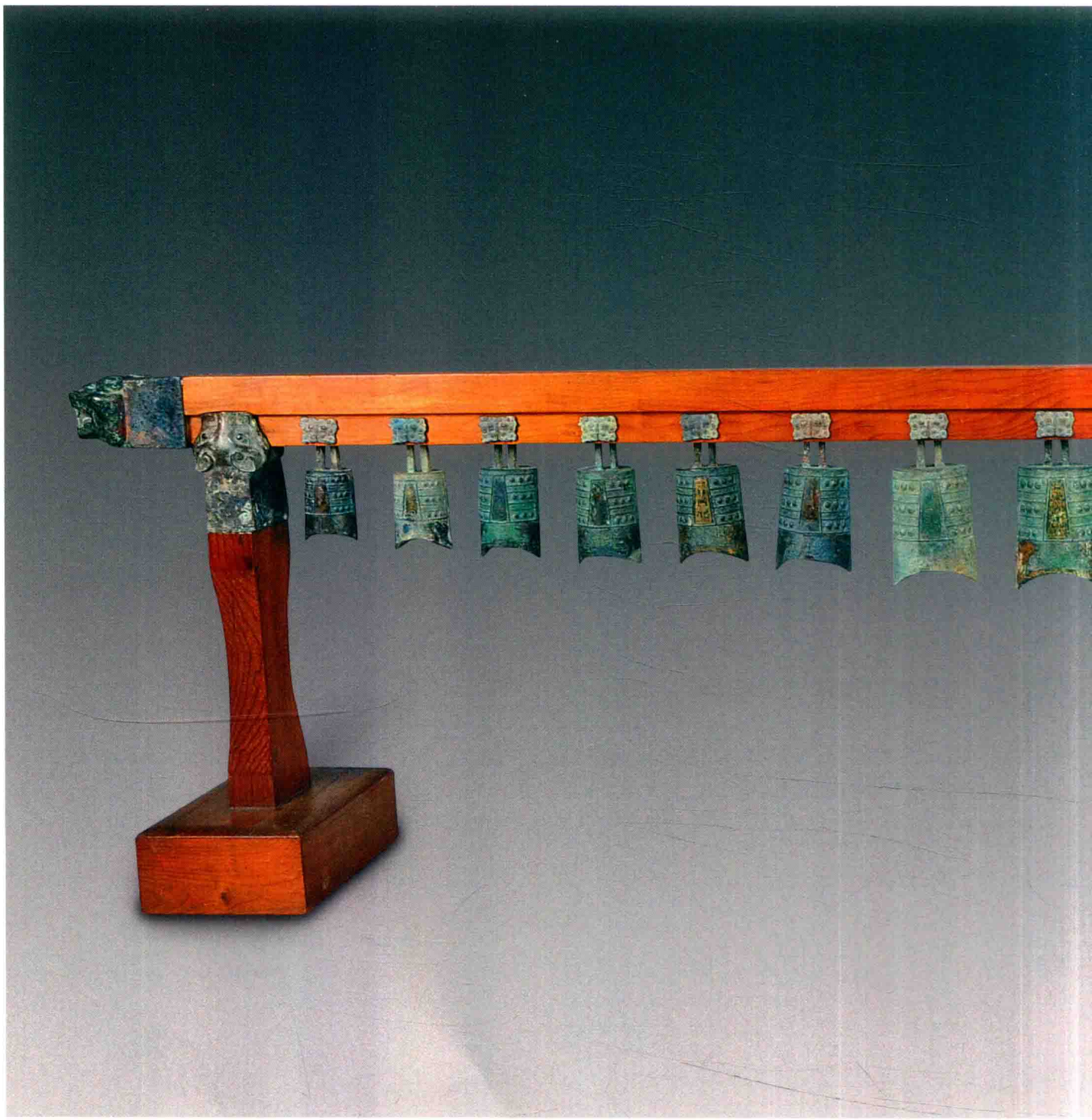
130. 编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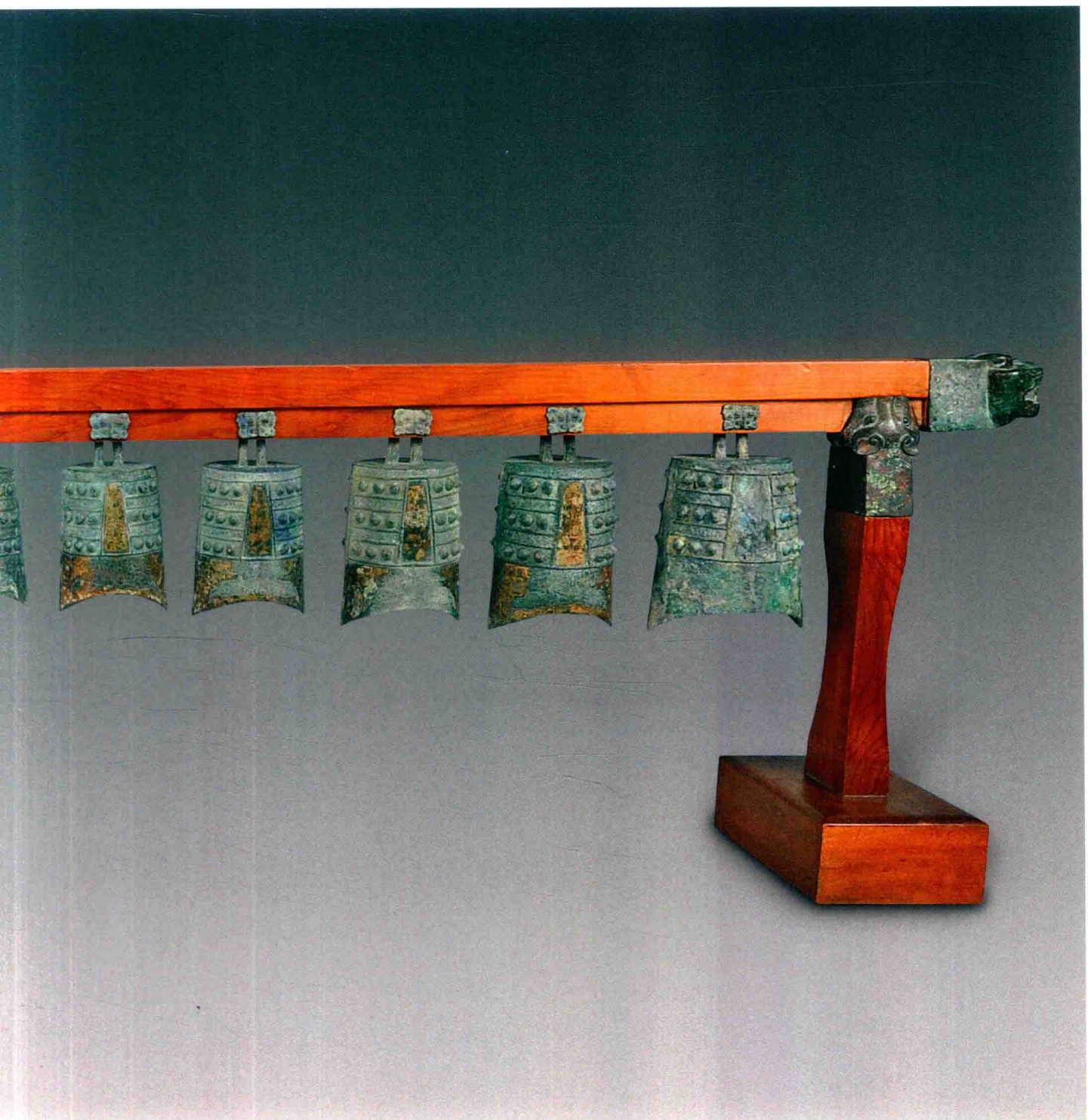
战国

高14.6 ～ 27、宽5.4 ～ 14.3厘米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小田溪一号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共十四件纽钟，尺寸依次递减。编钟为长方形鼻纽，两铣下垂，通身以浇铸和错金的技法饰以精美的花纹。舞部为云雷纹；篆带有涡纹；篆带上下及两篆间各有涡纹钟乳凸起；两鼓面作蟠虺纹。其中八件纽钟的钲、于部有错金纹饰。编钟有十四个插销、四个兽头饰件。





131. 甬钟



战国

通长43.5、甬长14.5、腔体长29、通宽18.2、厚9.5厘米，重2.3688千克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群M12（M12：34），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甬中空，无旋，有四长方形孔（干），甬长相当于腔体长度的二分之一。长腔，直铣，腔体近于直筒状，沿枚的外围有一周方形凸棱，枚的分布长度近于腔的三分之一；阔鼓，鼓面饰船形纹，鼓部占腔的三分之二。





132. 钲

战国

通长29、柄长11.5、直径9.8厘米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小田溪二号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腔瘦长，近直筒形，八棱柱状甬，衡部饰涡纹，两铣微侈，于弧，内腔有四条音脊。器身饰“王”字及巴蜀图语。



133. 钲

战国

长39厘米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身扁圆形、柄为多棱形，两铣上侈，口缘内凹呈弧形。通体光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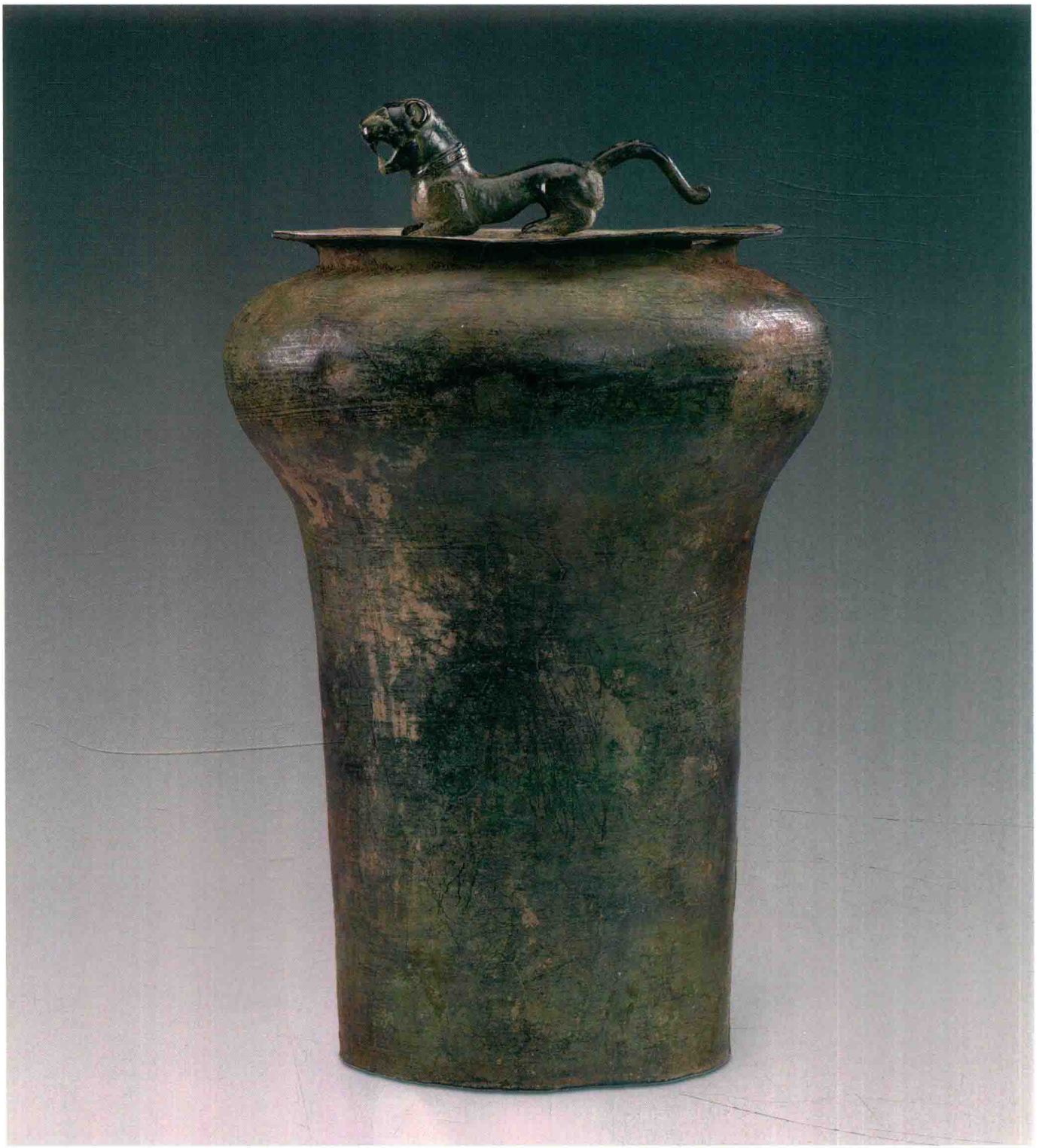
134. 錞于

战国

高53、肩径34厘米，重10.14千克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铜鼓乡麦山村，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平顶，有一周外侈的宽沿，顶中央一虎形纽，矮领，扁圆肩，最大径在肩部，深直腹中空，横截面呈椭圆形。



135. 钺

战国

长17.4、宽8.2、銎径4～4.8厘米，重752.6克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群M15（M15：6），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整体修长，椭圆形銎，窄肩，直边圆弧刃。器身上部有一组巴蜀图语。



136. 戈

战国

长19.3、宽9.9厘米，重145.5克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群M10（M10：32），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狭长援，前锋圆尖，中脊隆起；长胡三穿，下端缘与阑呈直角；长方形直内，其上一穿。援与胡两面均布满虎斑纹，援本部两面分别饰手心纹及其他巴蜀图语。







137. 戈

战国

长24.5、刃宽3.1厘米

197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小田溪三号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长援，窄刃，中脊隆起，长胡四穿，长方形内，内缘开刃。内上有铭文十六字。



138. 戈

战国

长20、宽12.5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援端刃部呈圭形，中脊隆起，长胡三穿，长方形内，内有一穿，残胡上有一行巴蜀符号。



139. 戈

战国

长23、宽13.5厘米

1954年出土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冬笋坝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前锋作弧形尖削，上刃斜直，下刃在援末和胡相接处作斜缓的弧线。长胡三穿。内一穿，内尾有一行巴蜀符号。

140. 戈

战国

长25.6、宽13.6厘米

1998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锋残，直援，长方形内，内有一穿，长胡三穿。两面各有浮雕状的虎头纹，虎耳向后伸至内上，张口瞪目，状极狰狞。虎身延至胡部，尾上翘，呈奔跑状。援脊有一行巴蜀符号。



141. 戈

战国

长23、宽13.5厘米

2000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秀峰中学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长胡四穿，长方形直内，内上有一"山"字形穿。胡上有一龙纹和一巴蜀符号，另一面为花草纹图案。



142. 戈

战国

援长17.5、内长8厘米

1974年出土于重庆市万县（今万州区）新田公社，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圆尖锋，援中脊隆起，长胡三穿，内一穿。援本部两面均铸浮雕虎纹，虎身续刻于内上。其一面援下部有三水滴纹，援上部有一行巴蜀符号。



143. 矛

战国

长23.5、宽3.5厘米

1998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李家坝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巴式矛，尖锋，中脊隆起，长骹，骹两侧有上小下大的弓形耳。器身和骹上部饰云纹，骹下部饰兽面纹，骹尾部饰一周云纹。



144. 矛

战国

长16.1、宽3.4、骹径2.2厘米、重127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99（M99：13），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锋锐厚，狭刃，两侧有血槽，刃下端本的部位近直角。宽骹，与刃连接处有双系，系上有三或五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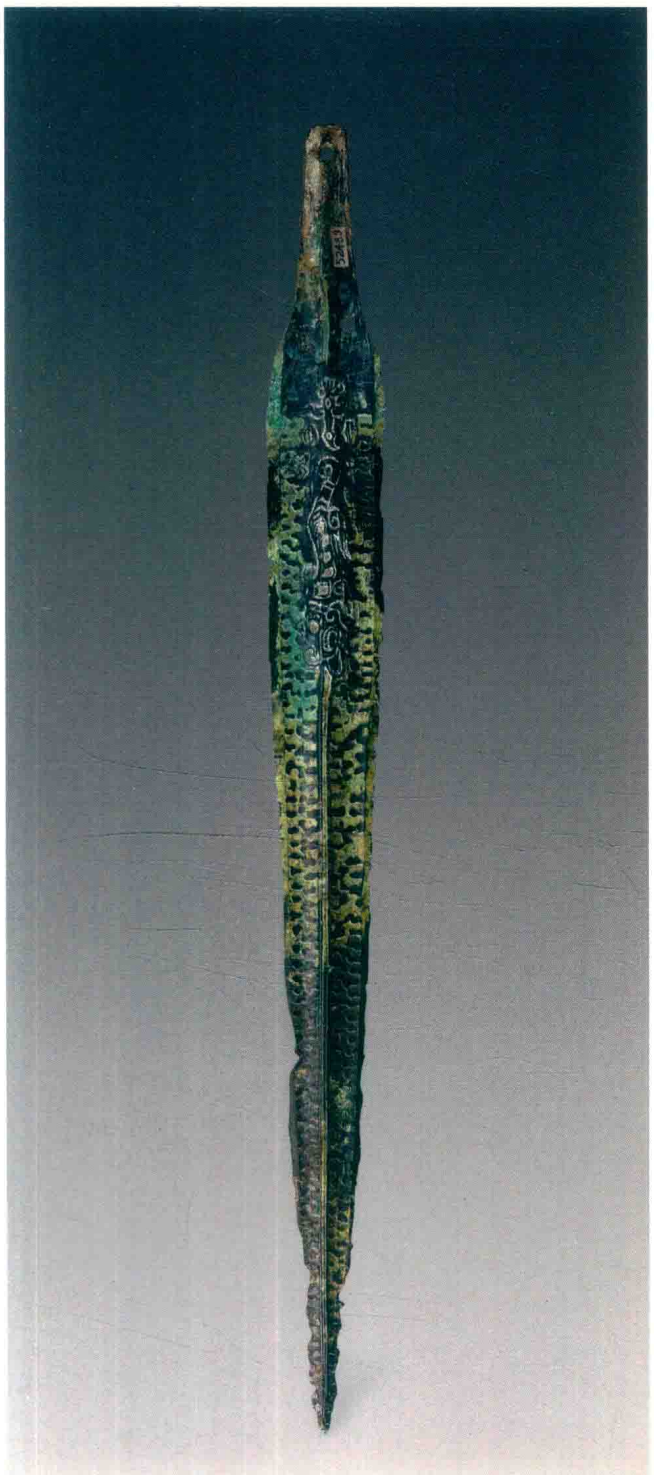
145. 剑

战国

长50.2、宽4.7厘米

1954年出土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冬笋坝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整体呈柳叶形，有中脊隆起，腊和茎无明显分界，无格，剑身接茎处收敛明显，扁茎有两穿。剑身布满虎纹斑，剑基部有虎纹、鸟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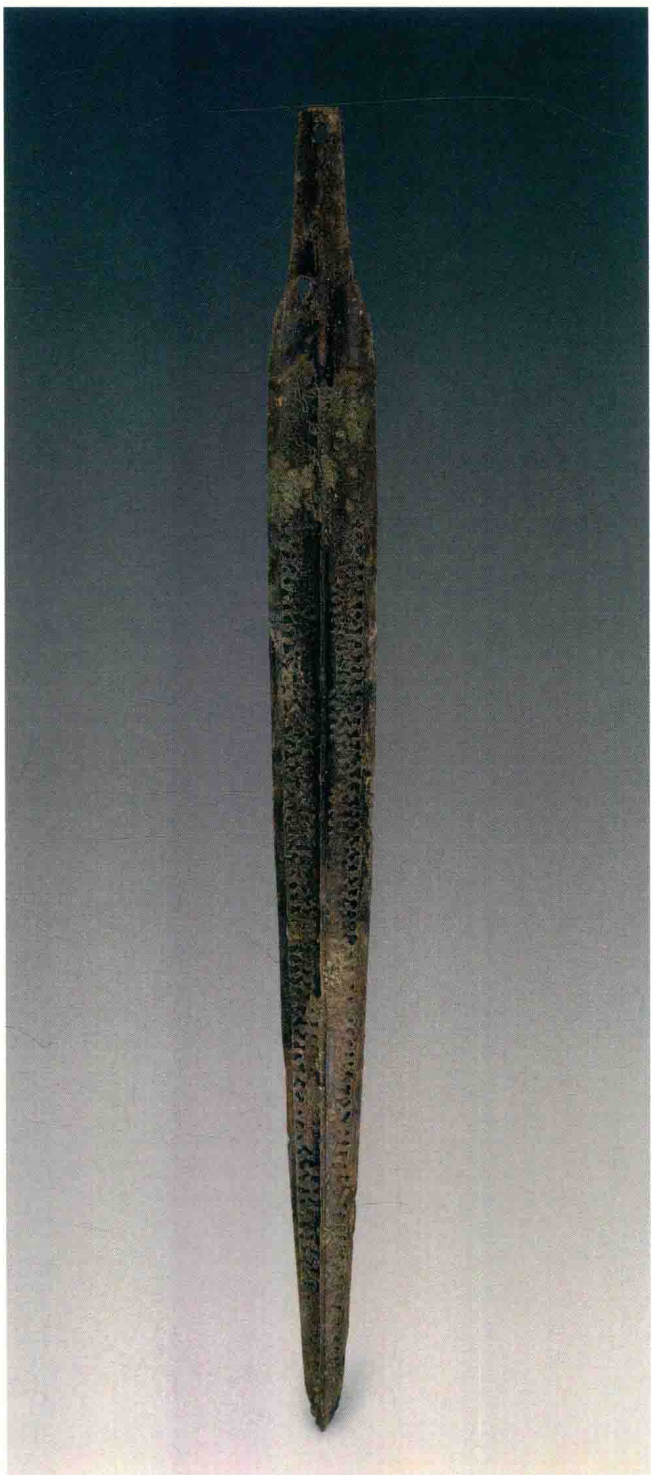
146. 剑

战国

长53.6、宽4.6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呈柳叶形，扁茎无格，茎有两穿，一穿位于靠剑身处一侧，一穿位于茎端中间，剑身布满虎斑纹。剑身近柄处一面饰有手心纹图案组合，另一面饰以虎纹图案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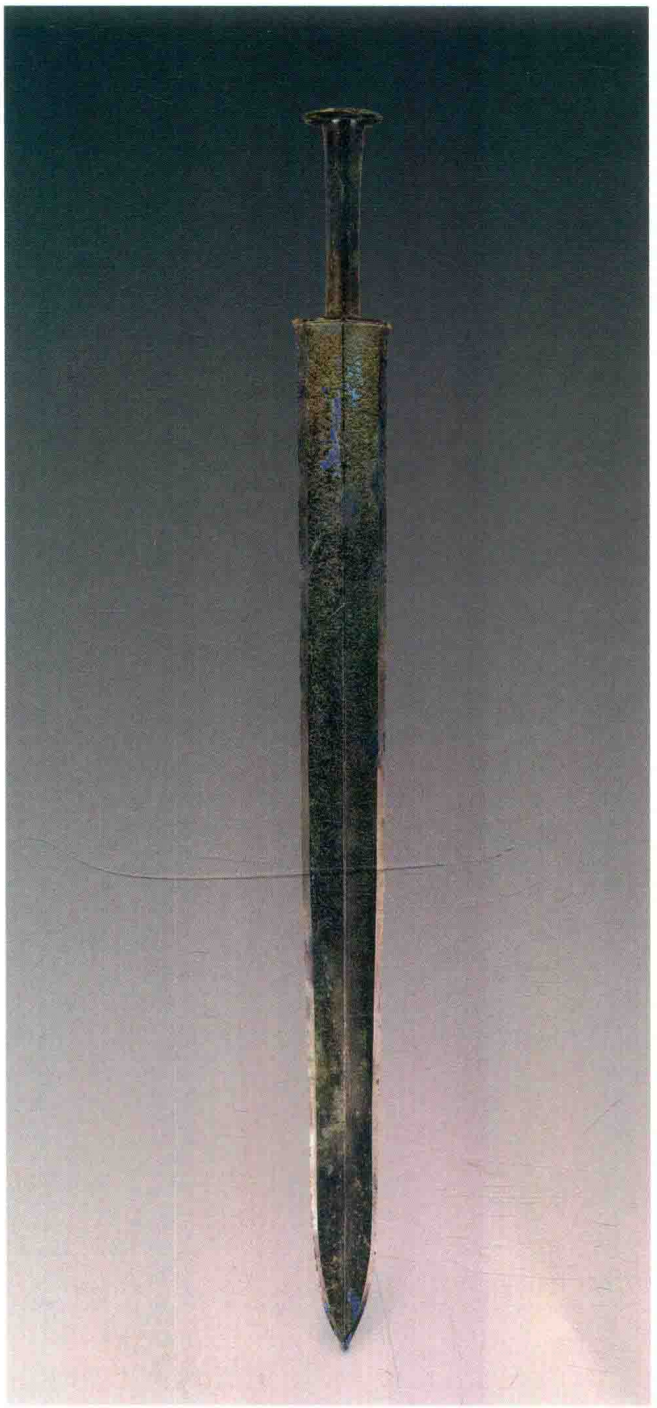
147. 剑

战国

长55、宽4.2、首径3.5厘米，重710克

2000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秀峰一中墓地M4（M4：1），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圆茎圆首，菱形薄剑格，腊中部起脊，两从斜宽，长腊后段宽，前段逐渐收窄，至锋处尖削，刃部有使用缺痕。通体呈墨绿色。



148. 剑

战国

通长36.4、茎长10.9、宽3.7厘米，重308克

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武隆县土坎遗址M6（M6：7），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柳叶形圆茎式。腊后端渐内收与圆茎相连，连接处以两叶状铜片包裹，再以绳状箍固定。圆茎略呈亚腰形，上有一箍三穿，箍与茎之间有两小环耳，茎前段间隔饰重波折纹和凹弦纹，后段饰重三角纹。



149. 剑

战国

剑长24.9、宽3.1、厚0.7厘米；剑鞘长19、宽4.9厘米；剑鞘耳长5.3、宽2.9厘米，重286克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群M20（M20：12），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剑呈柳叶形，扁茎有两穿，无格，茎和腊分界不明显，前锋圆锐，腊后段一面饰手心纹、蝉纹，另一面饰虎纹及其他巴蜀图语。剑鞘呈长方形，两侧有耳，正面饰缠体龙纹，正面及双耳表面贴金，背面残。









150. 车軎

战国

高7.9厘米，两端直径3.1、5.5厘米，单个重366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66（M66：6），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2件，大小、形制相同。整体呈喇叭状，平顶，内端有两穿，用以插辖。器表饰错银几何纹。



151. 车軎帽

战国

高6.4厘米，两端直径2.5、3.2厘米，重104、119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66（M66：11），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2件，大小、形制相同。外形似葫芦，平顶，内端口用以套接在轭首上。器表饰错银几何纹。



152. 泡

战国

高1.8、直径7.8厘米，重109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99（M99：80-2），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6件，大小、形制相同。呈球面形，正面饰三缠体兽面纹，背面有三个桥形纽。正面贴金。



153. 泡

战国

高1.8、直径6.5厘米，重55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99（M99：80-3），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2件，大小、形制相同。正面等分饰三兽面纹，兽面间有凹槽，背面有一个三足圆环纽。正面贴金。

154. 銮铃

战国

长11.2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上部为圆形的铃，铃内有弹丸，铃上有辐射状的镂孔。下部为长条形的柄座，柄座有两个对穿的长方形孔。



155. 带钩

战国

长7.1、宽3.2厘米，重53.8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66（M66：1），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钩身浮雕兽面，背面圆形钉柱（纽）残。通体鎏金。



156. 印

战国

高1.5、底径1.1厘米，重6.6克

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群陈家嘴墓地M23（M23：5），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牛角形纽，其上有一圆穿，圆形印面刻有巴蜀图语。





157. 圆鼎

西汉

通高14.3、腹径14.6、耳宽16.3厘米，重1.86千克

1988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西坪四队汉墓，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盖、身紧扣呈扁圆球形，弧形盖面，有三变体鸟形纽，两耳外撇，腹部一周尖凸弦纹，三兽蹄足。出土时即为全封闭状态，至今仍保留有近1/3的液体。



158. 釜

西汉

通高14.1、口径18.4、底径8厘米，重610.6克

2007年出土于重庆市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M63（M63：1），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敞口，沿上对称分布两辫索纹环耳，耳上各一鸟形纽，腹小于口，平底，四乳钉足。器身可见合范痕。



159. 釜

西汉

高10.8、口径19.6、底径9.5、柄长11.4厘米，重894.8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33（M33：17），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敞口，肩部有一中空长柄，其断面呈梯形，腹小于口，平底。器身及底可见合范痕。

160. 壶

西汉

通高65、口径14.4厘米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带盖，盖顶上有四个对称的鸟形纽。口略外侈，鼓腹，圈足，肩腹部有两个对称的铺首衔环。壶盖、器身遍饰错银纹饰。盖顶中心饰有三组变形的勾连凤鸟纹。壶身饰有变形勾连凤鸟纹和变体蟠螭纹。



161. 壶

西汉

通高58.3、壶高46.7、盖高13.5、壶口径17.7、盖径15.1、底径21.8厘米

2007年出土于重庆市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M130（M130：22），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有盖，子母口，弧形盖面，对称铸三鸟形纽。壶口微侈，束颈，溜肩，鼓腹，圈足。肩铸二衔环铺首，铺首上下饰三组带状弦纹。











162. 壶

西汉

高29.5、口径3.2、腹径32、厚8.5厘米，重2.39千克

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土城坡墓地Ⅵ M29（Ⅵ M29：6），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蒜头状小口，短束颈，椭圆形扁腹，长方形圈足，肩部对称饰二衔环铺首。

163. 盉

西汉

高10.9、口径7.5、柄长8.7厘米，重796.8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36（M36：21），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盖佚失。直口，一侧有扁纽，其上一穿，扁圆腹，中部铸流、柄及一周凸棱，流端作鸟首形，柄长曲中空，三兽蹄足。



164. 炉

西汉

通高16.5、口径11、底径10.5厘米，重810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遗址M2（M2：4），现藏于奉节县夔州博物馆。

熏炉，整体呈豆形。弧形盖，顶上一环纽，纽周围饰火纹，火纹外饰镂空花纹。炉身子母口，腹两侧铸二衔环铺首，铺首间及柄部各饰一组带状弦纹，柱形柄中空，喇叭形底座。



165. 炉

西汉

通高24.5、口径13.3厘米

1983年出土于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熏炉，整体似豆形，器身二铺首衔环，铺首上下及柄部共有三周宽带凸弦纹，底部阶状呈喇叭形。器身与盖作子母口套合，盖顶穿环纽，纽外凸雕二盘旋对应的蜥纹及云纹，纹间因势镂空，再外环列两周长方形空孔，每周四十三孔，现有部分孔破损。



166. 炉

西汉

通高18.5、口径7.8、下盘径14.4厘米，重950克

1983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苏家坡烟厂西汉墓，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博山炉，由盖、身、柄、底承盘四部分组成。盖与身有活梢套合，呈尖桃形。盖顶铸坐猴捧桃，盖面浮雕山峦八座，分两层环绕，山间浮雕四兽，有十二个圆穿。炉身呈半球状，喇叭形柄，盘形底座。盖与身的口部各饰两周弦纹，弦纹间饰水波纹，炉身腹部饰一周仰莲瓣纹。





167. 灯

西汉

高22.7、盘径9.6、底径11厘米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奉节县永安镇西汉墓地，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上为圆形盘状盏，盏心一烛钉，中间是一人形柱，圆形底座，底座上纹饰模糊不清。



168. 灯

西汉

高41.2、盘径29.1、底径21厘米

2007年出土于重庆市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M45（M45：18），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由灯盘、柱、底座三部分组成。灯盘呈环状凹槽形，内有三隔断，将灯盘均分成三段，每段内有一枚钉形烛钎。灯柱上端发三叉，承托灯盘，下段为实心圆柱，中部凸出。底座呈覆盘形。

169. 灯

西汉

高13.5、长14.5、宽8厘米，重550克

1983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龙洞一队汉墓，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呈跪姿羊形，中空。昂首，长须垂至颈部，后颈有活梢与背衔接，背与身可分合，启用时，将羊背上翻至羊头顶，即为灯盘，盘中铸钉形烛钎。





170. 灯

西汉

高9、长15厘米

1984年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县（现涪陵区）对岸西汉墓，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犀牛形，呈站立状，身体肥硕，颈部短粗，头部有独角，四肢粗短，腹部中空，尾巴细短，为盖的开合处。



171. 卮

东汉

通高18.3、口径10.4、底径10.4厘米，重538克

2002年出土于重庆市万州区蕉芭石墓群M17（M17：2），现藏于万州区博物馆。

带盖，弧形盖面，有三变体鸟形纽。器身子母口，口下有一环状带柄鋬，圆筒形直腹，腹上下各饰一组带状弦纹，平底，三兽蹄足。器表鎏金。





172. 书刀

东汉

长20.3、身宽1.1、柄宽3.2厘米，重341克

2005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土城坡墓地Ⅲ M45（Ⅲ M45：2），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环首，直柄，柄端伸入环首中，柄与刀身无界，直背，单刃，偏锋。刀身两面饰线刻花纹。通体鎏金。



173. 镂空棺饰

东汉

长17.3、宽11.7、厚0.05厘米，重50克

1987年出土于重庆市巫山县巫福公路汉墓，现藏于巫山博物馆。

不规则长方形镂空薄片，中部有圆穿。正面镂空图案为西王母、龙、虎及羽人。西王母居中端坐于祥云之上，着羽衣，双手拢于胸前，头顶一盖伞，显得十分端庄、美丽。龙、虎分别位于西王母左右，虎右侧有山峦，山顶上立一羽人，右脚踏于峰顶上，双手上举托伞盖（右手残），腋下生双翼，身后有长尾。背素面。器表鎏金银。

174. 马俑

东汉

高91、长83.5、宽21.6厘米，重24.98千克

2001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杨沙墓群，现藏于云阳县博物馆。

体粗壮，昂首，张嘴露齿，尾后扬，四蹄作行走状。



175. 牵马人俑

东汉

马俑高123、人俑高85.4、马俑长74.3厘米

2006年出土于重庆市忠县老鸹冲墓群张家包墓地M2（M2：70），现藏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立姿，人、马体形均修长。马昂首，张嘴露齿，尾上扬，尾端呈球状。人俑头戴巾帻，身着交领右衽束腰中长衣，右臂侧伸，左臂靠于胸前，作牵马状，右手残。模铸合范，马头、颈、身、四肢分体铸造，垒叠放置。



176. 鼓

春秋

高39、面径41厘米

1975年出土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万家坝古墓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鼓面饰太阳纹，共十八光芒，芒外有弦纹。腰部饰交叉的垂线纹，圈足处有一周云纹。内壁为菱形网状纹，网之四角呈卷云形。腰、胴间有四扁耳。鼓面有炊烟痕迹，除作乐器外，兼有炊具功能。





177. 壶

战国

通高35.5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小口，长颈，圆腹，小平底。鼓形盖，顶端铸一牛，头微仰，尾下垂。

178. 杯

战国

通高29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敞口，腹斜直，平底，圈足。腹部及圈足处有双旋纹及斜方格纹；盖上有孔雀及竹节纹。盖顶铸一牛，头微倾，尾下垂。



179. 镈钟

战国

通高33、纽高8.2、口宽14.7厘米，重1.95千克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乡打卦坟山，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半环纽，器身两面各饰云雷纹两组，近口部饰一周牛头纹，器身两面中上部各有长方形和圆形的音孔两个。



180. 编钟

战国

高15～21.9厘米

1975年出土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万家坝古墓群，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一组六件，器形相同，大小不一。器身上小下大，椭圆形，顶端有羊角形纽，纽下有长方形穿孔，无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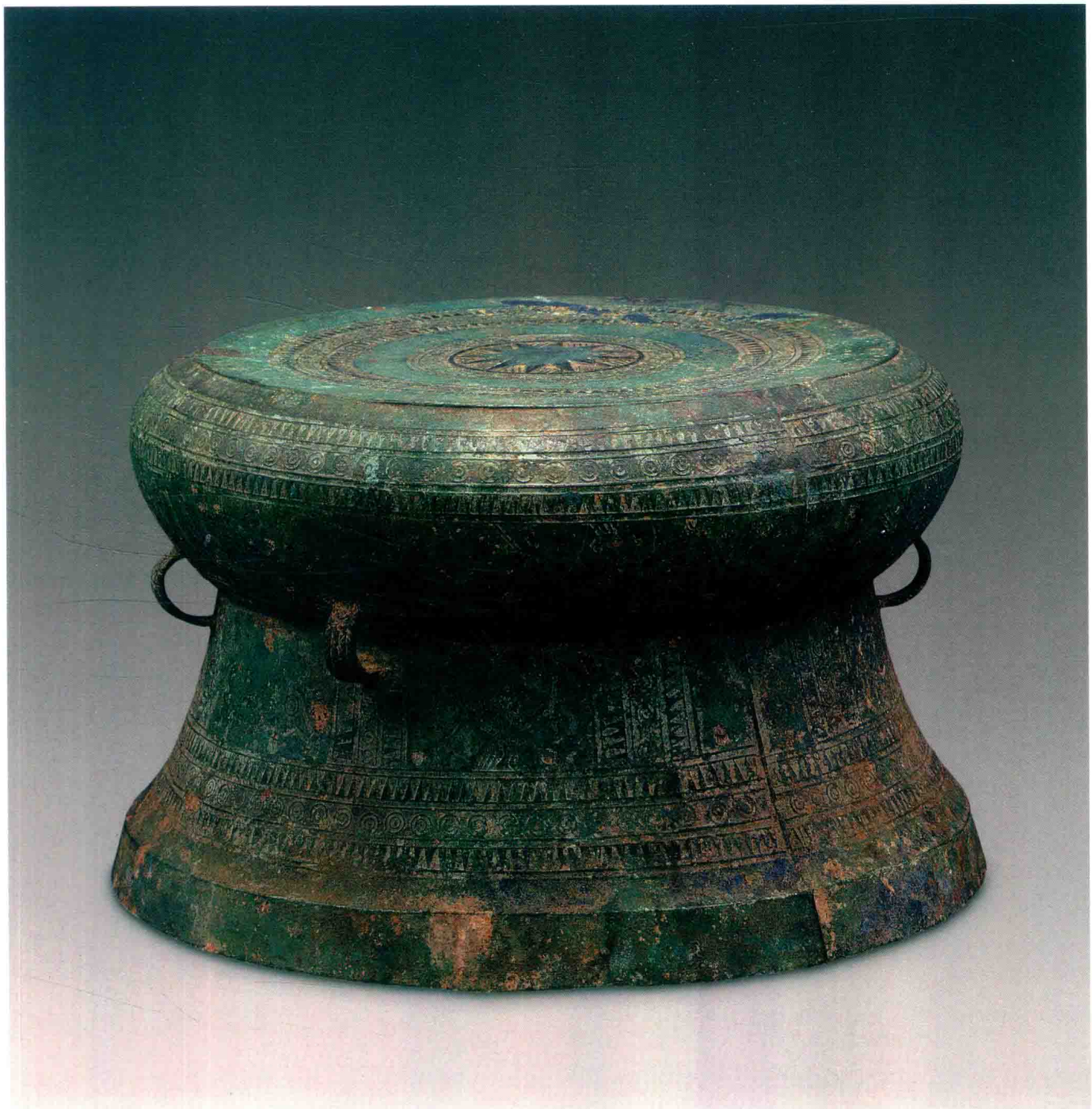
181. 鼓

战国

高30.1、面径39.1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鼓面饰十二光芒太阳纹，芒间有斜线三角形纹。其外共五晕，由同心圆纹和锯齿纹等相间而成。胴部四晕，一至三晕为锯齿纹及同心圆纹，第四晕较宽，有船纹四组，每船载四至五人不等。腰部及圈足共四晕，其中第一晕较宽，由锯齿纹间以圆圈纹组成条带，将此晕纵分为八格，其中两格饰牛纹，三格为戴羽冠的舞蹈者，另外三格无纹饰；二至四晕为锯齿纹及同心圆纹。腰、胴间有四扁耳。





182. 钺

战国

长21、刃宽11.5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中三甲卡巴洼，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銎顶呈椭圆形，斜肩，弧形刃，刃面起脊，脊的两侧有圆圈纹，柄上部饰有横排折线纹，中部、下部有两对对称的圆圈纹。



183. 钺

战国

长18、刃宽16.5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中三甲卡巴洼，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椭圆形銎，长柄，左右有两侧斜肩，靴形刃，肩部有一段几何纹饰。

184. 钺

战国

通长21.6、銎口长8.3、刃宽19厘米，重492克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中三甲卡巴洼，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銎部呈椭圆形，光素无纹，銎上宽下渐稍窄，柄中部饰网格纹，纹饰两边各有一圆圈纹，上圆圈中有一点，下圆圈中有一“十”字。刃口长而锋利，刃面为不对称形，刃身两端后卷曲且尖锐，在卷曲凹部边沿饰有排列规整的直线纹。



185. 钺

战国

长20、刃宽23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八甲水冲坑，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銎部似呈椭圆形，柄中部有圆圈纹、几何纹饰等，斜肩，靴形刃，刃部两端不对称，柄上部部分饰有几何纹饰。



186. 狼牙棒

战国

通长32、矛长12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棒作八棱形，圆銎，其上有排列整齐的锥刺。棒端有一圆形座，上接一矛头。



187. 剑

战国

长28.2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柄及刃部后端有浮雕人像，皆大眼、长齿、巨型嘴，形象奇特。其中一人右手执剑，左手提人头；另一人高举双手作下蹲跳跃状。似巫师作祭祀活动。



188. 弯刀

战国

通长57.6、銎长9.2、刃长69.1、宽2.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大甸山墓地，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器形硕大，銎部为椭圆形。柄两侧有凸起的人面纹，人面由弯眉、圆眼、三角鼻、圆嘴构成，眉鼻相连，形似羊角。在人面纹与銎口之间有一周两条弦纹夹竖条纹的花纹带。沿刀背部下侧饰“几”字形血槽。刃尖部向后卷曲一周。



189. 箭箙

战国

通高36.5、中高32.5、底宽28、厚5厘米，重2.5千克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田园镇中三甲卡巴洼，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器形特异，仅在哀牢地区发现的一种祭祀器。整体呈扁长方形，由上宽下渐窄的盒盖和上窄下渐宽的盒身扣合而成，扣合部内收呈束腰状，盖顶下弧呈马鞍形。盖上半部饰带点圆圈纹，下半部饰束线菱形纹。盒身上半部饰束线菱形纹，下半部饰带点圆圈纹。两侧布满三横线与一排圆圈纹相间纹饰。盒身两侧和盖顶部有半圆形环纽。盒底形平、素面无纹饰，铸留不规则近方形孔四个。



190. 臂甲

战国

高21.7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圆筒形，上粗下细，与人之手臂同。背面有开口，口沿处有对称的穿孔两列，便于系索紧束。甲面遍布精美、纤细的线刻花纹，为豹、虎、熊、鹿、猪、鸡、鱼、虾、蜈蚣、蜜蜂、甲虫等十余种。线条流畅、活泼，形象生动、逼真。



191. 线盒

战国

通高31.2、盖径18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器身上段为圆形，下段渐收束，至底部成圆角方形，平底，底部有四扁平足。器盖饰蛇纹及竹节纹，顶部铸立牛五头，牛腹上有云纹和编织纹。盒内装残丝线。





192. 棺

战国

高82、长200、宽62厘米，重257千克

1964年出土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大波那村，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棺身作长方形，棺下有矮足，整体似一悬山顶干栏式建筑。此棺共由七块铜板组成，板与板间有榫口套接，可装可卸。两侧板及顶板外壁铸云纹及蛇形纹，头、尾板有虎、豹、猪、马、鹿、鹰、燕等动物图案，底板无纹饰。

193. 案

战国

中高11.4、两端高14.6、面长36.6、两端宽24.3、中宽15.2、案面厚0.3厘米，重2.61千克

出土于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曲石江南村张家寨，现藏于保山市博物馆。

中部微凹的长方形案面，案面花纹由锯齿纹、双勾连旋纹相间而成。案面下两侧各有一横三纵构成的“山”字形足，两“山”字之下端用细横梁撑连，以增加稳固性和承重力。足面上布满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饰，通体布满铜锈。器物总体显得既小巧轻便又庄重，纹饰精细秀美，铸造工艺精湛。





194. 案

战国

高43、长76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由一虎二牛组成。案体为一立牛，四蹄作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相连。呈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下横置一小牛，立于大牛前后腿间的横梁上，尾端有一虎，虎口紧咬大牛之尾，四爪抓住其后胯。大牛颈肌丰满，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有一虎，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一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







195. 枕

战国

高15.5、长50.3、宽10.6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整体作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一牛。枕之一侧有云纹；另一侧为云纹底，其上有虎噬牛浮雕图案三组。出土时在死者头下，部分耳环及头骨残片尚粘于枕面。

196. 头箍

战国

长58、宽4.5厘米

1980年出土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鳌凤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整体为一弯曲形铜片，有弹性，其外侧铸鸟兽及乳钉纹。铜片两端各有一穿孔，便于系索紧束。此头箍亦称发箍，为辫发昆明人的束发工具。



197. 扣饰

战国

高12、宽12.5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二猎手各骑一马，手执长矛作下刺状。马前有二鹿，其中一鹿被刺倒地，一猎犬扑向鹿身，张口欲噬；另一鹿亦将被刺中。其下有一蛇，口咬马尾，尾绕猎犬之后腿。背面有矩形扣。





198. 扣饰

战国

高8.7、宽10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四人共猎一虎。其中三人按伏虎背，一人被虎咬伤倒地。一猎犬紧噬虎之后胯，另一犬咬住虎的前腿。其下有一蛇，口咬倒地猎人之耳，尾绕虎之尾部。背面有矩形扣。



199. 扣饰

战国

高6.5、宽12.3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二猎人共猎一野猪。一猎手被野猪咬住腰部，将要倒地，其前有一猎犬，作惊惧逃遁状；另一猎手持剑猛刺野猪之后胯，一猎犬咬猪之腰部。其下有一蛇，口咬猎犬之前足，尾绕野猪之后腿。背面有矩形扣。

200. 圆鼎

西汉

高29.2、口径33.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200），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腹较深、三足弧曲，呈窄瓦状，口部有绳索状环耳。



201. 壶

西汉

高29.3、口径6.2、腹径19、足径14.6厘米

1980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八塔台M69（M69：13），现藏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蒜头形，细长直口，口部厚唇，溜肩，鼓腹下垂，平底，矮圈足。通体遍布细线刻纹带，由尖齿、菱形、翎羽等构成带状。





202. 瓶

西汉

高29、口径1、最大腹径15.6、足径12.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牡宜M4（M4：15），现藏于广南牡宜考古发掘队。

小口，细长颈，葫芦形瓶身，镂空圈足。瓶身对称有两圆环状耳；上腹部有一穿孔，近圆形；圈足为两排错向三角形镂孔。器表绘红、黑彩，上腹部绘卷云纹，中部绘对向三角形纹，下腹部绘变体龙纹。

203. 杯

西汉

通高52.4、杯高22、杯口径9.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315），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体瘦高，有盖。器身敞口，方唇，斜直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宝塔形盖，中空，分为四层，第一层立有两只锦鸡，盖顶立一孔雀。杯身饰回旋纹、三角齿纹、弦纹等。



204. 贮贝器

西汉

通高37、器高32.7、盖径26.6 ~ 28、底径25.9 ~ 27.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6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盖上为驯马场面。腰较粗微束，两侧另铸立体的虎形耳，虎前后足分别相并而立，张口，尾向上卷曲。虎足下有带小孔的长方形榫，穿入器壁卯眼，以竹签销入小孔固定双耳。底部三足断面呈“门”字形。盖较高，不甚圆，盖上立十人七马，分八组另铸，每组底部为下有钉榫的片座，钉榫穿盖面卯眼后弯折固定。十人皆头顶梳螺髻，缠头帕，束腰带，跣足。盖面中央一组为三人，其余七组环盖周沿分布，大致相若，为一人牵一马。



205. 贮贝器

西汉

通高34.5、盖径16.6厘米

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圆筒状，腰部微束，下有三足。足作踞坐人形，头部和双手上托器身。腰部有阴刻花纹，一组为衔蛇孔雀六只；另一组四人，有的牵牛，有的赶牛，有的持斧。还有鹿、牛及绳纹图案。器盖为圆盘形，顶端铸一牛，周有一虎三鹿。





206. 贮贝器

西汉

通高65.8、上鼓高22.2、下鼓高28、盖高15.8、面径27.3、胴上径30.6、胴下径39.3、底径45.2厘米，重约24千克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142），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器为两鼓正置，上下重叠焊接而成。上鼓无盖面，器盖单独制作，用活扣与鼓身相连，下鼓焊铸一底。上鼓腰足部焊铸四卧鹿；下鼓腰足部焊铸四卧牛。胴部与腰部交界处有四宽绳纹耳。器盖上铸一立体狩猎场面：盖沿周边为两骑士和两鹿，骑士马下分别有一兔、一狐狸，器盖中央站立一猎人，其前后各有一猎犬。该狩猎场面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为骑士、猎人、猎犬共同追杀一鹿。骑士左手牵缰绳，右手执兵器（已残）策马向鹿刺去。该骑士通体鎏金。猎人手执长矛刺鹿，长矛已残。身前之猎犬亦在追逐此鹿。第二组为骑士、猎犬追杀另一鹿，该骑士亦左手握缰，右手执兵器正欲猎杀另一鹿。除上鼓器盖狩猎场面外，该贮贝器两鼓胴部、腰部、足部均布满阴刻线纹组成的图案——一幅表现亚热带及热带气候与生物、动物之间关系的景象。骑士马下的一兔和一狐狸分别是两个销钉用以固定器盖和铜鼓。

207. 贮贝器

西汉

通高42、身高21、腰径16.8、底径20.2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133），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器身为细腰圆桶形。盖径与底径略等，子母口套盖，平底，底有四只片状兽足支撑。腰部铸有左右对称两虎形耳，尾下垂弯曲紧贴于器壁上。器盖上铸立体动物搏斗场面：盖顶中央立一大树，树枝成二层四叉。树下为两牛同一虎相搏，虎居中作嘶吼状，两侧各有一牛作搏斗状，一牛用角将虎后腿挑穿，另一牛用角顶虎。树枝上两猴相背，一前伏，一蹲坐，尾相缠绕；两鸟作惊恐之状，振翅欲飞。此器近盖顶及足部饰阴刻螺旋纹。器内贮满海贝。



208. 贮贝器

西汉

通高53、盖径32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身圆筒形，两侧有对称的虎形双耳，腰微束，底部有三兽爪形矮足。盖上铸各种形态的人物，干栏式房屋一间。



209. 贮贝器

西汉

器高30、盖径32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为杀人祭铜鼓场面。器盖上共雕三十二人，马五、牛一、犬一。所有的人物大致以铜鼓的双耳为中线，分左右两组。左侧一组为祭祀场面。中央为重叠的三个铜鼓，作为祭祀的崇拜对象。右侧一组诸人均围绕乘舆之主祭人。



210. 贮贝器

西汉

器高38、盖径30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为杀人祭铜柱场面。器作铜鼓形，有底有盖。腰部有线刻的狩猎图案，共八人，皆裸体，手中各持兵器作追逐野兽状。器盖两侧各置一小铜鼓，正中立一铜柱，柱之右侧竖立一牌，一裸体男子之双臂反缚于木牌上。木牌右前方坐一人，另有一人反缚双手跪地。铜柱后方列坐妇女四排，每排三至四人。一、二列妇女中立一男子。列坐者左侧另有妇女四人，其前有一男子。上述人物活动场面中有一乘肩舆之妇女，似为主祭人，其侧有女子二人，舆后跟一男子。乘肩舆者附近另有受刑者、执斧行刑者若干人。



211. 贮贝器

西汉

通高53.9、盖径33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由两个废铜鼓重叠而成，盖上共有圆雕人物二十二个，马五匹。盖之中央为一体形较大的骑士，似为主将。反映的是滇池区域的滇民族和滇西地区昆明人作战的场面。



212. 贮贝器

西汉

通高39.5、胴径127.2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由两个废铜鼓重叠而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修复如初。在两鼓相接的边缘处，雕铸立体人物、动物一周，其中人像十七，牛、马各二。腰、足部由三角形齿纹、同心圆涡纹等组成带形图案，足部另铸浮雕牛四头。整个场面似为滇国属下各族向滇王纳贡的情景。



213. 贮贝器

西汉

通高50、盖径26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器身上大下小，腰部微束，平底，三矮足。有对称的虎形耳，虎作攀登状，张口欲噬。器盖正中铸一鎏金骑士，周绕高封牛四头。



214. 贮贝器

西汉

通高49、盖径30.4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圆筒状，束腰，平底，底部有三兽爪形足。腰部为对称的虎形耳（其中一耳已脱落），虎作攀登回首状。盖上共铸八牛，中间一牛较大，其余七牛环绕其周。





215. 贮贝器

西汉

通高33.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30（M30：31），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束腰筒形，有四扁条形足，腰部铸两虎，盖面立七牛，中有一铜房模型。

216. 鼓

西汉

通高46.2、鼓高31.2、面径39.7、胴围138.2、腰围108.4、足围157.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6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鼓面上立有三骑马武士和一头牛，铸造精细，骏马高大强壮，鞍辔齐备。武士头戴高盔，戴大耳环，身披动物革甲，内着虎皮大衣，束腰带，佩长剑，跣足悬于马前腿侧，气宇轩昂，面稍向左即鼓外巡视。一、三骑间为牛，体形较小，牛角宽大，背和腹部披挂圆圈斑纹豹皮，头顶角间和颈系绳。鼓腰直，胴腰间四双耳。鼓面中央饰十二芒太阳纹。胴部上段有栉纹两周。腰部以栉纹和羽纹直分为十格，下段有栉纹两周。三骑一牛为失蜡法分铸，以榫插入鼓面。



217. 鼓

西汉

通高23.4、面径27.6、胴围99、腰围71、足围102.2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9（M69：17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腰略斜近直，胴腰间四双耳，鼓面中央为九芒太阳纹，芒部为复线三角纹，外有主晕，第二晕是主晕，为六只翔鹭。胴部上段为三角形齿纹间同心圆纹三周，下段为十八个羽人一周，腰部上段用羽状纹直分为六格，每格内一羽人，下段为三角形齿纹间同心圆三周。表面镀锡。



218. 鼓

西汉

通高27.2、鼓高14.8、面径17.5、胴围64.4、腰围48、足围65.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9（M69：16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面上边沿对称立四舞蹈人物，鼓较小。面中央圆形凸起，周围呈环形平底槽状下凹，胴上端最宽处内折略出棱，腰足微侈近直，胴腰间四单耳，表面遍体鎏金。舞人足下有长方形扁榫，榫中部穿小孔，插入鼓面卯眼，鼓内用竹签入小孔固定。四人皆站立，微屈膝，外着长披风，跣足，手作舞蹈姿势。



219. 鼓

西汉

高26、面径35.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9（M19：151），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鼓面平、胴部直径大于面、束腰、足部侈出、胴腰之间设四耳。鼓面铸芒纹、胴、腰部铸三角形齿纹、圆点纹及隐约可辨的船纹。



220. 鼓

西汉

高48、面径68厘米

1900年出土于云南省广南县阿章寨，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鼓面正中饰十四光芒太阳纹。其外五晕，由点纹、圆涡纹及三角形齿纹组成。胴部六晕，其中第四晕较宽，有船纹四组，船上有人、灶台及炊具等，其余五晕与鼓面同。腰部六晕，第一晕最宽，由齿纹及方格纹等组成条带，将此晕纵分为十四格，每格均有纹饰，以戴羽冠者和牛纹为主。圈足无纹饰。胴部与腰部相接处有四扁平耳，耳部饰编织纹。此铜鼓为云南出土铜鼓中最大和最精美的一件，至今仍光泽可鉴，毫无锈蚀。



221. 钺

西汉

长11.9、残刃宽15.6、銎径2.4 ~ 3.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88），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刃部呈新月形，宽而低矮，两端上翘，椭圆筒状銎，銎口内凹，一侧附半环单耳。环銎下段铸有多周弦纹、绹纹、三角形齿纹和双旋纹等组合图案，刃两端稍残。表面镀锡。



222. 钺

西汉

残长11.9、残刃宽11.2、銎径2.6 ~ 3.7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4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椭圆形銎部铸浮雕蟾蜍，銎部较短，蟾蜍身较宽，背上有扁圆形纹，两面相同，为头向銎口的蹲伏蟾蜍背面，前足环成双耳。刃部较宽，两端向外平伸，刃稍残。表面镀锡。





223. 钺

西汉

长1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527（M527：11），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靴形刃。銎口部铸一踞坐人形纽。



224. 钺

西汉

长15.3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04（M104：36），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靴形刃。銎口部立一人。

225. 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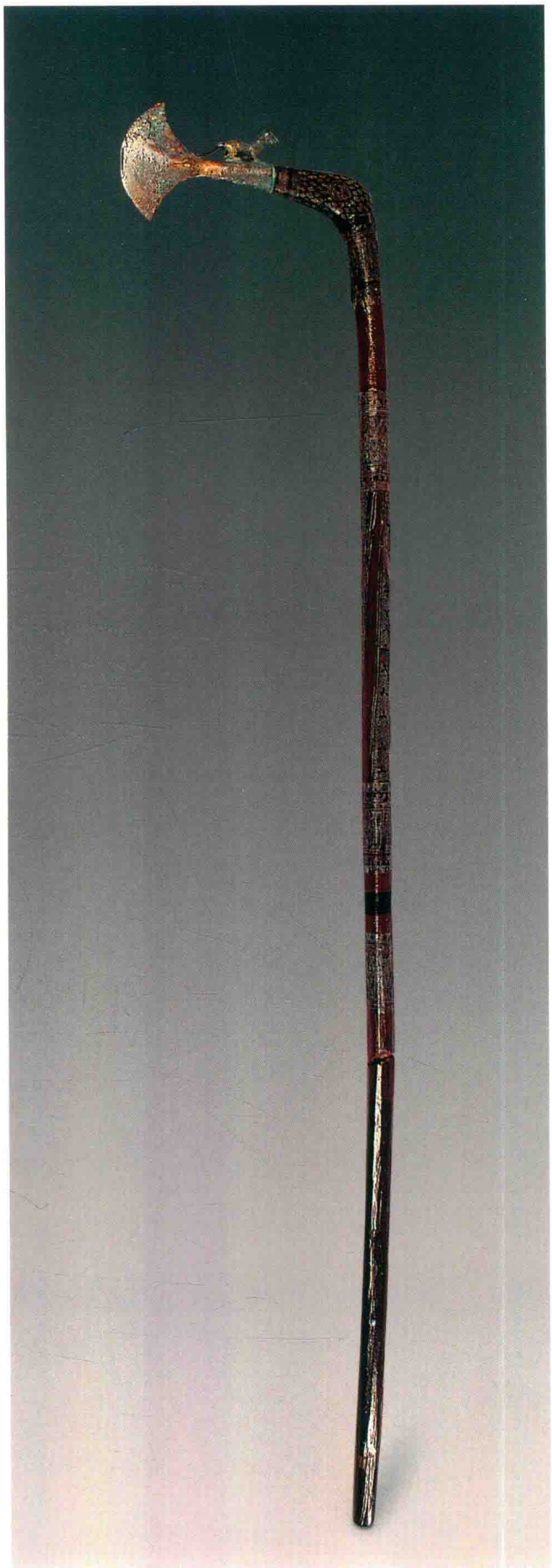
西汉

钺长13.8、柲长119.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182-8），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斧形刃。銎部立一兽，并饰有旋纹、回形纹图案，柲完整，曲处绘眼形纹，其下分段绘点线纹、三角形齿纹、编织纹等组合图案。







226. 钺

西汉

长10.2 ～ 15、刃宽8.4 ～ 16.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182-4），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新月形刃，直銎。銎铸弦纹、旋纹等，单系，带曲柲。

227. 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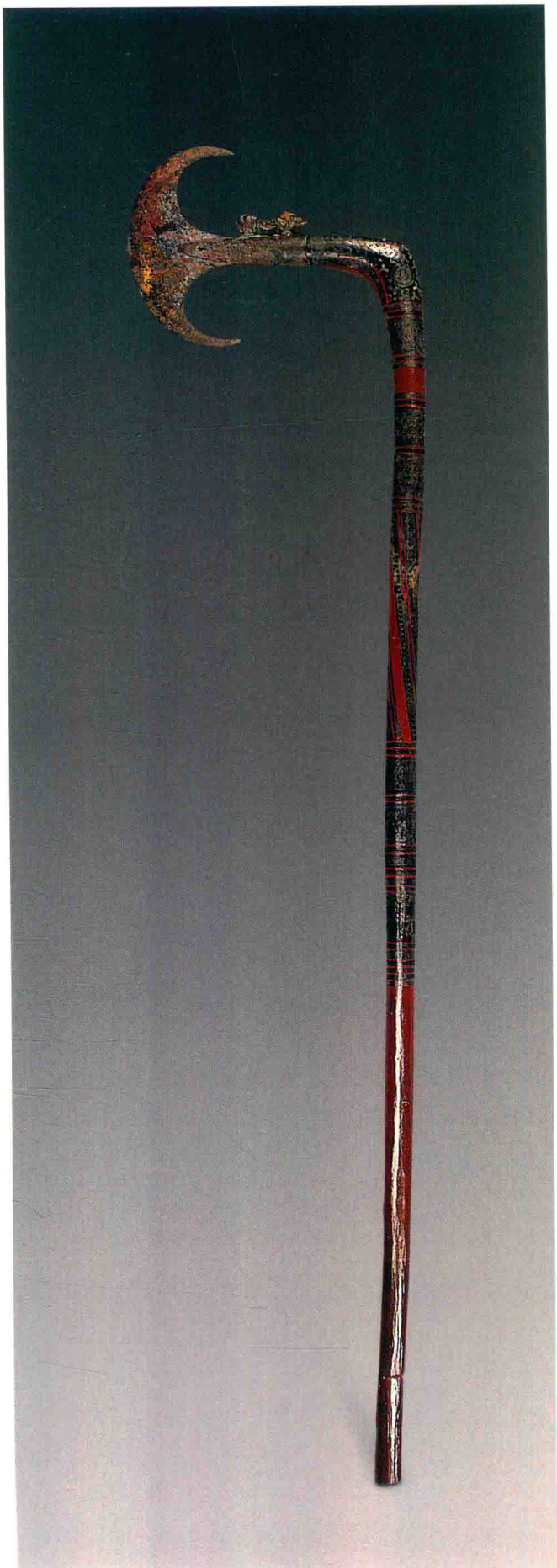
西汉

长10.2～15、刃宽8.4～16.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235），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新月形刃，直銎。銎部立一兽，銎铸弦纹、旋纹等。





228. 戚

西汉

通长22.9、刃长17.5、刃宽10.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19），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扁平刃，略呈卵圆形，前端尖出，中线起脊。以内固柲。刃后端铸有方形内，刃中部有孔，孔周为太阳纹，前接剔刺点三角纹，刃末较厚，上侧边沿有另铸的一立体狐，蹲伏，回首仰视，身下有钉榫，通过刃侧两面二小卯孔铆接，内后端饰卷云纹。表面镀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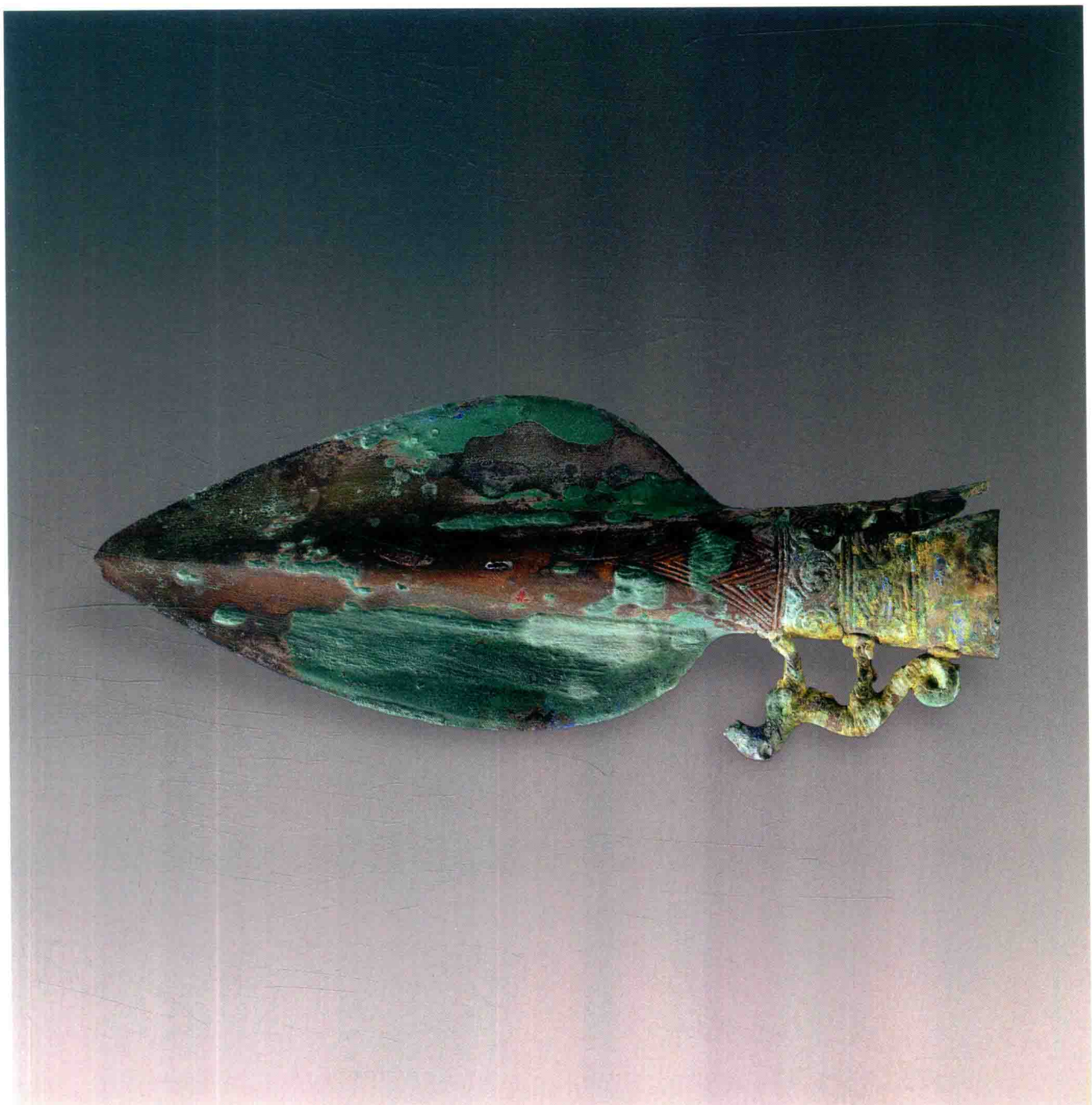
229. 戚

西汉

通长19.7、刃长13.6、刃宽7.6、銎径2.8 ~ 3.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30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扁平刃，略呈卵圆形，前端尖出，中线起脊。以銎固柲。刃后端两面隆起并向后伸出直銎，扁圆筒状，较短。器形略似矛，器形较小。刃中线凸起圆柱状脊，銎口内弧，銎侧铸立豹，刃后端饰雷纹，环銎饰多周回旋纹、绹纹、弦纹组合图案。表面镀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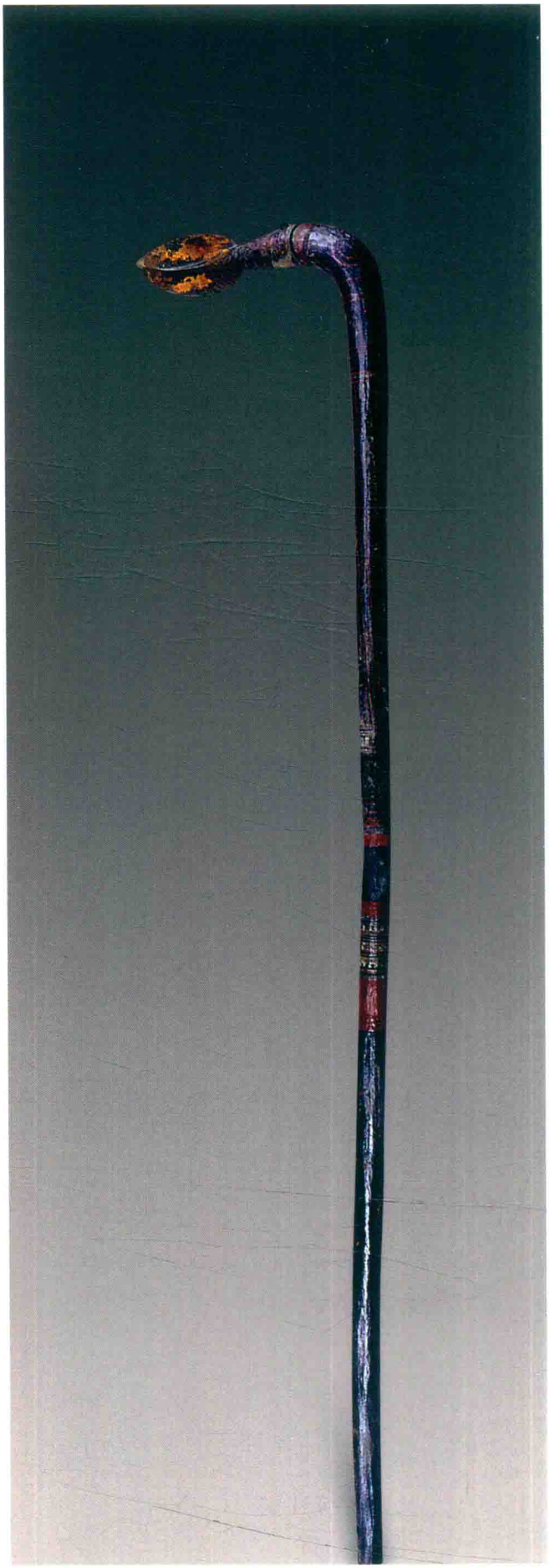
230. 戚

西汉

长17.2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328-4），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长銎不对称阔叶刃，单系，銎部铸弦纹、旋纹、三角形齿纹等。带曲柲。





231. 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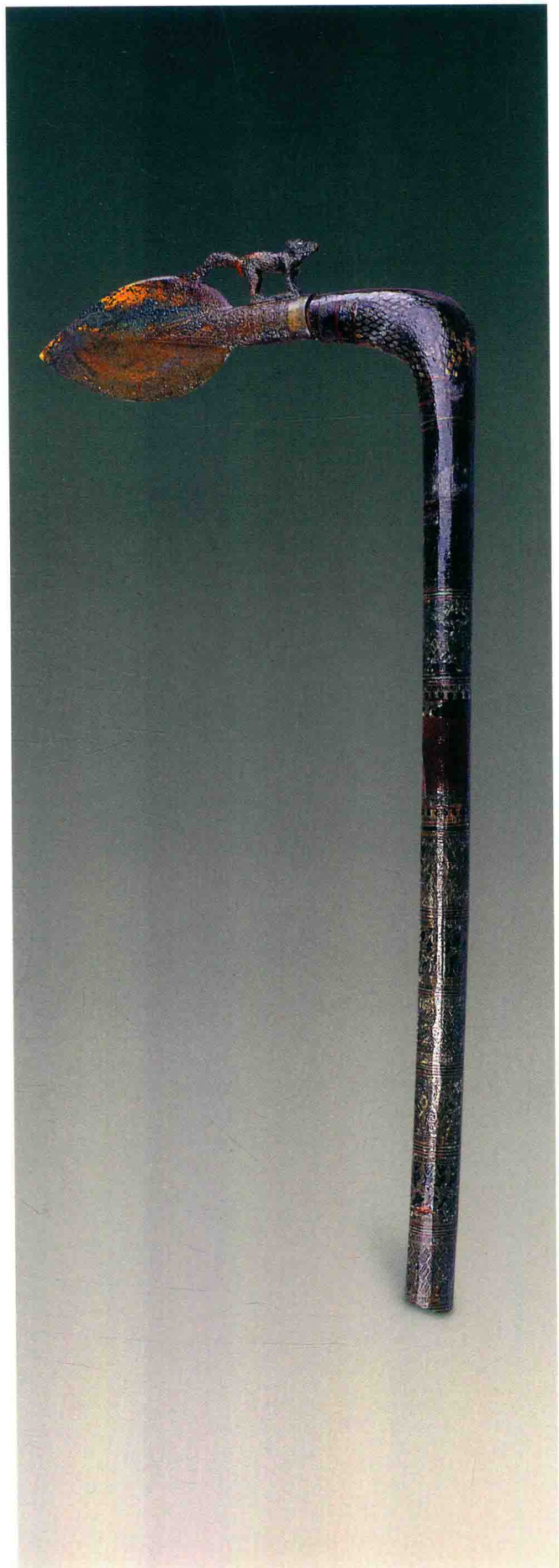
西汉

长15.2～1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337），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长銎对称阔叶刃，銎部铸立兽及弦纹、旋纹等。





232. 戚

西汉

长15～16.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328-5），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长銎不对称阔叶刃，双系，銎部铸弦纹、旋纹、三角形齿纹等。带曲柲。





233. 戈

西汉

通长26.3、援长20.1、阑宽7.7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1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援狭长，微向上弯曲，尖锋稍圆，前端较厚，中线起棱，断面呈菱形。援末及内上铸有单人形图案，太阳纹中央圆孔未穿透，锋稍残。表面镀锡。



234. 戈

西汉

通长22.6、援长16.4、阑宽9.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34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窄援平直，前端略宽向上弯曲，下刃平直前端上折，上刃内曲前端下折，尖锋略作三角形，援身中线有圆柱状脊凸起，无纹饰，内后端较阑侧窄。





235. 戈

西汉

通长28.1、援长21.8、胡长14.7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0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曲援。胡较长，援中段弯曲，前端弧形刃，锋尖聚在上缘。宽脊向后渐高，后端在援与内之间成张开的双翼。内前段作上下交叉状，后端似一头牛，牛角、耳向两侧伸出。两翼、胡和内上都有纹饰。胡上三穿，其中一穿未贯通成孔，纹饰以云纹为主体，辅以其他纹组成，脊后段有剔点纹。表面镀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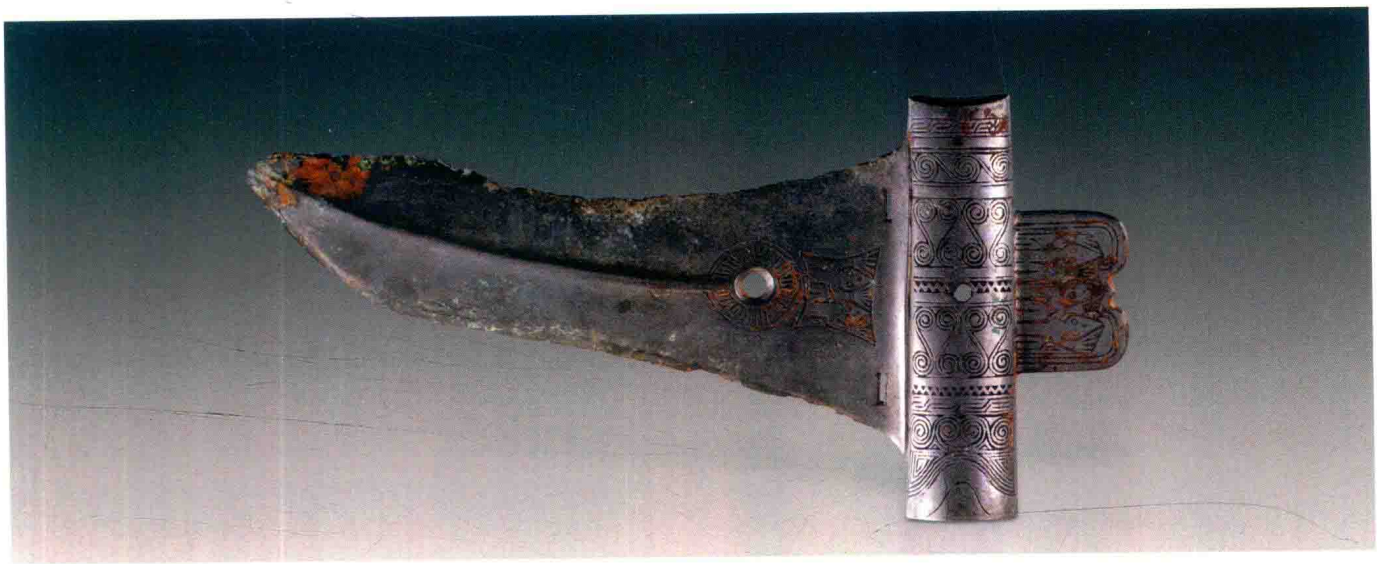
236. 戈

西汉

通长28.7、援长23.3、胡长12.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69），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直援较平，尖锋圆，前段断面呈扁圆形，后段脊两侧有凹槽，向后渐高渐宽，至胡前沿处向内折收成长条形，内空，断面略成方形。内前端有方形孔。胡有四穿，其中一穿未贯通成孔。



237. 戈

西汉

残长23.1、援残长17.2、銎长10.9、銎径2 ～ 2.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68），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援宽较短，向上弯曲，尖锋略呈三角形，前段中线有圆柱状脊凸起。内略呈方形。援上饰有太阳纹，援末及内上饰人形纹，环銎铸有多周纹饰。刃、锋稍残，援本有两穿，援上太阳纹中央有圆孔，援本饰二人形、内上饰三人形图案，銎上有以云纹为基调，与雷纹、锯齿纹、弦纹组成图案。



238. 戈

西汉

残长27.2、援残长20.1、銎长10.1、銎径2.1 ～ 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15），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短銎，援狭长稍向上曲，中线起棱，尖锋稍圆，后段较厚而内空，与銎内相通。内略呈长方形。刃、锋稍残，援刃锋利，銎有钉孔，内上有四兽，两兽相背而坐，另两兽后躯相连，立于坐兽身上，吻与坐兽头顶相接，似嬉戏的小兽。表面镀锡。

239. 矛

西汉

残长28.6、刃残长18、刃宽6、骹径2.1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95），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宽叶形刃，短而阔，刃前端窄长伸出，形状特殊，刃后端饰雷纹和旋涡纹，中线起脊，两侧叶扁平，圆筒状长骹，环骹上段饰多周回旋纹、雷纹、绹纹、栉纹等组合图案，骹下段为浮雕蹲蛙，下身缠一条小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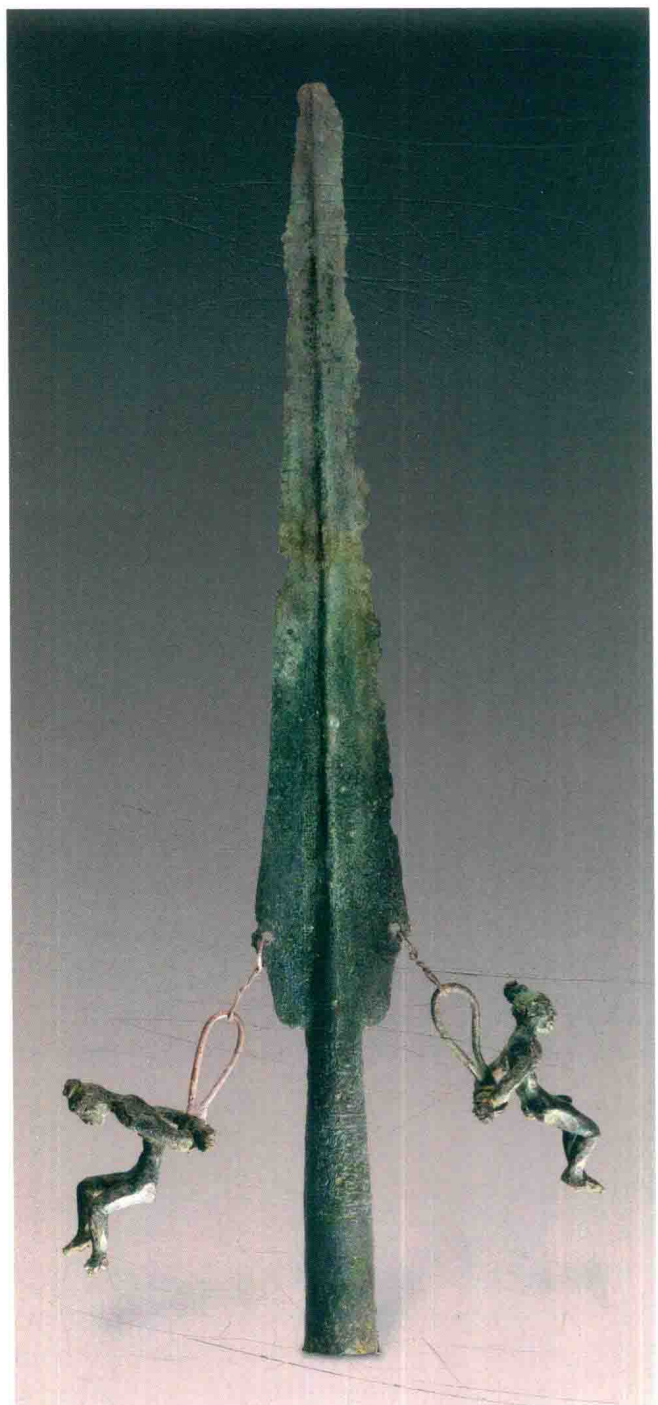
240. 矛

西汉

残长43.4、刃残长32.4、骹径2.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9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长刃，刃后锋曲，内弧至末端外圆，两侧折角处各有一小圆孔，分别悬挂赤裸铜人，男性，头顶螺髻，双手背剪，捆腕悬吊。环骹上段饰数周双旋纹、雷纹、三角形齿纹等组合图案，刃刺端残。铜人用失蜡法分铸，以铜丝拧固在矛两侧小孔悬挂。



241. 矛

西汉

通长24.6、刃长15、刃宽7.9、骹径2.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8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宽叶形刃，短而阔，中线起脊，两侧叶扁平，圆筒状长骹，表面镀锡。



242. 矛

西汉

通长37.8、骹长18、刃宽4.4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195⑮），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

长三角形矛叶，矛叶中线起脊。鸭嘴形骹，骹部附对称的双系，骹部饰螺旋纹、绳索纹等组成的图案，螺旋纹及绳索纹上饰有向外凸起的乳钉。



243. 矛

西汉

残长33.3、骸长12、刃宽4.4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195⑧），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

骸近刃末端饰弦纹、勾连螺旋纹，并有一人面图案，头发束辫上冲。刃后端有二穿孔，各系一人，仅存一人。此人双手反缚，其发倒垂。



244. 矛

西汉

长30.5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刃部后端两侧各吊一裸体男子，其发下垂，双手反缚，似为受刑之奴隶。





245. 矛

西汉

长17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阔刃，圆銎。刃部后端及銎上铸一浮雕蟾蜍，其前肢弯曲成銎侧的两环纽，后肢后蹲做跳跃状。



246. 镦

西汉

长12.3、口径2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51-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上段作长圆筒状，下段为立体鹿蹄形，近口处两侧有对称钉孔，与鼓形杖头同出。表面镀锡。

247. 剑

西汉

通长36.6、茎长10、腊宽3.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2：26-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短剑，无格，空心扁圆茎，稍束腰，首端较粗，首作“八”字形，顶端有一圆孔。腊狭长，双锷斜直，后端宽，内折收窄微内弧，腊末与茎之间有短“颈”，可装配竹木或革格。茎部和“颈”上铸有绹纹、双旋纹、菱形纹和线条纹组合图案。表面镀锡。



248. 剑

西汉

通长38.8、茎长7.4、格长7.9、腊宽5.7、玉标首长3.3、首径3.8～7.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2：10-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空首，边沿齐平，腊后端较宽，双锷弯曲较大，环茎铸有四周雷纹和弦纹组合图案，接格处为双旋纹，首端有一钉孔可穿销固定玉标首，玉标首呈椭圆锥形，首面平，乳白色泛绿斑，茎端残。



249. 剑鞘

西汉

残长2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239），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板状束腰形，鞘面铸回纹、弦纹、蛇纹及芒纹组合图案。背面可能为其他材料制成，已朽无存。



250. 剑鞘

西汉

长31.5～32.4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249），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束腰半筒形，一侧有提。鞘面铸三角形齿纹、旋纹、双首蛇纹等，有三组穿孔，其背面下部可能是其他材料制成。



251. 剑鞘

西汉

长28.5、最宽14、厚0.3厘米

1982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八塔台M246（M246：2-2），现藏于曲靖市文物管理所。

镂空形铸件，器形扁薄。上端略宽呈方折、下端略窄呈圆折构成框架，上饰云雷纹。框架中间依次排列六个大小不等的凸起泡形饰，其两侧各分列五个半圆弧（象征蛇身），下端为一蛇头形饰，上端则有二小蛇形饰；框架外上端为一蛇形饰，右边为蛇头，左边为蛇尾；框架外两侧由下向上各排列八条幼蛇向成蛇顺序变化的镂孔饰；剑鞘各图案均由刻画平行线及短线填充；剑鞘背面分布四排共十二个半环形扣。



252. 剑鞘

西汉

长28.5、最宽14.5、厚0.3厘米

1980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八塔台M69（M69：14），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镂空形铸件，器形扁薄。上端略宽呈方折、下端略窄呈圆折构成框架，上饰云雷纹。框架中间依次排列六个大小不等的凸起泡形饰，其两侧各分列五个半圆弧（象征蛇身），下端为一蛇头形饰，上端则有二小蛇形饰；框架外上端为一蛇形饰，右边为蛇头，左边为蛇尾；框架外两侧由下向上各排列八条幼蛇向成蛇顺序变化的镂孔饰；剑鞘各图案均由刻画平行线及短线填充；剑鞘背面分布四排共十二个半环形扣。框架外上端蛇形饰尾部已残。



253. 剑鞘

西汉

长28.2、上宽9.8、下宽4.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25-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两侧上端、中部和下部三处对称伸出，中间纵向稍弧起，上端和中部两侧伸出及下端的背面有凸起的穿系五个，以便和鞘相连。正面为浅浮雕纹饰，中间为三蛇缠绕。下端为男女二人相对跪坐，同伸双手，接递一壶。上端两侧伸出分别为青龙、白虎，面向同侧，中部两侧伸出为兔头正面，下部两侧伸出为卷云纹。



254. 弩机

西汉

通高14.2、郭长11.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87），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郭前端斜收，郭内铸隶书阳文“七年三月棘阳”，郭、望山、牙、悬刀、栓塞上均阴刻“二”符号。悬刀的扳部前面向右倾斜，沿两棱边凿有八个与侧面对穿的小孔。栓塞帽作六边形，顶圆形并弧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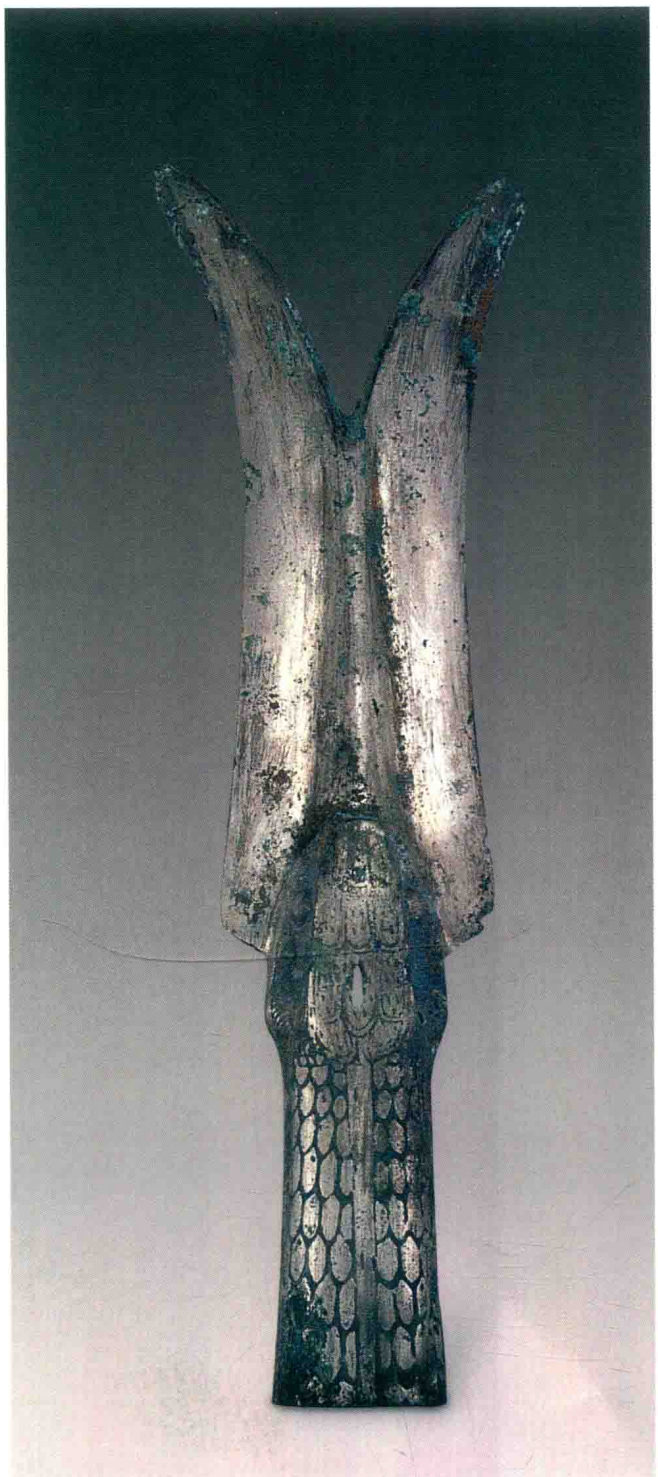
255. 叉

西汉

通长29、身长19.5、銎径2.9～3.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15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长銎，下段饰鳞纹，如蛇身，銎上端叉身末两面铸浮雕蛇头，叉身宛如蛇头吐出的巨大蛇信，叉身前端的两岔叉锋狭长，向两侧外分。表面镀锡。



256. 叉

西汉

残长19.1、身长12.8、銎径2.8～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6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叉锋短，叉锋间内弧并起双面刃，中脊前端分成两股，銎口内凹如张开的鸭嘴，銎两侧对称半圆耳。叉身后部和銎部饰三角形纹、雷纹、绹纹组合图案。



257. 棒槌

西汉

通长57.5、槌径5.2、銎径3.4、狗高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4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八棱棒，下端收细成圆筒状长銎，銎口分作三齿伸出，顶端铸立狗。表面镀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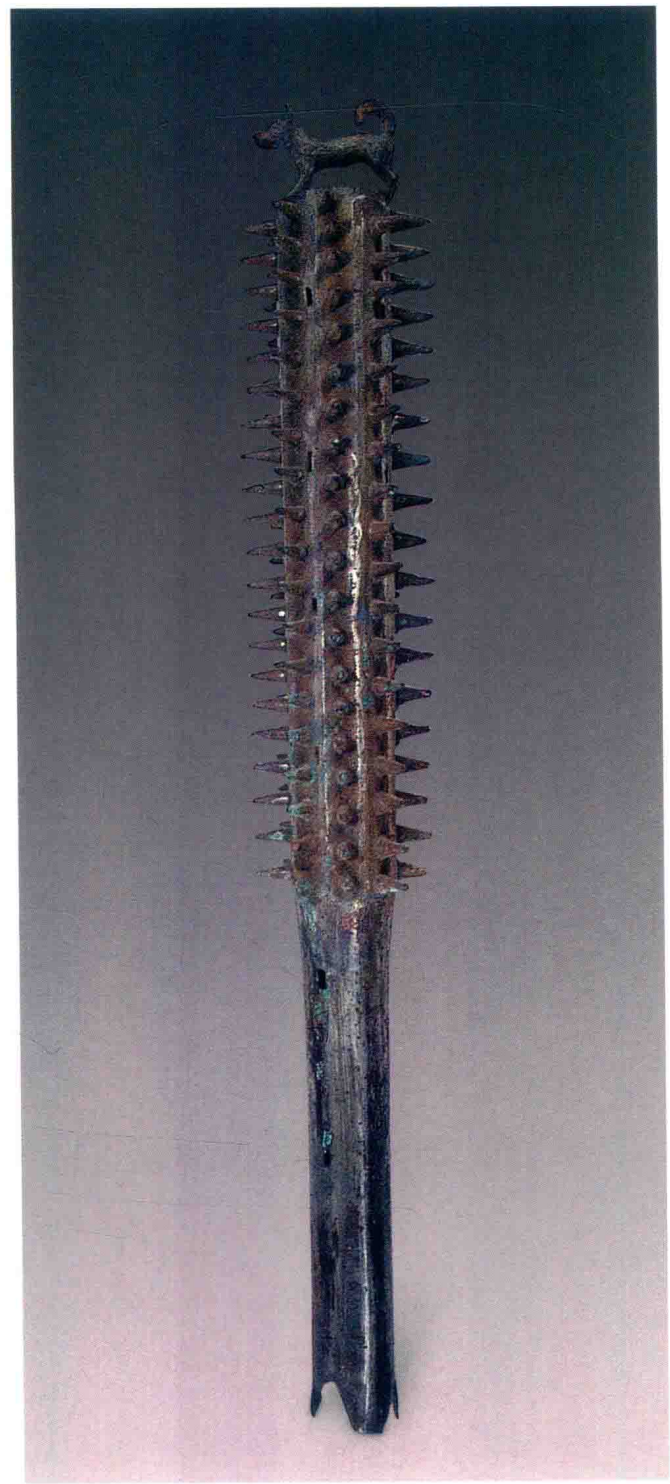
258. 棒槌

西汉

通长52.6、狗高4、刺高约1.7、槌径4.8、銎径3.5、刺径约0.7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4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空心八棱棒形，下端收细成圆筒状长銎，銎口分四齿。器身每面沿中线铸有一排锥状狼牙器，狼牙刺粗壮，顶端铸立狗。表面镀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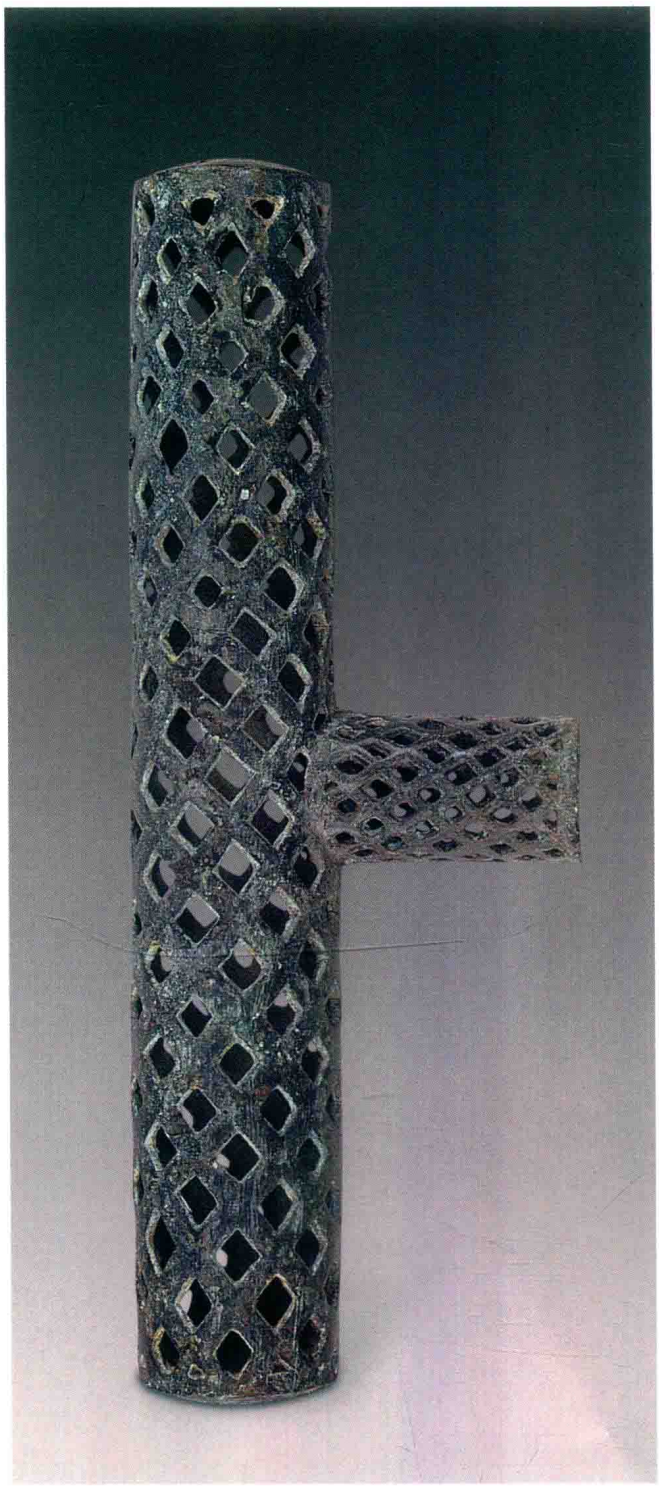
259. 棒槌

西汉

通长26.7、通宽9.8、槌径4.7、銎径3.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39），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空心圆筒状，两端有底，中部呈“丁”字形接圆筒状銎，遍镂菱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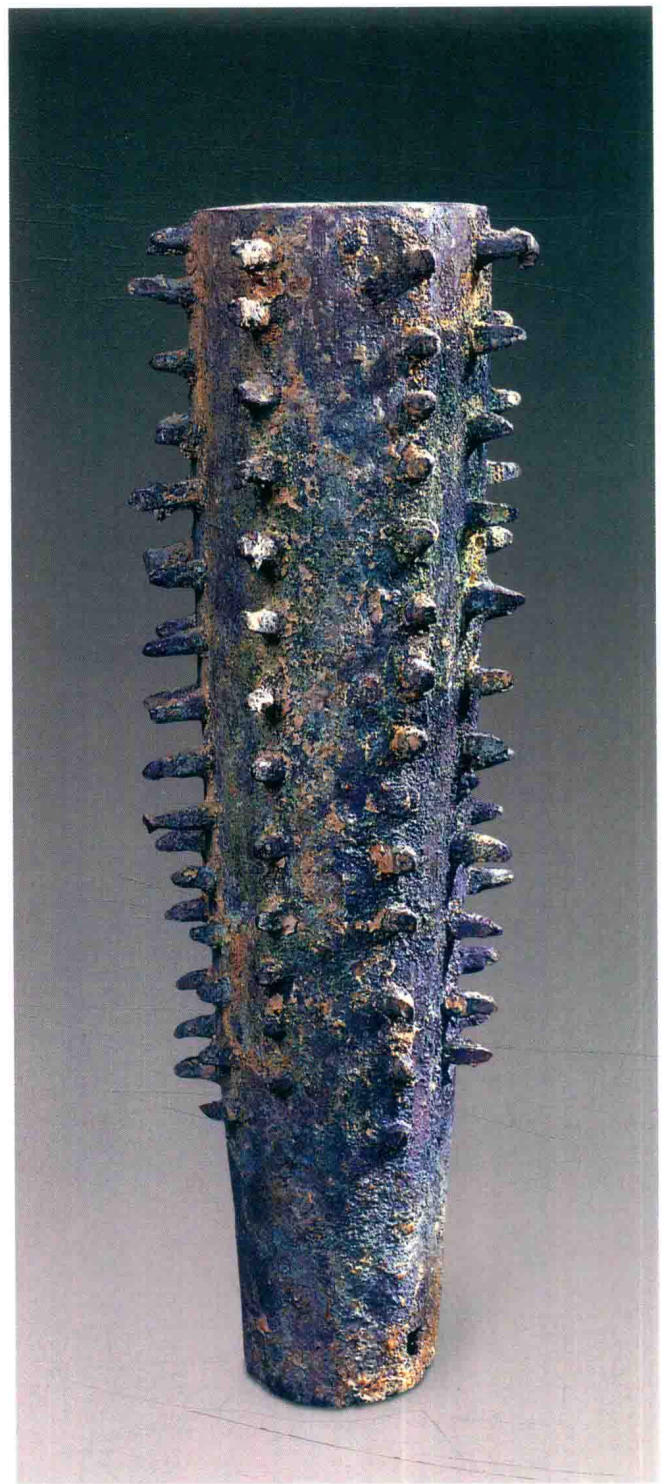
260. 狼牙棒

西汉

棒头长16、柲长76.8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88-2），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八边形，器表有尖齿，带柲。





261. 斧

西汉

长15.4、刃宽8.9、銎径3.1 ～ 3.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86），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銎口内弧，刃较宽，銎饰一周云纹，下有一蝌蚪纹，表面镀锡。



262. 斧

西汉

长14.6、刃宽9.6、銎径2.5 ～ 3.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71（M71：1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銎口齐平，銎一侧附半环单耳。双面刃，宽刃外弧。环銎铸有锯齿纹间隔的多周纹饰，有涡纹、缠绕纹，刃部上端饰三角形纹。

263. 斧

西汉

残长16.4、刃宽7.1、銎径2.5～4.1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59），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凯旋图纹椭圆形銎，两面铸有浮雕的战斗凯旋图纹。通体细长，双面平刃，较窄。銎部浮雕图形为三人，中一人骑马，着披风，头后束髻，跣足，双手持兵器长柄，腕臂配多钏，占画面大部。身侧两人行走，前行者持长曲柄斧；后随者着布满横条纹的衣裤，用一绳捆双手与骑马人相连，似为俘虏。



264. 斧

西汉

长15.2、刃残宽10、銎宽3.7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06），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銎较长，下部较细，一侧附半圆单耳，刃部较扁，刃微弧近平。銎下部两面有二钉孔，正面口部饰一周栉纹，下有一蝌蚪纹。表面镀锡。



265. 斧

西汉

残长16.3、刃宽8、銎宽3.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3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蝉纹半圆形銎，正面铸浮雕蝉纹，双翅在身体两侧张口竖立，头部为半圆形鳞纹。刃稍残，略作三角形，扁平，单面刃，微弧近平，刃部两侧及銎背面饰雷纹。表面镀锡。



266. 斧

西汉

通长18、銎长15、刃长13、刃宽6.4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167），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

銎的顶端有三个卧匐的兽，长尾，其中两个头向一致。



267. 铲

西汉

长20.5、刃宽9.7、銎宽3.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6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銎断面呈半圆形，銎较高，下端两侧脊下弧，正面为浮雕蛇头，背面有一钉孔。铲身稍宽，平刃。



268. 铲

西汉

长40.2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327），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祖形柄。



269. 锄

西汉

长24.1、最宽19.2、銎宽6.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20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锄身较窄，肩上鼓，下段稍长，最宽处略低。銎两侧有对称钉孔，饰雷纹。



270. 锄

西汉

长27.2、最宽22.7、銎宽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9（M69：22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斜折肩较平，銎断面呈梯形，下段近尖处为圆弧形。銎正面饰云纹，两侧及锄身上沿饰雷纹。表面镀锡。





271. 锄

西汉

长24.2、最宽15.5、銎宽4.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16），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器形独特，可能属礼仪器。圆肩下斜，锄身两侧波状弯曲，下段向上翘，銎断面呈三角形，三面各有一钉孔，正面铸一极大的蝉形纹，形态生动，近口处有三道凸弦纹。



272. 锄

西汉

长19.5、刃宽19、銎宽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20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三级阶梯，刃微弧，銎正面与锄身两侧阶梯对应呈台阶状向下渐低，銎饰小乳钉组成的雷纹，近口处有三道弦纹。

273. 锄

西汉

长20.6、宽21.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27），现藏于江川县文物管理所。

锄刃齐平，两侧呈阶梯状向上收，中起銎，略作方形，銎上饰雷纹，器表镀锡。



274. 锄

西汉

通长24.3、銎长3.2、刃宽6.2、銎宽3.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0（M50：7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厚壁，短銎，底部有菱形镂孔，镂孔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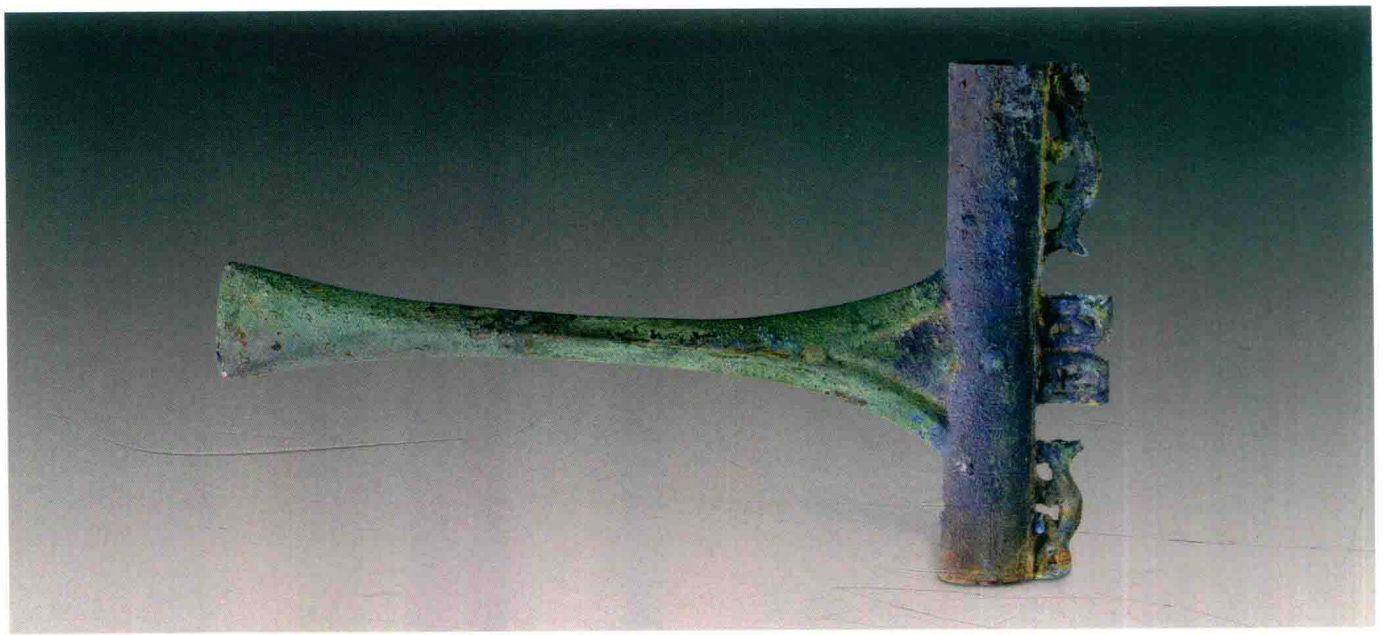
275. 锄

西汉

通长24.7、銎长3.6、刃宽5、銎宽3.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9（M69：22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厚壁，短銎，上段有菱形镂孔。表面镀锡。



276. 啄

西汉

通长24.5、刺长20.2、銎长14.3、銎径2.2～2.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33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长銎，刺前端扁平，双面刃，后端较宽连銎。断面呈菱形。椭圆形管状銎，上端封闭，中部有太阳纹，两端环銎数周双旋纹、三角形齿纹、弦纹等组合图案，刺后端宽与銎连，前端亦较宽，背有四狐。表面镀锡。



277. 啄

西汉

通长20.4、銎长15.1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圆形銎，其上饰旋纹、齿纹及圆圈纹。銎背铸三人一牛，一人在前作牵牛状；二人在后赶牛，其中一人扛工具，另一人背物。



278. 啄

西汉

通长25.6、銎长15.9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80），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圆形銎，长条形宽刺，銎铸二鹿。



279. 灯

西汉

高30.8、长43厘米

2010年出土于云南省个旧市黑蚂井M16（M16：16），现藏于个旧市博物馆。

保存较完整。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状似孔雀，通体錾刻羽纹，羽纹整齐，形态栩栩如生。头部有冠，口含一灯罩，灯罩上阴刻有两组飞马和神鸟纹。背部有一灯盏，灯盏口沿阴刻有三角形纹，灯盏边有烟炱。两爪爪尖弯曲，作抓地状。尾部着地，与两爪一起起平衡作用。颈部与腹部榫卯相接，内腹中空，可盛水。使用时，烟由灯罩通过颈部，最后进入腹部。



280. 灯

西汉

高41.6、宽48厘米

1995年出土于云南省个旧市黑蚂井M4（M4：35），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俑作蹲踞状。俑双手平伸略上举，头顶及双手各执一灯台。



281. 网状器

西汉

通高28.9、网高13.8、长25.4、网径20.6、銎径3.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47（M47：86），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纲銎中部下曲深，两岔铸作宽扁铜条构成的方格网，整网呈半球形。纲前端蛇头夸张，极大，颈部前后弯曲，腹面扁平，背部中线起脊棱。后端蛇尾做浮雕，缠绕于銎上。整器分两次铸就，先铸成网和銎，再沿中线套范铸蛇形纲。

282. 人俑

西汉

高57.4、宽23.5、侧宽34.3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154-1），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

蹲踞持伞、持杖状。弯眉，凸目，直鼻，双耳较长，双袖卷起，其头顶梳螺髻，颈部佩戴颗粒状珠链，腰间束带，腹前悬挂一圆形扣饰，左边佩一有剑鞘之铜剑，背部凸起一包。着衣三层，贴身为对襟长衣，第二层为左衽衣，最外层为披蘘，在胸前结一蝴蝶结，背后侧向下隆起，可见披衫之横条状纹。两手上下重叠、手心向内呈拳头状，紧握执伞。体内中空。



283. 人俑

西汉

通高61.1、俑高46.5、鼓足径24.1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47（M47：25），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稍瘦削，面正，颈戴项链四条。身下小铜鼓胴部饰三角形齿纹间三周雷纹，腰上段用羽状纹直分为八格，格内无纹，下段为三角形齿纹间羽状纹三周。



284. 人俑

西汉

高42.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9（M69：166），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女俑，面正，头发后梳，挽银锭形髻垂于颈背，带多个耳玦，前大后小根据次序排列，外着圆领及踝长裙，上部饰锯齿纹、菱形纹等组合图案，膝部饰锯齿纹、菱形纹各一道，前臂佩多钏。



285. 人俑

西汉

高65.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60），现藏于江川县文物管理所。

男俑跪坐于素铜鼓之上，头顶挽高髻，面略向左侧，耳佩大玦，头戴串珠项链，衣袖及肘，右肩挎宽带佩剑于左胯，背披毡，后腰凸出，外扎腰带，前配扣饰，小臂配钏，跣足。双手执伞，伞已脱落。





286. 杖头饰

西汉

通高23.6、鱼长19、銎径2.8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388-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雄鱼，鱼较小，体狭长，尾端分两叉，鱼口之蛇后腹和尾贴附鱼头上。鱼腹下立人。鱼颌下挂铃之系作绞绳状。下端残。



287. 杖头饰

西汉

通高8.5、銎径1.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9（M69:209），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鼓足下连圆筒状銎，鼓面上铸一立体的公鸡。腹与鼓接，冠宽大，长尾上曲，翅羽下垂。表面镀锡。

288. 杖头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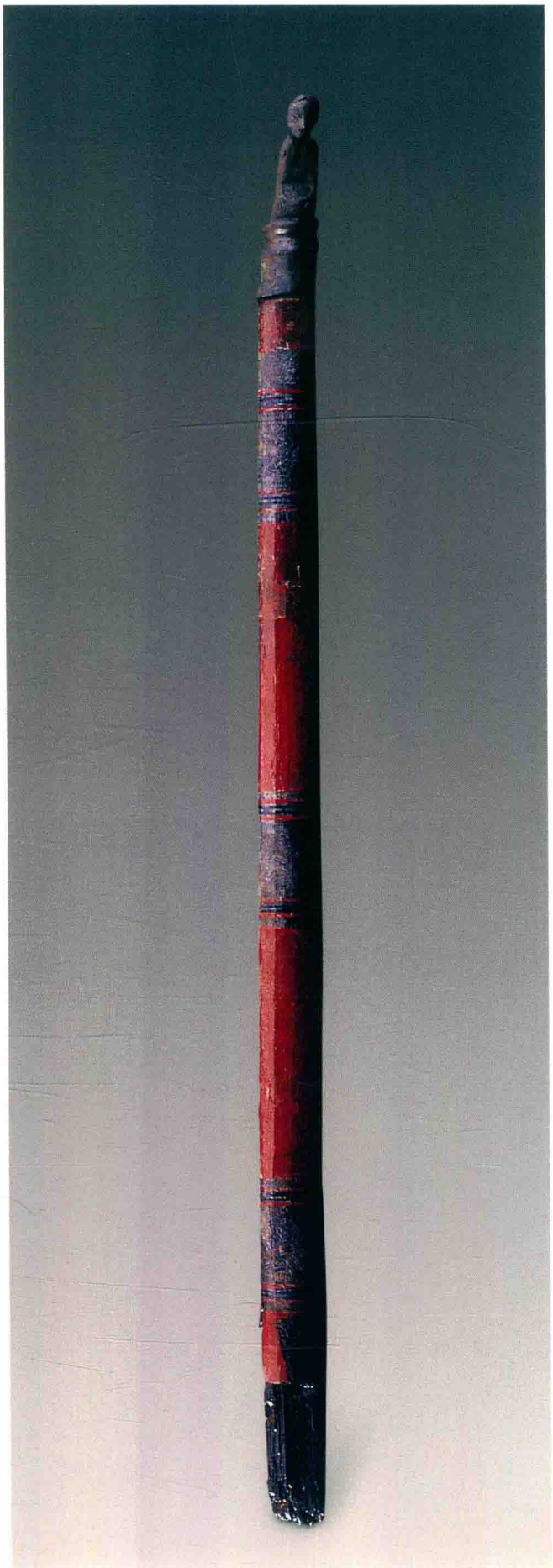
西汉

残长44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2），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杖头铜质。为一跪坐鼓上的妇人形象，杖柲分段绘编织纹，中髹红漆。







289. 扣饰

西汉

直径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5（M55：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面稍凹呈浅盘状，中央如玛瑙扣状凸起，周围有五周纹饰，由里向外依次为圆点纹、栉纹、圆圈纹、栉纹、圆圈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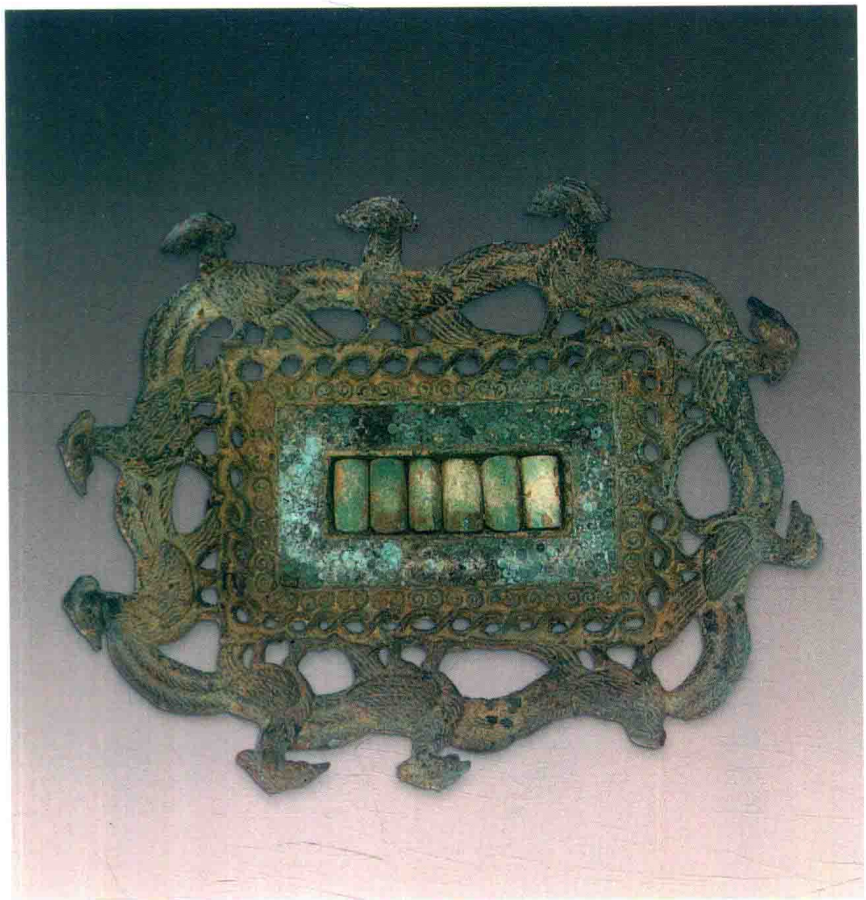
290. 扣饰

西汉

直径8.3、圆柱高1.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4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面稍凹呈浅盘状，中央凸起蕈状圆柱，柱顶部饰三瓣花纹，面上有三周纹饰，由里向外依次为折勾连云纹、绞绳纹和连续云纹。背面中央圆柱底部作圆形凹圜底。表面镀锡。



291. 扣饰

西汉

长21、宽1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75），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分两圈围两种动物，外圈四边围十只孔雀，上下各三只，两侧各两只，昂首，尾羽向后平伸，接后边孔雀前胸，内圈为蛇，中央镶嵌六片竖置横排的玉片，框形镶嵌绿松石穿孔小圆珠，周边为一周卷云纹。



292. 扣饰

西汉

长12.9、宽8.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15），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以十二只平面浮雕猴围边，上下各四只，两侧各两只，排列紧密，头与前猴股略交叠，一前肢搭前猴股。正面微凹，中央镶嵌五片竖置横排的玉片，周围镶嵌绿松石穿孔小圆珠，其外为一周圆圈纹，圆圈内镶嵌圆形绿松石。



293. 扣饰

西汉

长11.5、宽6.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2：30-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以两只狐围两侧边，狐半立体透空浮雕，侧身侧首，头向上，略前倾，头部为立体圆雕，颈粗长，尾较粗下垂。牌面平，中央镶嵌九片玉片，中间三横，两侧各三竖排列，上下边沿有对称伸出的五双联同心圆纹。



294. 扣饰

西汉

残长13.3、宽9.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47（M47：149），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以七狐四面围边，上、下、左各二只，右一只，狐头转向正面前伸，头颈和尾立体圆雕，尾细长，尾端卷勾后狐颈。牌面微凹，中央镶嵌七件竖置横排的竹节形白色玛瑙珠，框形镶嵌绿松石穿孔小圆珠，其外饰一周卷云纹。



295. 扣饰

西汉

长8～10、宽4.4～5.6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186-1），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长方形，卷边。



296. 扣饰

西汉

长13.9、宽9.4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113（M113：267），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平边。四周铸鸟形纹、人兽搏斗纹、双旋纹图案，中间镶嵌玉管、绿松石珠。



297. 扣饰

西汉

高7、长14.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47（M47：142），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熊前后肢分别相并伸展作奔跑状，身粗体短，短尾下垂。地面二蛇透空平面浮雕，蛇分别经熊口咬熊下颌和熊尾。

298. 扣饰

西汉

残高14.4、长23.2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1（M51：27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二公牛四肢分立，面相背而立，昂首，角上曲，颈后凸肩峰，长尾下垂。地面二蛇，分别咬二牛赘皮。

表面镀锡。





299. 扣饰

西汉

高9.9、长15.6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214），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公牛趴在母牛后背，作交合状，母牛四肢分立，背平无肩峰，角转前上曲，公牛有肩峰，地面一蛇，咬公牛尾。



300. 扣饰

西汉

高7、长11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4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二虎一豹噬鹿。一虎扑鹿后背，噬鹿背，前爪抓鹿腹，一虎直立鹿前噬鹿颈下，前爪抓鹿颈，后爪抓鹿前足，鹿奋力前冲，身前倾，张口伸舌喘息，腹下立一豹噬鹿前足。地面一蛇咬前虎尾，蛇尾穿后虎裆缠虎尾。



301. 扣饰

西汉

高6.5、长1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16），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四虎噬牛。一虎扑牛后背，前爪抓牛腹，咬牛肩，尾上爬一小虎，牛前一虎，腹被牛角挑刺洞穿倒悬，仍足抓住牛后颈不放，垂首咬住牛左前足，一虎自牛后钻牛身下，侧身噬牛右前足，抓牛腹及尾根后股，牛立虎间，角挑一虎，拼命搏斗，双前足被虎咬住，欲动不能，地面一蛇头残，口咬倒悬虎腹。



302. 扣饰

西汉

高6.7、长10.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35-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三人猎虎，虎立中间，虎前一人被虎噬持匕的右臂肘，右腿被虎左前爪握住，斜悬身仍剑刺虎前胸，身下一犬，中一人右手持剑刺入虎背没刃，虎后立一人，左手抓虎尾，右手持长剑，横剑欲刺，三人髻顶垂一束髻绳带，地面一蛇，头于犬颈下。



303. 扣饰

西汉

高6、长10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27-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二虎一豹噬牛。一虎跃踞牛头颈，一虎钻于牛身下咬牛腹，尾上搭牛角，一豹立于牛身后咬牛臀。牛张口伸舌。地面一蛇昂首口咬虎尾。



304. 扣饰

西汉

高14.9、长17.5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47（M47：11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骑士头帕两端上翘较长，配剑，手戴镯，跣足，左手控缰，右手持矛。地面一蛇，蛇首已残。



305. 扣饰

西汉

高9.7、长15.9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57（M57：1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骑士御马追猎一鹿。马与鹿前后足分别相并奔跑，刚追赶及相交。骑士缠头帕，束腰带，跣足。左手控制缰，右手持矛刺鹿身。马背鞍无蹬，长鬃，长尾上扬。



306. 扣饰

西汉

高8.8、长11.1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51-3），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七人猎豹。豹身高大强壮，左前爪抱一人裆股，噬住其右肩颈，此人悬身仍剑刺豹肩没刃，足下一犬，豹身下一人侧倒抱豹右前足，豹背立四人，一人双手扼抱豹头，二人剑刺豹身没刃，一人抱豹胯，豹后立一人执豹尾，后股覆带尾兽皮，豹裆下一犬，转头咬豹后股，豹身有圆圈斑纹，地面一蛇。



307. 扣饰

西汉

高7.2、长11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18），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三人猎豹。豹极高大，双前足爪如人手，抱一人，噬其肩，此人髻散发垂，右手剑仍刺入豹腹没刃，一人趴伏在豹背上，剑入豹腹没刃，一人立豹后，双手抱豹尾，豹身下二犬，一犬咬豹腹，一犬咬豹左后足而背被豹右后足践踏，豹后和背上二人肩披带尾兽皮，豹身有圆圈斑纹，地面一蛇，身如竹形，头接豹前人左手。

308. 扣饰

西汉

高5.9、长11.4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51-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一虎一豹噬牛。虎扑牛后背，张口欲噬，前爪五趾似人手抓牛后股，豹于牛前刚躲避过牛角攻击，尾尚在牛角上，低身噬牛前足，牛立虎下，身前倾，后足微曲，尾后扬，张口伸舌，喘息着欲奋力前冲，地面一蛇头前伸。





309. 扣饰

西汉

高6.8、长10.2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30），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五人缚牛。一人悬身双手抓牛角，三人推按牛身，一人抓牛尾，牛下立一鸱，五人皆垂一束髻绳带。



310. 扣饰

西汉

高10.1、长13.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68（M68X1：51-5），现藏于江川县文物管理所。

十一人在柱旁拼力制服一头悍牛，准备剽杀作牺牲以祭柱。牛强壮有力，头颈套绳。人梳高髻，着对襟无袖裳，腰扎带，臂佩钏，跣足，膝缠系绳状饰。柱顶端立一牛。



311. 扣饰

西汉

高9、长15.2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90①），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

一牛居中，头套绳索，两角硕壮。牛侧站立一人，双脚蹬地，右手按伏牛肩，左手作牵拉状；牛尾后亦站立一人，亦作双脚蹬地，头后仰，双手按住牛背作推牛状。二人均跣足。牛下有一蛇，口咬牛侧驯牛人之腿部。



312. 扣饰

西汉

高9、长15.2厘米

199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M71（M71：90②），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一豹猛扑于野猪之肩腹部，两后爪紧抓野猪后腿，张口咬住猪背；另一豹伏于猪腹下，前爪抓住猪腹，作吞噬状，此豹后腿又被野猪咬住不放。其下有一条蛇，口咬猪背上一豹之后爪，蛇尾与另一豹尾相互缠绕。



313. 扣饰

西汉

高5.3、长7厘米

1981年出土于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八塔台M100（M100：1），现藏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器形扁薄镂空，二长尾鸟相对站立，各衔一蛇尾，鸟爪踏蛇身，蛇头衔鸟尾。



314. 扣饰

西汉

高9.6、长16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四人将一牛缚于柱，其中二人按伏牛背，一人挽住牛尾，另一人持绳。其下有一蛇，另有一蛇盘绕柱顶。背面有矩形扣。



315. 扣饰

西汉

高10、长10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一骑士御马前行，头戴圆形帽，身侧佩剑，腿部饰牦牛尾，跣足，双手控缰，身向后仰。其下有一蛇，蛇口咬住马的前腿。背面有矩形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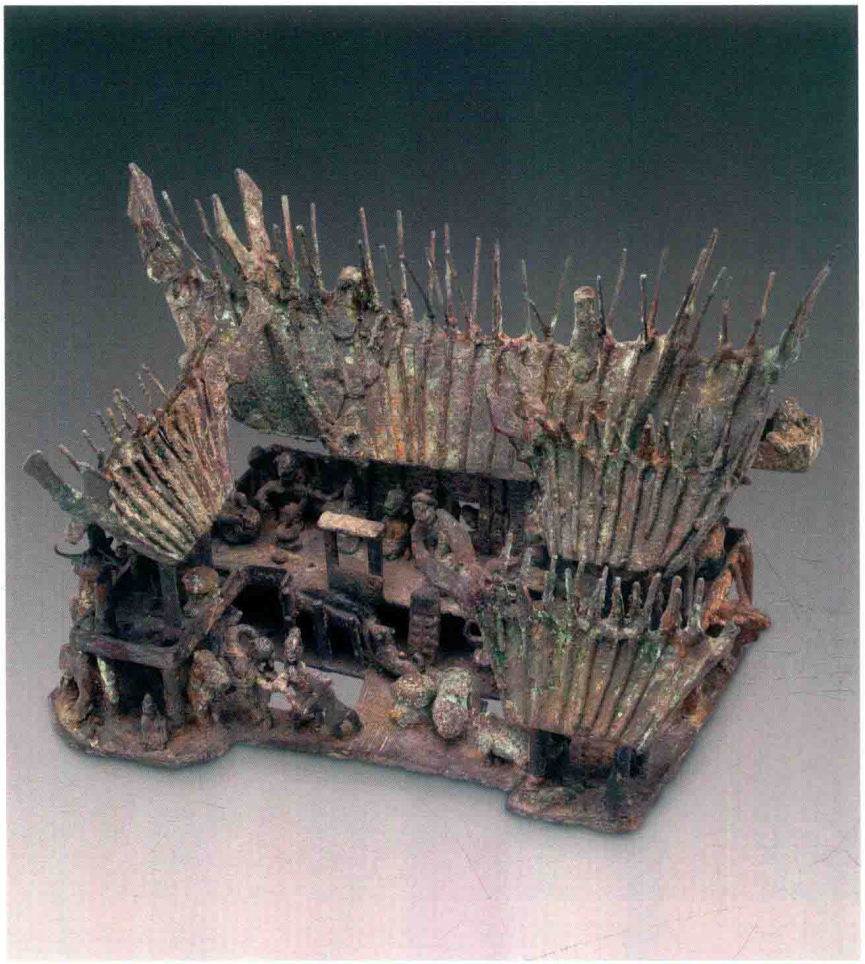
316. 扣饰

西汉

高11.5、长15.5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三孔雀仰首并立，其中一孔雀展翅欲飞，左右两孔雀相向而立做观望状。其下有二蛇及游鱼两尾。背面有矩形扣。



317. 人物屋宇

西汉

高11.5、宽12.5厘米

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房宇为干栏式，结构较复杂。其主体部分为一方形平台，高与人齐（与同一场面中的人像相比），平台下有若干小柱承之。平台正面稍后有一房屋，为整个建筑物之主要部分，顶作悬山式，用交叉的木片覆盖。屋脊之山尖高翘斜出，左山尖下有一小凉台。平台的后端又有一长方形小平台，台上有一四柱凉亭，无墙板，仅有低栏杆。平台右侧有一敞棚，敞棚前有一小棚。

正屋山尖下的凉台上坐两妇女，屋内有一小龛，供一人头。龛右前檐下坐三男子，其右侧坐一人，前置一案，此人双手料理案上之食品。案前左侧有一人，头部已残。小龛前置一釜，釜前立一木牌，前有一犬，仰首前视。

房屋下层立一马，马前有三男子，为首一人吹葫芦笙，其后二人抚按其背。平台之下有牛、马、猪等家畜。



318. 镇

东汉

高10.9、长13厘米

1992年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M49（M49：1），现藏于李家山墓地考古发掘队。

为尾开屏的雄孔雀，身略作椭圆形，两侧翅小，上展，略作三角形片状，尾由多个镂孔旋涡相连构成，底面平，中间有一长方形孔。腹内灌注锡或铅，很沉重。

319. 马俑

东汉

高约107、长约105、宽32厘米

出土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M268（M268：23），现藏于羊甫头墓地考古发掘队。

分段铸造拼合而成。



320. 錞于

战国

通高45.2、盘径42、肩径48、底径27厘米，盘内立虎高6厘米，重6.35千克

1962年出土于贵州省松桃县木树乡，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合范铸造，体呈上粗下细的圆筒状，最大径在肩部，顶为一浅盘，盘正中立虎为纽，立虎四周铸钱纹、鱼纹和桥形纹等。



321. 钺

战国

长8.2、刃宽4.7厘米，重82克

1980年出土于贵州省普安县铜鼓山遗址，现藏于贵州省物馆。

钺身呈舌形，“V”形銎，銎下一“  ”形符号，弧形刃，刃端较宽，两侧卷成倒刺形。

322. 剑

战国

长31.7、身最宽3.1厘米，重160克

2000年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M318，现藏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柳叶形，剑身起脊，茎与剑身无明显分界，茎上有穿，并绕有树皮之类，树皮下插有朽木片。



323. 圆鼎

西汉

鼎高17、盖径18、口径17、腹径19、提梁拉直距盖纽11.5厘米

1984年出土于贵州省务川县大坪M7，现藏于务川县文物管理所。

敛口，鼓腹，圜底，底下三蹄足略外撇。口沿上有盖，盖中部有半环纽，纽外侧为柿蒂纹，柿蒂纹外为两周凸弦纹。腹上部有对称方形耳，两耳间有桥形提梁，提梁与耳以铜环相扣。



324. 釜

西汉

通高32.8、口径44、腹径49厘米，重10.05千克

2000年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M274，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侈口，宽折沿，束颈，斜肩，鼓腹，圜底，底有烟炱痕。肩部一周凸棱，凸棱上对称两只环形大耳，上饰辫索纹十二周，耳与釜身相接处有六道捆绑状辫索纹。肩腹部铸有对称圆雕立虎，虎尾上卷，抬头向上张嘴作咆哮状，仪态威猛。



325. 壶

西汉

通高37.5、口径3、腹径23、圈足径13.2厘米，重2.17千克

1983年出土于贵州省务川县大坪遗址，现藏于务川县文物管理所。

直口，平唇，唇外扩展呈六瓣蒜头状，直长颈，鼓腹，长颈中部有两周凸棱。通体素面。





326. 盉

西汉

通高16、口径8.5、腹径17.4、柄长8.1厘米，重843.7克

1978年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M177，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口上有盖，盖顶环形纽，球形腹，腹下三蹄足，腹部中一侧伸出一曲形空柄，另一面约与柄呈直角方向伸出一鸟形流，腹部饰三周弦纹。

327. 鼓

西汉

高24.5、面径45.5、足径48.8厘米，重10.8千克

1958年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辅处锣锅寨，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石寨山型铜鼓。鼓面略出沿，胴径大于面径，束腰，足外撇，腰部对称双环耳。鼓面正中为太阳光芒纹，其外八晕圈，第四晕圈为主纹，绕飞的翔鹭六只，其他晕圈或饰齿纹、或饰圆点纹。胴部主体纹饰为四组竞渡纹，船上各有1～4名羽人。腰部被均分为四个方格，每格主体纹饰为立牛，立牛之间用竖直线隔开，下部为齿纹两周，足部素面。





328. 戈

西汉

通长24.1、援长18.4、内长5.7、阑宽8.65厘米，重275.7克

2000年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M350，现藏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直内条形援戈。“W”形内首内卷，近阑处一近椭圆形穿，内上饰人形图案。长条形援略弧，后半部整体中空，阑侧两长方形穿，穿前方框内饰人物图案，图案前一圆形孔，孔外同心圆纹，同心圆间饰细短线，外圈同心圆向戈锋方向伸出一尖凸。

329. 剑

西汉

通长36.5、茎长13.6、首宽15.5厘米

1999年出土于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七星村碑塘组，现藏于安龙县文物管理所。

剑柄与剑首呈“T”字形，首端外展成长条状，一字格，剑身短，锋作三角形。柄部有布币状、云雷状、卷云状等细密纹饰带，近剑格一侧两排镂孔，剑身中后部饰箭矢状纹。



330. 剑

西汉

通长26、剑格宽13厘米

1980年出土于贵州省普安县铜鼓山遗址，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剑茎扁圆内空，首端呈喇叭状，“一”字形剑格，剑身短但基部外展与剑格等宽，双刃内收至中部又外凸形成曲刃。茎上饰几何形“人”字纹、菱形纹和心形纹，剑身中后侧饰一指向剑刃的箭矢状纹。





331. 带钩

西汉

长10.3、头宽3.3厘米，重62.3克

1978年出土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M7，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整体仿牛头造型。牛头前倾，嘴张开，头后端两侧双耳平伸，耳后对称弧形上抬弯角，一角下方铸钩首，一角下方铸圆形钩纽。



332. 带钩

西汉

长13、纽径1.5厘米，重224克

1978年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M22，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带钩长条曲棒形，钩头用细线镌刻成蛇头（一说似鹅头），嘴、眼、头等均有细致表现，冠顶镶嵌一桃形绿松石，钩背饰云雷纹，近中部一圆形纽，纽面刻鸮形图案。钩面通体为刻错金流云纹和羽状纹，钩颈至钩尾镶七颗蓝色宝石。



333. 带钩

西汉

长10、宽3.7、高2厘米，重68.5克

1978年出土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M19，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仿鲵鱼造型，鱼尾弯曲成钩，腹侧伸出四鳍，鱼腹铸一圆形纽，头端圆弧，背面用汉隶刻“日利八千万”吉祥语，四鳍两面刻细密纹饰。



334. 带钩

西汉

长7、双翅宽4.5厘米

1978年出土于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墓地，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仿飞鸟造型，鸟头向下弯曲成钩，颈下部向两肩平伸成短柱状，鸟背铸一圆纽。鸟尾束拢，尾端成圆弧状，双足伸直并入腹部，双翅展开作飞翔状，双翅刻出条状羽毛装饰。

335. 壶

东汉

通高36.5、口径12.6、腹最大径23.2、足径20.3厘米

1987年出土于贵州省兴仁县交乐M6，现藏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局。

由器盖、壶身和提梁三部分组成。盖与壶口以子母口相扣，盖顶较平，断面呈梯形，盖顶正中一鼻形纽，纽上套一圆环，纽周边饰西式柿蒂纹，盖沿两侧有对称扁平横耳。壶身盘口，口外一凸圈，长颈，鼓腹，喇叭状高圈足，腹部饰多周弦纹，足部饰折棱。腹部有对称铺首衔环，环上扣“8”字形链环，链环正中一弓形对称龙首提梁，龙口各衔一环与链环相扣形成提梁。



336. 樽

东汉

高16.4、口径22.8、底径23.2厘米

1987年出土于贵州省兴仁县交乐M6，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圆桶状，深腹，直壁，圜底近平，底部三虎形足，虎足作行走状。壁中上部对称饰有铺首衔环，壁上数周凸棱，器身饰细线阴刻花纹，以铺首衔环中间最粗凸棱为界，其上下两个较宽区域饰波浪形纹和龙纹，凸棱之间较窄区域主要饰菱形纹和齿纹等。





337. 罐

东汉

通高28.4、口径9.3、腹径26.4、足径13.5厘米，重3.92千克

1975年出土于贵州省兴义县万屯M8，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敛口，圆唇，短颈，鼓腹，下腹内收，圈足。肩部有对称环形立耳，两耳之间用龙首形提梁和“S”形环相连。肩部和腹部各饰两周凸弦纹，腹上部饰对称铺首。圈足底部有“公”字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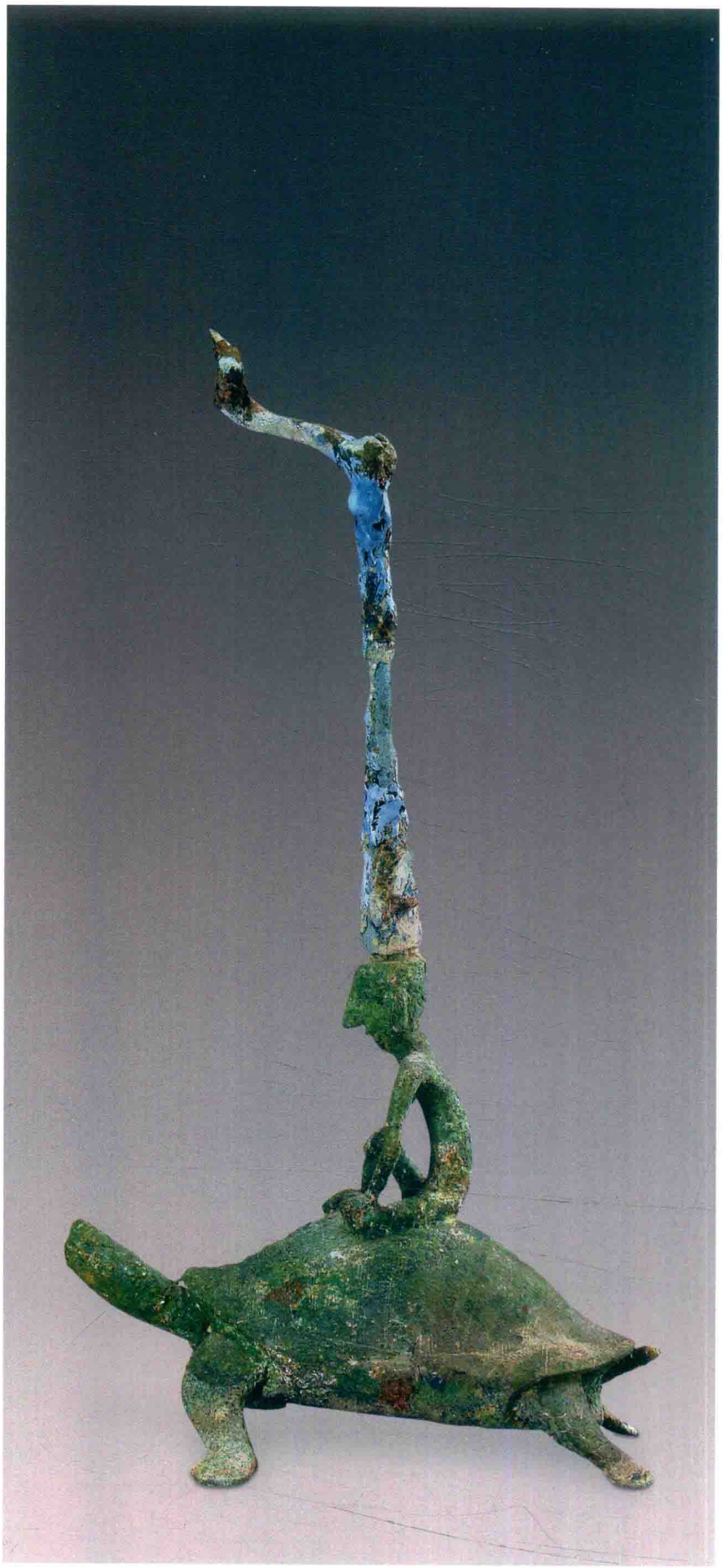
338. 灯

东汉

残高26.6、龟长17厘米，重808.1克

1958年出土于贵州省清镇市M15，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底座为一龟，头部上抬，四足外撇作行走状，后露尖状小尾，龟背隆起，上刻甲纹。背上盘坐一高鼻深目之人，腰身细长向后呈弧形，双手放于左右膝，头顶平接上细下粗的灯杆，灯杆上部弯折，原有一鸟形饰物，惜已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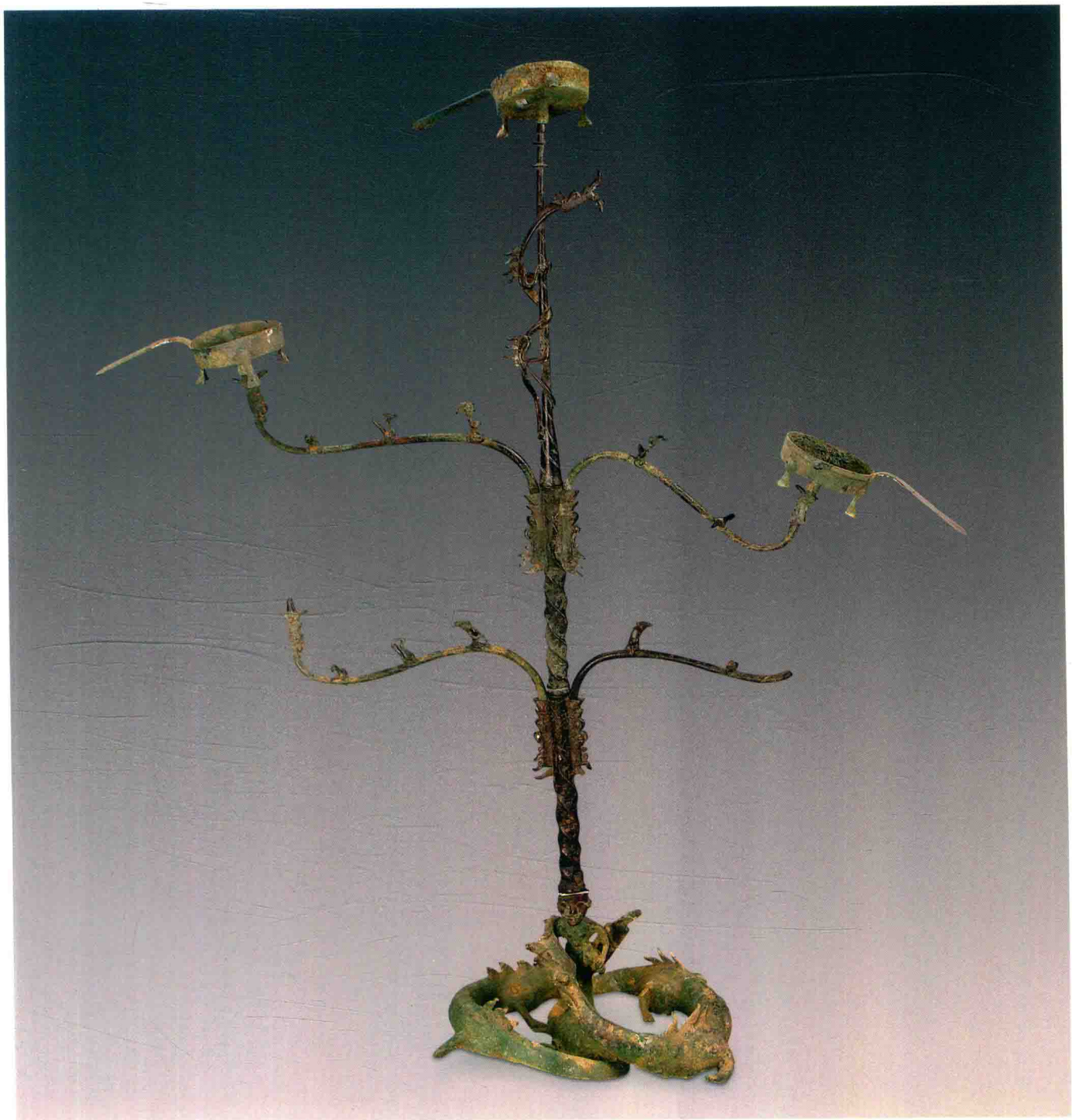
339. 灯

东汉

通高117.2、主材高80、座高19.2、底径30厘米，重5.2千克

1987年出土于贵州省兴仁县交乐M6，现藏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局。

整体呈树形，由底座、主杆、灯枝、灯盘和龙形附件等组成。灯座底部正中为一爬行的乌龟，龟背一短柱，短柱上接一赤身跪坐之人，二龙绕龟和人形成灯圈，龙尾着地，龙头抬至人像胸腹，人顶主杆，被灯枝分为三节，中下节主杆与灯枝连接下作龙蛇盘旋，龙首朝上，口呈长方形中空以插灯枝，上节至顶部变成锥状，一龙自下而上盘旋缭绕，顶端插一三足形灯，灯枝如树枝状左右伸出，枝顶各插挂一三足带柄形灯，灯枝上雕铸凤鸟和人物装饰，人物头戴长锥帽，有的吹箫、有的说唱，有的合十念诵，表情各异。



340. 车马

东汉

车马全长123厘米，马俑高88.5、长45厘米，车高69、长95、宽60厘米

1975年出土于贵州省兴义县万屯M8，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由车和马两部分合成。马雄壮高大，张嘴，竖耳，抬尾，驾车行走状，马头、耳、颈、腹、尾和四肢皆可拆卸。车为弧形敞篷，车厢长方形，前方开启可上下，车轮十二辐，双辕前端屈曲与衡相连。



341. 矛

夏代（齐家文化）

长61.5、宽19厘米，重287克

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沈那遗址H74，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呈宽叶形，前锋圆钝，中起厚脊，銎部较长，銎口处有三周箍，并附一纽，近矛身处有一倒钩，纽与倒钩分在两侧。器体宽大。



342. 鬲

商代（卡约文化）

高21.9、腹径11.7厘米，重880克

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鲍家寨，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侈口，略束颈，垂鼓腹，袋形锥状足，口沿上置一对立耳。颈部饰两周凸弦纹，分裆处饰“人”字纹。卡约文化中铜容器非常少见，此件铜鬲是罕有的珍品。



343. 钺

商代（卡约文化）

长16、宽8厘米，重310克

出土于青海省湟中县下西河村潘家梁墓地M221，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钺身近銎处有七孔，孔周起缘，并向刃部延伸形成纵向脊。钺刃呈半椭圆形。管銎，銎内残留有木柄痕迹。銎身间隔分布三个长条形镂孔，用以加固柲柄，镂孔两侧及銎两端饰凸弦纹。铜钺器形特殊，铸造精细。



344. 戈

商代（卡约文化）

长7.2、銎径2.2、刃宽5.7厘米，重260克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良教乡下治泉村，现藏于大通县文物管理所。

援呈三角形，中央起脊，前锋圆锐。管銎，銎外侧饰圆雕的大角羊动物造型，其下侧有一长方形小穿孔。造型生动精巧。



345. 斧

商代（卡约文化）

长8.6、銎径2.4厘米，重280克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良教乡下治泉村，现藏于大通县文物管理所。

斧身呈竖长方形，斜弧刃，便于用力劈砍。无穿，横銎较长，銎孔呈圆形，且一端孔径稍大，銎上有一长方形纽，可以穿缨系挂，銎面两侧各饰一对三角形纹。



346. 镐

商代（卡约文化）

通宽18、銎宽6.1、銎厚2.1厘米，重200克

出土于青海省化隆县索拉台墓地，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近似“十”字形镐。长方形内，椭圆形銎，直刃。



347. 杖饰

商代（卡约文化）

高11.3、宽10、銎直径2.5厘米，重185克

出土于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墓地M87，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鸠头平伸，环眼，长喙。鸠首上铸母牛、小牛及犬。犬张口翘尾，面向大牛狂吠，小牛躲藏于母牛腹下吃奶，大牛竖耳、拱背、扬尾。管状銎，用于安装木柄。



348. 杖饰

商代（卡约文化）

高11厘米，重100克

出土于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墓地，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鸟头阔喙，圆眼，长颈。鸟腹中空，腹内置石质铃舌，下腹镂雕八个椭圆形孔，高圆銎形足，对穿长方形孔，用于安装木柄。鸟身背部雕饰羽翅纹。



349. 牌饰

商代（卡约文化）

通长5.4、上宽2.3、下宽2.5、最窄1.1厘米，重10.1克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M66（M66：12），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亚腰形，器身最上部有一纽，应为挂绳所用。两面均有纹饰，其中一面器身上半部分刻画三只动物，居中的是老虎，体形较大，作奔跑状；右上角上是一只牛，有动物纹饰，左上角的动物模糊不清；另一面的上半部为呈“一”字形排列的六只飞鹰。铜牌两面下半部分均饰竖线纹。



350. 印

西汉

高1.1、边长2.4厘米，重48克

出土于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东村，现藏于平安区文物管理局。

官印，红铜铸造，印面呈方形，桥形纽。印面阴刻篆文“安定左佰长”，字形偏长，印文分三行排列，末字占一行。笔画均匀，结构严谨工整。



351. 甗

东汉

通高22厘米；甑高11.1、口径18.4、圈足径9.3厘米；釜高12、口径8.7、腹径15.9、圈足径6.9厘米，重213克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乙区M3（M3：43），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甑下釜，子母口套接分体式。甑为大口，折沿微侈，弧腹，两侧有半环形耳，甑底开有气孔的箅，圈足；釜为小直口，圆鼓腹，肩置双耳，矮圈足。甑腹饰三周宽凸弦纹；釜颈饰一周凹弦纹，中腹有一周凸棱。





352. 豆

东汉

通高16.8、口径10.6、腹径12.6、圈足径12.8厘米，重650克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M9（M9：12），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子口微敛，圆腹，细高柄，矮圈足。腹、柄中部各有一周凸棱，圈足外饰浅浮雕回首龙纹。



353. 印

东汉

高2.9、边长2.4厘米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乙区M1（M1：20），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印面呈方形，驼纽。印面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文字结构端正劲丽，形制精美。此印为东汉中央政府赠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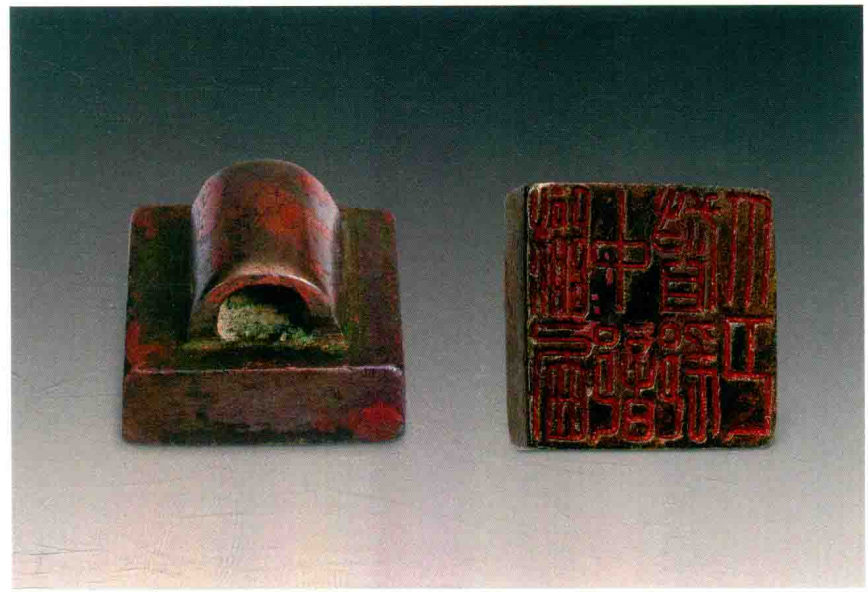
354. 印

东汉

高1.5、边长2.5厘米，重40克

出土于青海省民和县中川乡，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此印为官印，红铜质，印面呈方形，桥形纽，阴刻篆书印文“陇西中部督邮印”。督邮为汉代官名。





355. 牦牛饰

汉代

高3.5、长8.5、宽2.7厘米，重69克

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山陕台汉墓，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牦牛造型，双角上挺，嘴微张，拱背，四肢有力，大尾，背部有孔可用于穿绳。



356. 灯

汉代

通高12.5、长12.5、宽7厘米，重340克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黄家寨，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略残，整体呈卧羊状。羊昂首伸颈，双目前视，双角卷曲，贴至颊部，羊嘴紧闭，胡须自唇下连至颈部。前腿后跪，后腿前屈，躯体浑圆，短尾。羊身内空，羊首后部装有活纽，臀上装小提纽，使得羊背可以向上掀开，翻转至头顶平放成一凹弧椭圆形的灯盘。灯盘设有小流嘴，以放置灯捻，熄灯时，灯盘内剩余灯油可顺小流嘴倒入羊腹腔内，灯盘扣回羊背上，恢复为卧羊状。

357. 马俑

汉代

高33、长21、宽7.5厘米，重4.407千克

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陶家寨汉墓M9（M9:12），现藏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昂首，脖颈修长，双目圆睁，鼻孔张大，耳朵小而挺直，胸部宽阔，脊背平坦而厚实，四肢直立，马蹄厚大。整体造型比例匀称、姿态稳健。系分铸而成。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46058
SS号=14646058